



Education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 丛书英文版主编\弗兰克·帕金
- 丛书中文版主编\周殿富 韩冬雪
- 丛书中文版执行主编\曹海军

主 权

[英]约翰·霍夫曼 著
陆 彬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Sovereignty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高等教育最权威的社会科学教材之一
中国10余所最高学府知名学者联合推荐

策划编辑: 崔文辉

责任编辑: 崔文辉

装帧设计: 陈 东

Sovereignty

作者简介: 约翰·霍夫曼任教于莱斯特大学政治学系, 并从1970年起在该系任教至今。他出版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学理论的著作, 包括一本关于其祖国津巴布韦合作社的著作。约翰·霍夫曼还是政治学评论杂志的编辑和主权论丛的联合编辑, 他最近的著作是出版于1995年的《超越国家》。

ISBN 7-206-04583-9



9 787206 045837 >

ISBN 7-206-04583-9/D. 1393

定价: 14.00元

主 权

[英]约翰·霍夫曼 著
陆 彬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主权/(英)霍夫曼著;陆彬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书名原文:Sovereignty

ISBN 7-206-04583-9

I. 主… II. ①霍… ②陆… III. 主权—研究 IV. D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1865 号

John Hoffman

Sovereignty

(Original ISBN: 0-335-19789-2)

Copyright©John Hoffman 1998

Original language published b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Co. and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和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亚洲)出版公司合作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Hill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5-1367

主权

著者:约翰·霍夫曼

译者:陆彬

责任编辑:崔文辉

封面设计:陈东

责任校对:闫勇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址:www.jlpph.com 电话:0431-537801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5395845

印刷:长春市永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6 字数:12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583-9/D·1393

版次:2005年1月第1版

印次: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册

定价:14.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编委会名单

主 编：周殿富 韩冬雪

学术咨议(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俊人	马德普	马敬仁	孙晓春	李 强
任剑涛	应 奇	何怀宏	林尚立	姚大志
胡维革	贺照田	高 建	袁柏顺	徐湘林
夏可君	顾 肃	梁治平	曹德本	葛 荃
谭君久	薄贵利			

编 委：孙荣飞 朱海英 刘训练 彭 斌

叶兴艺 赵多方

第一期执行编委：孙荣飞 朱海英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总序暨出版说明

自 19 世纪中后期西学东渐以来，在西方思想和相关书籍引入方面的成就可谓蔚为大观，但总的来说，大都强调系统理论的引进和评介。自 20 世纪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介绍和翻译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著作成为了“文化热”的先导，其中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以及《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等丛书曾经滋养和影响了数代学人的学术生命。

本套丛书立足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概念，虽名曰基本知识，却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学术普及，每本小册子的著者皆是该研究领域的专业权威人士。以往这类书籍的引进通常表现为编纂学科史的教材形式，将知识的引介停留在教科书的层次上。故此，作为单纯的基本概念的追本探源式的梳理工作略显不足，这也就使得研究者对各家各派的观点难以获得系统的了解。而从可读性和理论的深入性上来说，本套丛书既适合于初次涉猎该领域的非专业人士、本科生，成为他们的领航性的参考文献，也能够满足于对此领域具有相当知识积累且有一定专深研究的研究者的专业化要求，因此能够将系统性理论的引入与基本概念的拓展齐头并进，可谓一举两得。

需要指出的是，该套丛书以社会科学自诩，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反映了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文化内涵和根本的价值取向，因此它并不具有自然科学本身拥有的客观性和普世性。毫无疑问，这套丛书是西方社会科学家以西方特有的文化视野和价值取向为基点，看待西方世界和社会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集中反映。对此，我们应该确立批判与扬弃、借鉴与建构并举的思想立场。毋庸置疑，在与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并吸收西方有益的社会科学文明的普遍性成果，借鉴和利用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经验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析框架。与此同时，我们也坚决反对食洋不化的崇洋心态和西化倾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观，在坚持学术自主性的“洋为中用”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规范化、科学化。

编者

出版导言

在这本书中，霍夫曼先生想要达致这样几个目标：

1. 主权一方面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另一方面它的概念却又是如此混淆，以至于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理论工作者和公众。因此，澄清这一重要却又充满争议的概念是极其必要的。

2. 民主理论、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三种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为我们颠覆传统的国家主权观提供了什么样的资源？

3. 我们能否实现对国家的超越，是个人而不是国家拥有主权。换言之，我们能否重建一种新型的主权观？

霍夫曼先生指出，主权并非历来就有，主权概念更是如此。主权及其概念是现代国家和思潮萌发以后才有的产物。现代主义告诉我们：主权一方面是至高无上的，一方面却又是受到限制的，正是这一矛盾

的理论假设使得主权概念难以逃出自身的逻辑陷阱；也正是因为现代主义关于主权和国家之关联的肇端，使得主权概念模糊不清、充满争议。因此，要澄清主权之概念就必须把主权和国家分离开来，这也是贯穿本书的宗旨。在此基础上，为了重建主权概念提出一种新型的主权观，霍夫曼先生从民主理论、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汲取丰富的理论资源，建设性地提出了“联系的主权观”。这一主权概念，消解了权力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根本对立关系；把主权同它所指向之对象和所处的环境联系起来；既实现了个人的自治又避免了原子式的个人生存方式；既保全了公共生活必需的秩序，又保障了个人的权利；它是一种“理想的现实主义”。

在书中，霍夫曼先生向我们展示了其深厚的理论素养，揭示了主权概念发展的历史逻辑。其中作者对不同思潮关于主权的论述，及其对主权概念联系的、历史主义的批判对我们不无启示。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作者所主张的同国家相分离的主权观存在着固有的理论缺陷，国家同主权的关联具有其特有的历史合理性，对这种合理性的抹煞是不符合历史也是无济于

事的。而且，这会为西方大国霸权主义的推行大开方便之门，这是需要我们同时加以批判吸收的。

编者

谨以此纪念莱芭拉尼·罗伯曼·恩杜马洛
(Jubalani Nobleman Nxumalo) (马泽拉)，他也许
会最低程度的赞同我的观点。

致 谢

我要感谢莱斯特大学为我提供的长假，这也使我得以写成这本书。政治学系主任约翰·杨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还有罗伯特·甘纳承担了由于我的缺席而额外增加的管理任务。

麦可·李文，劳拉·布雷斯和金斯·福克斯从百忙中抽出时间为本书的初稿提出了修改意见。这使得我从他们的建议和批评中获益匪浅。葛廉·扬斯对现实主义的一章所作出的建议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样要感谢安·哈瑞斯，他为我提供了研究书目的帮助，同时，还要感谢金斯·威尔斯为我提供了波伏娃《第二性》一书中关于主权的所有参考资料。

在我完成此书之际，由我和劳拉·布雷斯合写的论文集出版了，我也因此要感谢卡塞尔的皮特·瑞切特采用我的论文，“是时候从国家中分离出主权了吗？”，这也是论文集集中的论文之一。

要特别的感谢诺万、弗雷德和弗里达对我专注于这一深奥且前途不明的研究所做的确信不移的支持。

序 言

一个最出名的国际关系专家曾经把主权描述为一个“令人厌烦”的概念。^① 这一说法千真万确，不过我希望能够表明它确实是一个值得人们关注的概念。它困扰着我们的政治家们，困扰着公众和学者们，同样也长期困扰着我。

像其他许多学者一样，我也把和其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会议当作现实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从中我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教训和启示。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个国际性会议，期间我发现把主权漠视为一个无一致性概念的企图最终遭到了抛弃，那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经历。对主权的反对被归因于对其概念简单化的理解，而这一概念建立和发展得如此成熟以至于难以被轻易抛弃。难道主权存在的现实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联合国宪章的第二章宣称其所有的成员都拥有平等的主权，而且，根据在过

^① Kenneth Waltz, cited by Justin Rosenberg, *The Empire of Civil Society* (London: Verso, 1994), p. 127.

主 权

去几十年间在国际法上被确认为主权国家的数目，主权概念变得比以往更加流行了。

我的批评是正确的。主权不能被抛弃，而且在这本书中我将提出主权这一概念不应该（实际上也难以）被抛弃。同时，使其变得特别麻烦之处在于它所引起的分歧。围绕主权概念展开的争论是如此之重要，所以我用了第二章的全部内容来讨论这个主题。也许有人会认为主权概念是如此具有争议，使得它难以得到界定。他们暗示，主权与我们关于意义和真相的观念纠缠在一起，所以，试图对主权进行界定就像要一个信徒去定义上帝一样。你如何能对分类的创造者进行分类？

主权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我同意这样的观点——但它仅仅是和国家联系在一起时才是如此。我更加确信主权和国家的联系使我们触及到了这一问题的核心。国家主义的主权观显然是我的研究陷入麻烦的根源所在。毫无疑问，在前面提到的1992年那次会议上，我对国家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是我坚持这样的观点，国家和主权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要批判其中一个时，必须批判另一个。在那以后不久我写下“超越国家”之时，^①我依然把主权和国家看作是密不可分的。然而现在我承认，就像我将要在这本书中讨论的那样，在国家和主权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必须被切断，而且，当这一联系被打破以后，主

^① John Hoffman, *Beyond the State* (Cambridge: Polity, 1995).

权的概念就能够被重建。^①

在第二章我承认，像其他的政治概念一样，主权常常会引起人们的分歧和争论。但是我必须区分让人混淆的争论和启发性的争论，并且认为当主权从国家中分离出去以后，它扮演的才会是一个启发性的概念。正如我在第三章指出的，那些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所谓的现实主义学派的信徒们却把国家和主权之间的联系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当主权面临争议时，他们也就陷入了麻烦之中。而且任何把主权和民主，法制，自治和自由这些被他们视之为国内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企图都会使主权的概念陷入冲突之中，而这种冲突已经导致了放弃主权的主张。现实主义者 also 认为主权概念可以免于争论，但只有当我们把主权的分析限定在国际关系领域时，这才是可能的。

阿兰·詹姆斯（Alan James）关于主权的著作是一个现实主义理论的杰出代表：主权概念最好被限制在正式的范围中。^②詹姆斯敏锐地觉察到，在国际领域，国家相互影响着，谁也不能随其所愿。因此，主权并不能意味着诸如自治，政治独立或免于约束之自由等独立的存在。他认为，主权概念不过是一个法律术语，其仅仅是表明了宪法和制度上的独立。我会在第三章提到，这似乎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困境的路径，尽管它又引起了更多的问题。比如：当特定一国的主权遭到宪法上未得到

① Laura Brace and John Hoffman (eds), *Reclaiming Sovereignty* (London: Pinter, 1997). Laura Brace thought up the title.

② Alan James, *Sovereign Statehood* (London: Allen&Unwin, 1986).

主 权

承认的另一国挑战时，会发生什么？和其他现实主义者一样，詹姆斯不得不又退回到了这一论调之上：国家的有效性最终取决于什么？能够灵活实施、垄断合法强制力的组织就是主权。

但是，我认为这些使得现实主义者陷入了他们想竭力避免的争论之中。因为，使得国家陷入激烈争论中的原因正是其宣称拥有了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拥有的合法暴力之垄断权。实际情况是，只要国家本身受到质疑，现实主义者就只能处于无休无止的争论中。

现代性与合法性

通过主张主权是现代国家的产物，可以对国家和主权两者之间之必然联系的传统理论提出挑战——主权并非国家与生俱来的产物。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主权被证明为现代性独有的产物，那么在前现代国家就会不具有主权，而且，在后现代也可能有无主权国家的存在。而这就需要超越受到质疑的国家自身进行审视。

在第四章我提出，必须以历史的视角来分析主权。我承认国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并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主权。但是只有我们承认所有国家声称对强制力的合法垄断（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我们才能理解这一点。并且也就是对国家强制力合法垄断的宣称使得国家出现了主权。远古的希腊人早已对统治者的最高权力进行过注解，这也是后来中世纪思想家们的不懈追求。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即在前现代的文献中从未出现过

主权一词（实际上国家也是如此），但这并不等于说，就是因为主权国家仅仅清晰可见地出现在现代时期，那么在此之前主权国家就根本不存在了。实际上，主权概念是为欧洲 16 世纪乃至更远古的思想家们一脉相传下来的，也只有注意到了早期国家主权概念形成和演变的这一方式，我们才可能更好的理解主权概念。

我并不否认在现代的语境下分析主权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如果要想弄清楚现代的主权概念，我们必须更广泛的吸收关于国家主权的观点。从一开始，现代主义就使国家主权的概念成为一个潜在的重大问题。现代主义者坚持认为主权是绝对的和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但同时，他们又主张权力必须得到限制。这是两种特性的结合——其中的每一种特性都得到了平等的强调——这使得该概念如此自相矛盾。现代性对于主权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并不仅仅是因为主权概念是现代的理念，而是因为通过宣称主权既是绝对的又是受限制的。现代主义者能够使我们明白：当我们把主权和国家联系起来时，它就成了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

在第五章我将探寻主权与合法性和强制力的关系。自从现代主义通过确认个人权利来寻求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伊始，现代主义就明确的把注意力集中在主权与合法性和强制力的关系上。合法性来源于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但问题是：如果主权是国家通过宣称对合法强制力之垄断实现的话，那么对主权的限制又何以可能？

“合法的强制力”在语义上是自相矛盾的。基于合法性概

主 权

念之上的权力限制为个人的自由行为，意愿表达和行动偏好提供了一个空间。但恰好是这个空间往往会遭到强制力的侵害。现代主义者承认权力和自由之间存在的冲突，可是他们更确信国家的强制力是获得秩序不可或缺的保证。这一理论在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那里得到了经典的阐述，然而现在它却不得不面临挑战了。我从战后人类学那里得到的证据表明：自远古以来，人们可以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管理好他们自己。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把强制力依赖为解决利益冲突的途径。

为了理解这一途径是可能的，我们需要对国家（state）和政府（government），强制力（force）和强制（coercion）进行区分。政府已经完全卷入到利益冲突的调解中，在另一方面，国家寻求用强制力的方式来解决争端。然而，我承认强制隐含于所有的社会关系中，在第五章我将说明强制和强制力的不同之处。即便是处于强制之下时，人们仍然保有自主行动，进行选择 and 享有自由的能力，然而当强制力被使用时，这些体现人之主观特性的东西就会遭到摧毁。强制力将会使胜利者和受害者非人性化。因此，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对强制力之滥用会损害每个个人的合法存在。

民主，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三种观点对国家主权概念构成了特别的挑战。我将专章分别对它们进行详细的讨论，因为每一种观点都在超越国家的基

基础上建构了主权概念，并提供了相应的论证。

民主的论点常常被用来表明国家主权和现代世界是不相关的。但是，此观点的问题在于如果民主被定义为一个自我治理的国家，那么大众的统治被认为是通过压制性的等级制度和组织来实现的。比如在联邦体制中，只要他们不允许分裂，就不会放弃国家主权的原则，他们是如此强调宣称合法强制力之垄断的国家。他们还认为，从国家的视角来定义人民是十分意识形态化的。正如美国民主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吸纳所有人参与政治的期望实际上是大部分人被显而易见的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

在第六章我还会讨论民主依赖于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的观点，而这种主权往往被认为是压制多样性和多元性的。这个涉及到我称之为“专制”的问题在于，它混淆了民主和国家，并且难以弄清楚对强制力必需的质疑是我们把政治看作为解决冲突之折中办法的惟一可能。问题的关键不在民主或者是人民主权而在于国家。

这就是为何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关于全球性民主（cosmopolitan democracy）的重要理论陷入困境的原因所在。他把主权定义为一个包括了国际性、地区性和地方性联系的权威，同时，他又把国家和主权一体化。^① 结果是政治和国家都以一种自我矛盾的方式呈现出来。政治有时被视作为以国家为中心的，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它又被视作为一个强化个人自由

① David Held,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Cambridge: Polity, 1995).

主 权

和自治的社会过程。他的一些观点表明国家是一个宣称垄断了强制力的组织，而另外一些观点把国家仅仅视为一个管理和统治的国家组织。这种混淆导致赫尔德在其所倡导的全球性民主中不得不对人民主权加以限制。最难处理的“另一部分人”需要被排除在民主过程之外，而且，除非所有的人被告知和执行，不然自由和自治只是一个难以在现实世界实现的理想罢了。

如果民主是一个试图向国家主权发起挑战的概念，那么女权主义就是另外的一个。但是，女权主义已经变得如此多样化以至于很难弄清楚能否表明女权主义者在主权概念中的位置。在第七章我提出女权主义被最恰当的定义为对父权制的全面批判。不过当这一尝试成为一个孤立的因素时，女权主义具有的有助于解放的逻辑会遭到破坏，所以必须强调有助于作为整体的女性自由和自治。

女权主义鲜明的反对国家的等级制度和父权制度。不可否认，确实存在是否需要女权主义国家主权理论的争论，但是，我认为这回避了对国家起源的批评，而这种国家来源于难以区分的作为强制力表达的国家主义和作为涉及管理行为的政府之间的区别。只有通过质疑国家本身才可能厘清主权与自由和自治关系，彰显作为自主和等级国家的主权特性。

凯塞琳·琼斯（Kathleen Jones）令人叹服地提出了“同情

性权威”(compassionate authority)之概念,^① 她同时还把主权视为一种与生俱来的父权。但是我们为何不能重建主权概念使其赋予作为“另一部分人”的女性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呢? 主权并不必然意味着统治和压迫。主权能够被“女性化”(feminized)并吸纳影响着他人的个人权力, 其中个人的自尊和自信会得到强化而非削弱。这同时也体现了建立自由传统的重要性。一方面, 自由主义通过强调个人权利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 自由主义也承认了国家存在的必要性, 它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自由主义把人们设想为原子式的, 拥有私有财产的个人, 而这些个体的自由之保障依赖于对他人妨害的排除。一些女权主义者使用的“自主权”(self-sovereignty)一词是个很重要的概念, 但是它需要通过对国家惯有的压迫性等级制度之质疑进行注解。

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与民主理论一样对主权的概念发起了挑战。我把后现代主义视作为一种颠覆性的逻辑, 这一逻辑反对基于抽象概念和思维基础上的静止观念和等级秩序。后现代主义者特别关注他们所称之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以排他和割裂的方式表述概念范畴, 所以它常常意味着, 如果一方是对的, 那么另外一方肯定是错的。没有宽容, 也没有妥协和折中的余地。在第七章中, 我指出作为现代性理论表述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对于描述国家的现状十分贴

^① Kathleen Jones, *Compassionate Authori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3).

主 权

切。因为国家的存在仅仅是由于宣称了合法强制力的观点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他们提前预设了那些必须加以排除的存在。

但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不仅仅对于国家是个问题，它对于那些以抽象和任意的方式来反对国家的人来说也是一个问题。后现代主义反对采用“英雄行为”（heroic practice）的批判方法，因为这一方法本身是无法实现超越的。一个对国家乌托邦的否定和一个现实主义的狂热一样是空洞无益的，并且，许多寻求解放的幻想者都期望想象中救世主的灵丹妙药能为现实问题提供一些虚幻的解决之道。

对国家主权的挑战还包括“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一种从事物内部对其进行批判的方法——因此国家主权自身在现实世界中出现了可替代的选择。但是，并非所有的后现代主义者都以一致的解构方式进行批判。一些人通过倡导对现代性进行清算的相对主义，但实际上却是从表面的颠覆性立场上退却了。我认为，如果我们承认现代主义的理念和制度的话，解构仅仅有助于后国家主权概念的发展。现代主义者关于国际社会是由主权国家构成的观念保留了其颠覆性概念的种子，因为一旦我们承认所有国家的行动都会受到其他国家制约的话（它们是平等的主权），我们就能对国家主权概念本身产生质疑。如果后现代主义包括了超越现代性的运动（如其口号表明的那样），那么它必须赋予现代性以权力（也就是承认其集中性）从而解构主权国家。

重塑自由主义——联系的观点

我先前提到过我参加一次国际性会议的难忘经历，那次会议改变了我轻视主权的态度。却也给了我两点特别的启发，它们给了我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之道，这也是我对他们记忆犹新的原因所在。

第一点就是我所坚持认为和国家一体的主权已经被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设想出个人也能够享有的特性。第二点是我根据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方法所表述观点的主张。即霍夫曼法则，基本上可以表述为“我联系，所以我存在”（I relate, therefore I am .），这也成为群体之成员个人有趣的标志。

现在，我终于明白，主权的个人主义特性之洞见为主权和国家剥离开启了大门。在第六章我提到，一些女权主义者所倡导的自主权很明显的和国家主权处于紧张之中。在第八章我认为个人主权（individual sovereignty）的概念内生于自由主义的传统之中，并为后国家主权概念的发展提供了关键性资源。然而个人主权的问题在于其历史上是按照自然主义的潮流进行构建的，也就是说个人具有不随历史变化而变化的国家本质。像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和卢梭（Rousseau）这些自由主义大师们，都把个人视作为人身和财产的私人所有者，个人被描述为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这意味着个人将会不可避免的同他人发生冲突，那么国家强制力的出现和使用也就是应

主 权

有的题中之意了，而个人主权则不得不在国家主权的救济和保障下才能得以存续。

很显然，后来的自由主义者抛弃了本质主义的国家观和契约的国家理念。但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只是简单的从一个自然主义下构想出的个人转移到一个自然主义下构想出的国家。在个人主权和国家主权之间仅有的张力消失殆尽。同时，由于承认了个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个人，使得通过个人主权来分析相互冲突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密尔的《论自由》（*On Liberty*）在这方面作出了极为精彩的阐述。^① 对于密尔来说，他探寻的不仅仅是社会压力影响个人行为的方式，而且向认为人的本质是静止和不会发展的观点发起了挑战。密尔进而追问道，个人能否拥有终结国家主权的自主性权利（sovereign right）——一个极具革命性的观点，向自然主义的个人自由概念提出了委婉的质疑。

尽管自由主义承认国家之必需，但是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却全然不同意这一说法。然而，由于他们通过自然主义的假设来主张最小化国家，从而不可避免的使得主权国家得以存续。无政府主义者以自发和反叛的概念从社会中抽象出个人，从而混淆了政府（government）和国家（state），强制力（force）和强制（coercion）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具有自然主义特征的概念：无产阶级，产品和共产主义，并因此要以唯物主义者的逻辑进行奋斗并求得解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政府

^① 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

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无法为国家提供一个真实的替代物，因此他们所采用的主权性个人（sovereign individuality）概念仍然具有等级和压迫的内在特性。

在第十章中我将寻求提出一个联系的主权观，这种观点和我们前面论证过的观点紧密相关，同时又避免了它的不足。这一联系的主权观首先必须是现实主义的，它必须考虑现实世界中主权国家的突出地位。国家主权所依赖的形式上的平等标准是这种理论的核心。如果国家主权始终平等的发挥着作用是历史事实的话，我们就可以否认国家间的不平等状态，或者是以国家主义的标准来衡量那些没有主权的国家。

同时，如果我们要试图超越它的话，就只有承认国家主权是一个既存的事实。同时，如果主权国家热衷于合法性的话，那么他们势必把主权与个人的地位和权利视为一体。但是如果明白主权的特征是通过相互联系表现出来的话，自主性个人就只能在非自然主义（non-naturalist）的语境下进行分析。这种相互关联性是历史的、变化的，前后联系和多层次的。尽管现代主义者把主权看作一个绝对的概念是合理的，但是一个绝对主义者的主权观点如果没有被限定在特定时期里，体制下或地域内的话，就需要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理论来进行支撑。那是因为这种联系性是多重的、动态的和普遍的，因此主权概念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

如果不断的对主权进行扩展的话，其概念也包括人和更广泛的自然界的联系。人类的安全也就是自然界的安全。只有不摧毁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我们之间的联系，和外界的

主 权

联系才是可能的。人类能够控制那些受制于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外部因素，而这些外部因素也必须是受到他们尊重和考量。

这种联系的观点还必须避免不是以现实世界为出发点的视角。需要一种乌托邦式的现实主义（utopian realism）方法，以此方法，主权国家自身能够巩固共同利益，而这种共同利益使得解决冲突以后国家形式更为有效。如果关于主权国家地位的意识萌发以后，那么就像它常常发生的那样，会面临着暴力，不平等和剥削的问题。主权的状态会演变成为允许个人进行自治的政府过程。但是，如果我们把主权国家视为一种能够使主权在向自主性政府（self - government）的转变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之组织的话，主权国家就可能会被解构，就能够被女性化和民主化。

编辑启事

从我们角度看，出版业的目的可以简约为一句话：让更多的人分享有价值的思想。所以，我们不仅坚持一贯的主推严肃学术作品的出版宗旨，而且，在将来的岁月里，更会奉此为圭臬，倾力推介品质优良的学术著作，以促动中国的学术繁荣和人文复兴。

不过，由于我们的学养和视野的局限，常常会犯遗珠于外、奉蔽为珍的错误，以致贻笑大方。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获得知识界的援手，也企盼得到真知灼见者的棒喝。如果各位读友有具价值的学术作品的选题，或者建议（当然更欢迎直言不讳的批评），甚至只是一些闪光的想法，请不要吝惜，提供出来与我们一起共享，（一经我们采用，提出者将获得我们赠送的数量不等的学术图书，书目见附录）一齐推动中国的学术出版事业的进步。

同时，我们经常接到一些读友的反映，说有些书难以买到。所以，我们开通了学术图书的直销渠道，各位读友可以任意购买附录中开列的图书。购买方法是：通过我们直销通道，请读友将需要的图书书目告诉我们，我们会立即回复告知是否有存余。如果有存余，请购买者将书款汇给我们并告知邮寄地址，我们接到书款后，立即安排邮寄和开具收据发票。凡购买我们图书者，均免除邮寄费用。一次性购买图书金额在 40 元人民币以上者（含 40 元），将享受 75 折优惠，同时免除邮寄费用。

建议通道:

联系人: 崔文辉

电话: 0431 - 5378029

e-mail: cui1209@sina.com

通信地址: 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吉林人民出版社
学术著作出版公司

邮编: 130022

直销通道:

联系人: 崔凯

电话: 0431 - 5378030

e-mail: cuikai1502@163.com

通信(汇款)地址: 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吉林人民
出版社学术著作出版公司

邮编: 130022

吉林人民出版社学术著作出版公司全体同仁 敬启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坚守主权 1

第二章 现实主义和国家 17

第三章 现代性的问题 35

第四章 合法性与强制力 52

第五章 民主 70

第六章 女权主义 87

第七章 后现代主义 104

第八章 自然主义和个人主权 121

第九章 联系的主权观之阐述 137

译者后记 155

第一章 坚守主权

主权概念已经在公众争论的领域中得到复兴。它已成为冷战后全球政治发展分析的核心概念，而在英国这一趋势涉及到了热衷于欧盟（EU）内部更大规模的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和主权相冲突的问题。单一货币的使用将导致英国主权的丧失吗？更加一体化的欧盟对于英国的利益是否更加重要？因此人们很热衷于讨论英国的主权问题。

主权是一个极富争议性的词语。不仅仅是政治家们在讨论它，在学理的层面上它也常常引起人们的争议。^① 但是，这难道就是放弃使用它的理由吗？我将提出我们应该坚守主权：其充满争议并不是放弃它的理由。我认为，问题的起因在于主权和国家的联系。正是国家导致了这些极具破坏性和迷惑性的争议。为了把其定义为一个具有启发性而不是迷惑性的概念，主权应该同国家分离开来。

^① Alan James, *Sovereign Statehood* (London: Allen&Unwin, 1986), p. 3.

放弃论概述

著名历史学家 E. H. 卡尔 (Carr) 的著作在二战前就曾预言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主权会变得越来越模糊。他认为, 问题的原因在于主权概念总是根据由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外部的和内部的主权形成的差别进行划分。^① 简斯·巴特森 (Jens Bartelson) 引证卡尔和斯坦利·本恩 (Stanley Benn) 的观点认为, 二战后主权一词至少在六个不同的意义上正在被使用。尽管存在诸多质疑, “模糊” (blurring) 的区别还是在不断的获得。民族国家的主权 (National sovereignty) 已经区别于传统上作为地域的国家主权 (state sovereignty)。正如近来一系列的论述中有七种不同定义的主权概念被明确引用。^②

接下来的问题是, 如果主权已经逐渐变得模糊和难以区分, 我们是否应该停止使用这一术语? 我将这一观点称之为“放弃” (abandonment) 的论调, 当然它也是斯坦利·本恩的观点。在这些

① E.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1919—1939*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78), pp. 230—1.

② Jens Bartelson, *A Genealogy of Sovereig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3; Stanley Benn, ‘The Uses of Sovereignty’, *Political Studies*, 3: 2, 1995, p. 122. See Samuel Barkin and Bruce Cronin, ‘The State and the Nation: Changing Norms and the Rules of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8: 1, 1994. Also Michael Newman, *Democracy, Sovereignt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Hurst, 1996), pp. 5—8. Here he distinguishes between *state* sovereignty, *legal* sovereignty, *popular* sovereignty, *popular state* sovereignty, *shared* sovereignty and *divided* sovereignty.

不同的用法之间实际上并没什么区别,他主张这是一个应该抛弃一个如此变化多端的词(for giving up so Protean word)的时代了。^①这个概念是如此的模糊不清所以这样的术语最好被抛弃——同样的观点多年以后也为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所重申。辛西亚·韦伯(Cynthia Weber)引证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的理论也得出了同样的观点。^②不久前米歇尔·纽曼(Michael Newman)得出结论说,主权概念已经被扭曲得模糊不清,它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我们进行分析和研究的障碍。^③

主权概念上的混乱也意味着该概念面临的争议。按照 W. B. 盖利(W. B. Gallie)的经典理论,当同一术语的不同涵义通过相冲突的论据,逻辑与合理性引证和阐述时,争议就出现了。但是仅仅因为一个概念是富于争议的,我们就应该随波逐流并因此而放弃它吗?盖利同样把民主视为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④这样对主权的类比是富有启迪性的。两个概念蕴含着相互冲突的内涵,但这能构成我们停止使用它们的理由吗?

主权逐渐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争论焦点的事实使得对主权概

① Benn, 'The Uses of Sovereignty', p. 122.

② Aron is cited by James, *Sovereign Statehood*, p. 10, and Hass by Cynthia Weber, *Simulating Sovereig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

③ Newman, *Democracy, Sovereignt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p. 15. See also Christopher Lord, 'Sovereign or Confused? The "Great Debate" about British Entry to the European Community Twenty Years 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30:4, 1992, p. 420; Philip Lynch, 'Sovereignt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Eroded, Enhanced, Fragmented' in Laura Brace and John Hoffman (eds), *Reclaiming Sovereignty* (London: Cassell, 1997), pp. 43—4.

④ W. B. Gallie,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56, 1995—6, pp. 184, 188, 193.

主 权

念的澄清显得尤为重要。然而一些人认为在诸如 1992 年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Maastricht),^① 欧盟一体化高歌猛进的背景下强调主权的做法和时代潮流是背道而驰的。另外一些人则积极寻求使用这一概念,这在我看来无疑是正确的。正像民主一样,主权肯定也是一个需要从众多(如果不是全部)政治光谱 (political spectrum) 进行估量的概念。如果这将使得它变得含糊不清的话,我们也应该勇敢地面对这样的挑战。

按照这种论调,它的支持者可能会理所应当地得出结论说:之所以反对主权是因为他们能看到一个更强大的欧盟。但是这样的回应是缺乏说服力的。詹姆斯早在 1986 年就阐述了“欧盟更大的主权”之观点。甚至有人认为随着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欧盟将强化英国的主权,纽曼自己也承认英国的主权实际上可以通过与欧盟的整合和一体化而得到强化。^②

毫无疑问,如今围绕主权展开的争论加深了这一概念的不确定性,詹姆斯就曾强烈的指出这一“智识的困境”(intellectual quagmire)已经威胁到了主权的强化。^③ 但是仅仅因为其冲突的内涵就简单的加以放弃,必将会导致忽视现实世界中政治实践者们的当务之急,它同样还导致了对一个经常遭到忽视的问题置之不理:那就是为什么,以及在什么程度上主权是一个

① Newman, *Democracy, Sovereignt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p. 1.

② James, *Sovereign Statehood*, pp. 1, 250; Paul Taylor, 'British Sovereignty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What is at Risk?', *Millennium*, 20: 1, 1991, pp. 79—80; Newman, *Democracy, Sovereignt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p. 3.

③ James, *Sovereign Statehood*, p. 13.

充满争议的政治术语？

国家和放弃论

我将指出主权特有争议的本质来源于它与国家的联系。F.H. 辛斯利 (F. H. Hinsley) 关于主权的经典分析莫基于主权概念与国家的本质、起源和历史紧密联系的假设之上。鉴于把主权定义为“社会中最最终的，绝对的政治权威”，他理所应当的认为这个最终的，绝对的社团就是国家。他始终坚持，国家是主权概念必需的前提条件。^①

近来的评论家也同意此说法。巴特森认为关于主权的理论和国家的问题如此纠缠不清，所以不可能在不涉及主权问题的情况下对国家进行界定。韦伯开篇就提出他的问题：有人能够不从给主权下定义而开始探讨国家吗？两个概念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她发现把二者联系在一起称之为“主权国家”是如此的合理——詹姆斯同样在他的概念分析中使用了这个术语。^②

我想指出的是，主权如此充满争议是因为国家本身就是充

① Ibid.; F. H. Hinsley, *Sovereignty*, 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 Michael Fowler and Julie Bunck subtitle their recent book 'The Evolu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while contending that 'sovereignty arguments stress the just and legal sanctity of the state': Michael Fowler and Julie Bunck, *Law, Power and the Sovereign State*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57, 163.

② Bartelson, *A Genealogy of sovereignty*, pp. 1—2; Weber, *simulating sovereignty*, pp. 1—3.

主 权

满争议的。戴维·伊斯顿 (David Easton) 明确的把国家难以琢磨的本质和主权难以琢磨的本质加以结合,^① 直到二战以后伊斯顿和他的行为主义政治理论流派才放弃了国家和主权的概念。而且, 并非只有他们才选择了这样的做法。语言分析学家在寻求澄清概念的过程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他们认为国家和主权是产生于政治实践中的“首要顺序” (first order) 问题。他们并不是具有哲学色彩的问题, 而是需要进行学术分析的问题。而一些激进主义的理论家出于不同的原因也同样也主张放弃论。他们声称国家和主权的概念都按照一种标准化的方式加以运用, 而这种运用具有明显的保守特征。

所有主张放弃主权概念的观点都认为主要是因为国家的难以琢磨, 倾向性和抽象性导致了这一结果。国家主权要不与可验证的经验分析和无价值判断的假设相冲突 (行为主义者的立场), 要不就是妨碍了我们对所用术语概念纯洁性的追求 (语言分析学家的争议), 或者是侵犯了追求更多参与和更大自主生活的基础 (激进主义者的观点)。总之, 对主权概念的反对也许不同, 但都是殊途同归。^②

① David Easton, *The Political System*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53), p. 108.

② John Hoffman, *Beyond the State* (Cambridge: Polity, 1995), pp. 20, 23. For yet another variant of the abandonment thesis, see Charles Beitz, 'Sovereignty and Morality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David Held (ed.), *Political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1991), p. 254.

远离放弃论

尽管存在如此之多的质疑，但是反对放弃论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主权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现实世界里。试图忽视主权的做法就和试图忽视国家的存在一样毫无意义。当 19 世纪 80 年代“国家回归”（bring the state back）的论调出现时，它也彰显着主权的复兴。关键在于尽管主权的概念或许是模糊不清的和抽象的，但是从没有放弃论者否定过国家和主权的存在。谁又能拒绝承认主权国家依然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呢？

毋庸置疑，诸如伊斯顿的行为主义者一直在寻求一种试图无情的把国家和主权的概念从政治理论中抹去的方法。但是他的观点表明了（也许是无意的）“为何不管我们尽力地把国家主权从前门推出去，它总是不可避免的又从后门溜了回来”。伊斯顿更喜欢用政治系统一词来替代国家，并把其定义为“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但是正如他指出的那样，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之观点只有在我们把政治系统设想为一个主权国家时才会有意义。^①

在后来的著作中伊斯顿把政治系统定义为一个体系，“其

^① I have explored the problems with Easton's analysis in more detail in John Hoffman, *State, Power and Democracy* (Brighton: Wheatsheaf, 1988), pp. 25—8; and in Hoffman, *Beyond the State*, pp. 26—8.

主 权

中的决策为始终休戚相关的大部分社会成员作出”。^①但是这仍然存在疑问：为什么有些人遵从这些决定而有些人却无视这些决定。即便是后来的行为主义者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把拥有使用强制力之独占性权利的体系视为政府。^②但这一定义只是术语上的变化并没有消除主权国家的制度性现实。实际上，伊斯顿承认国家从来没有真正淡出过他的分析，这一观点随后得到了其他行为主义者的响应。^③如果这种宣称拥有使用强制力管制社会事务的排他性垄断性权利确实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正视主权国家的现实存在，而不论我们喜欢赋予它怎样的特性。

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在保留国家这一概念的同时抛弃主权的概念。但是只要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这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虽然放弃论者始终认为如此多样化的，割裂的和不确定的国家是难以作为一个实体出现的，但他们却没有否认过国家的存在。^④如果国家确实存在，我们确信它至少会宣称拥有主权的权利。试图抛弃国家概念的失败强化了主权问题的需要，尽管这一术语可能是含糊不清，似是而非和充满争议的。正如巴特

① David Easton,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Struc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 3.

② Robert Dahl, *Modern Political Analysis*, 4th ed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84), p. 16.

③ Hoffman, *Beyond the State*, pp. 30—1.

④ Rosemary Pringle and Sophie Watson, 'Women's Interests' and 'the Post-structural State' in Michèle Barrett and Anne Phillips (eds), *Destabilizing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1992), p. 63.

森的观点，那种试图在国家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回避主权的做法只会导致这一概念的残缺不全。^①

不可定义论

一些理论家承认主权的存在，但他们却认为虽然不应该抛弃这一术语，但是却难以对其下定义。我把这种观点称之为“不可定义论”，它主要为那些被称之为后现代主义者或者是后结构主义者的人所持有。

在我的认识中，这一类的后现代主义者承认主权的争议本质，^② 他们也明白主权和国家之间的联系是该概念充满争议和含糊不清的根源所在，这也使得主权成为一个疑问不断的概念。比如，巴特森认为我们无论是着眼于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强调国家格局的宏观社会学，还是那些（比如安东尼·吉登斯）在他们的社会分析中寻求结构和机构一体化的见解都被所谓的“关于主权国家的智识偏见”（intellectual prejudice of sovereignty state）所蒙蔽了（巴特森引自

① Bartelson, *A Genealogy of Sovereignty*, p. 1. If we were to abandon all contested terms in political science, it has been drily observed, 'the field would be severely impoverished': Marc Williams, 'Rethinking Sovereignty' in Eleonore Kofman and Gillian Youngs (eds), *Globalization* (London: Pinter, 1996), pp. 112—13.

② Bartelson, *A Genealogy of Sovereignty*, p. 12; Weber, *Simulating Sovereignty*, p. 3. I have also looked at their arguments in John Hoffman, 'Can We Define Sovereignty?', *Politics*, 17: 1, 1997.

主 权

马丁·怀特)。①

但是如果后现代主义者把主权极具争议的主权特性和国家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话，为何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坚持认为主权之概念是难以确定的了？韦伯认为并非是要弄清主权本质上的涵义，我们要做的是检验这么一种方法，当国家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时理论家和外交家们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获得一个“确定”的概念。当我们谈到主权时，我们所指向的只是一个国家过去把自己视为一个主权实体所建构出来的特定概念。这里并没有什么“真实的”（real）或者是“正确的”（true）主权概念。② 巴特森表示赞同这一观点，认为主权的概念受到知识观念的限制，而我们通过知识所表达的意图却依赖于我们对现实存在的认识，即由现实存在的主权所决定。主权将决定什么是可知的，什么是正确的以及什么是存在的。巴特森认为既然主权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前提条件，它也不可能是我们所认识之对象的一部分。正如一个问题总是无声的隐藏于质疑的行为中，它是一个难以进行界定的概念。③

巴特森借用康德（Kant）美学论文中的“副品”（parergon）一词把主权比作一个正在进行架构的构架。既然主权构成了认识和真相的基础，它就不可能成为其所建构对象的一部分。它既然是所有本质的前提条件，它本身也就没什么本质可言。不

① Bartelson, *A Genealogy of Sovereignty*, pp. 28, 48, 50.

② Weber, *Simulating Sovereignty*, p. 10.

③ Bartelson, *A Genealogy of Sovereignty*, pp. 1, 6, 49.

要试图去说明主权是什么，我们应该在其他人试图去回答这个问题时审视会发生什么。^①

主权及其意义

韦伯和巴特森为论证其不可定义论而提出的问题极具启发意义，因为这些问题是我们把国家和主权二者联系在一起时必须面对的问题。韦伯基本上展示了国家无非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组织而已。

韦伯认为，如果要以国家来定义主权，我们就必须指出国家对其领土和人民享有绝对的权威，国家代表（represents）人民行使这一权威，而人民则构成了一个以国家边界来进行标识的地域共同体。但是当人们违反法律的时候，国家的主权就会受到持续的挑战。或者是当非法移民进入到一个不应该由他们居住的社会时，这个标识着共同体的领土边界就会不断的遭到侵犯。^② 换言之，通过国家把主权定义为一个界限明确，法制良好的共同体存在很大的问题。韦伯进而通过对代表理论的全面批评而试图不主张对主权进行界定。她认为，实际上是声称代表着人民共同体的国家组织建构了他们所声称代表的那个共同体。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指称的荒谬”（self-referential）。这不是一个单纯概念的荒谬，它是国家主权实践的谬误。但是

① Ibid., pp. 2, 51.

② Weber, *Simulating Sovereignty*, p. 5.

主 权

如同韦伯所说，如果国家是荒谬的（我相信也是如此），这种荒谬为何没有影响到对主权的界定？

韦伯和巴特森反对给主权下定义——反对所有的定义——因为他们认为定义暗含了在语言和存在物之间的代表关系。巴特森指出，界定一个术语的行为往往假设了语言是一种明晰的媒介，它能够反映认知主体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无论主权代表的是此在的现实，或者仅仅是一整套标志着独立国家的司法制度，而它包含的只是一些流变和含糊不清的制度。正是这种流变性和模糊性使得主权充满了争议。作为一个理论混淆的根源和政治斗争的焦点，主权不可能得到界定。^①

但是在赞同巴特森和韦伯主张不应该放弃有争议的问题时，我们如何能够不对其进行界定进行应对呢？这一困境出现在盖利争议性问题的最初阐述中，盖利自己也承认，我们没有办法去评价一个争议概念的竞争性价值。如同约翰·格雷（John Gray）所指出的“这儿也许会存在一些争议性概念的严重错误，但这种错误不是生来就能够以胜利或失败来衡量的”。^② 盖利的观点是奇怪的失败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论调，这种概念怀疑论似乎与行为主义和语言学之价值中立和概念纯洁

① Bartelson, *A Genealogy of Sovereignty*, pp. 14, 15.

② Gallie,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 pp. 188—93; John Gray, 'Political Power, Social Theory and Essential Contestability' in David Miller and Larry Siedentop (eds),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1983), p. 96. See also Hoffman, *State, Power and Democracy*, p. 9; and Andrew Mason, *Explaining Political Disagre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性的立场产生了分歧，但是在实践中，它同样体现出了实证主义之特性。正如巴特森和韦伯主张的那样，如果仅仅是分析其他外部事物的定义，这将意味着我们将无力对自身作出真实的判断。

国家问题的再探讨

像巴特森和韦伯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发现他们自己已经陷入到不可定义论令人绝望的困境中，因为他们找不到使主权从国家分离的方法。的确，韦伯和托马斯·比尔斯泰克合(Thomas Biersteker)编的一本书近来也提到把国家和主权分离开来的必要性，但这恰好是她的失败之处。国家和主权之间的关系被描述为“相互构成的”(mutually constitutive)，并且当被“暂时性的界定”(provisionally defined)时，它们总是以互为前提的形式出现的。^①

仅仅指出有关国家的争议是主权概念存在问题之根源所在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以一种可能使二者分离的方法对国家和主权进行界定。然而不可定义论的倡导者正确的指出国家的争论消解了主权的概念化，他们设想主权是不可能同时存在于国家外部的。国家的出现是预定的，这里存在着两个不可分开

^① Thomas J. Biersteker and Cynthia Webe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tate Sovereignty' in Thomas J. Biersteker and Cynthia Weber (eds), *State Sovereignty as a Social Constru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 11.

主 权

的逻辑。这意味着主权可想象的惟一形式就是国家主权，而且当主权与认识和涵义联系起来时，这种联系总是以国家主义的形式出现的（我所称做的）。

因此我认为那些持不可定义论的人采用了一种彻头彻尾（top-down）的物质主义世界的观点。他们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无秩序，无定型物质的聚合体，而这样的世界需要概念使之有序化。如果制度是流变和含糊的，那么就会得出无法进行定义的结论。这种失败主义的结论来源于创造秩序和存在准国家（state-like）潮流的假设：现实世界不过是我们所界定概念的产物。作为副产品的主权（借用库德启发性的概念）显示了作为一个神秘创造者的国家是它所有创造物的前提条件，它是意义的起点所在因此不可能是意义本身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为何要假设现实世界的存在奠基于这一彻头彻尾的物质主义潮流之理念之上呢？如同巴特森指出的，如果关于主权的争论因为主权国家智识偏见的影响是令人苦恼的话，特别是如果我们想要解决围绕主权而展开的争论的话，这种偏见显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只有当我们能够以一种超越于国家之上的视角对主权进行定义时，这些争议自身才会不再成为对其进行定义的障碍。

在此，指出“争议”可能会在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意义上被使用是很有帮助的。一方面当它激励我们去解决问题时，争议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理论的刺激因素。而在另一方面，当它得出概念不可能进行定义的令人绝望的结论时，它就变成了理论停滞不前的根源。在第一个意义上，由于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终

将联系在一起，主权会一直充满争议，并且人们会很自然的采取不同的观点看待应该如何管理他们自己的生活。因此无论我们采用什么样的主权定义，终将会引起争议。实际上，政治概念之所以充满了争议仅仅是由于所有理论术语都会影响到人们的利益得失罢了。

那么，为何概念存在的争议会成为不可定义之论调的原因呢？原因就在于第二种意义上的争议是作为一种消极的，破坏性力量发挥作用的。在我看来，国家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只要我们仅仅以国家主义来构想主权的形式，争议就只会以理论障碍而非理论刺激的形式发挥作用。因此，本书致力于寻求主权从国家的分离。我将指出国家作为一个使用强制力保护社会的对立物最终只会去阻止而不是去推动争论。其荒谬性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家宣称其拥有实际上并不拥有（也不可能拥有）的对合法强制力的垄断。^①

所以国家能够也必须得到界定。当然，对国家的界定是让人尴尬的，因为当我们界定国家时，我们就有必要强调其作为一个组织的争议特性，其中的争议性阻碍而不是激励着这一问题的争论。因此这种国家的争议性完全区别于那种有助于推进讨论的争议性。后者是积极的，而前者是消极的。只要能够超越国家是一个争议性组织的现实，我们就能够超越一个面临争议困境的国家概念。

但这并不适用于主权。是主权与国家相联系的事实使得主

^① Hoffman, *Beyond the State*, pp. 65—6.

主 权

权成为一个难以界定和争议不断的概念。只要我们还这样认为，这些争议就会继续遮蔽着主权的概念，就会不假思索的引进国家主义所暗含的专制主义观点和极端观点到我们的概念分析中。而一旦把主权从国家分离出来，我们就能把它界定为一个体现为授权和发展的概念——一个包含了民主，自治和自我管理的概念。当主权从国家分离出来，争议将继续存在，但它将不在是一个概念的困境（conceptually paralysing）。

第二章 现实主义和国家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把主权设想为一个争议性的概念。尽管这种假设的支持者有那些主张放弃使用该术语的人也有那些拒绝对其进行定义的人，但是它却被持第三种立场的人所否认，而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在国际关系领域，这一立场可以被称之为现实主义学派。现实主义学派接受主权这一争议性的概念应该被抛弃的观点，但它试图对主权进行准确的界定，因为他们相信这将有助于把主权概念从争议中解救出来。

现实主义仍然代表着国际关系领域的传统主流理论。^① 其重要性部分的是由于它依然如此具有影响力，但也可能是因为其试图使主权概念免于争论的严重挫折。如同我们将从对阿兰·詹姆斯（Alan James）的详细评论中了解到的那样，这种挫

① Barry Buzan, 'The Timeless Wisdom of Realism?'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8. Given the massive literature on realism Brzan's own bibliography (pp. 63—5) is worth consulting.

主 权

折是极具指导意义的。现实主义者把国家置于他们理论分析的中心。以此方法，他们无意中揭示了主权概念为何被视为如此的充满争议又身处困境。至少他们不太明确地强调了本书的核心观点：即要想使主权成为具有一致性和意义的概念，必须把它与国家分离开来。

分离论 (separatist thesis)

现实主义者主张我所称之为的分离论，因为他们认为主权能够远离争议，而这些争议往往使得主权概念难以得到界定。但是他们认为，只有把注意力严格地限制在国家作为外部世界和国家间行动者的行为上，我们才有可能消除有关主权概念的争议。

为了弄明白现实主义者的立场，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关于主权的奇谈怪论。R. J. B. 沃克尔 (Walker) 认为主权本质上是一个不能争论的概念，其涵义只是那些宪法律师和专家们 (connoisseurs of fine lines) 的细节性争论 (marginally contestable)。这一观点不仅为韦伯所赞同，而且也在巴特森的观点“作为现代政治话语 (political discourse) 基础的主权本质上是不可争论的”之中得到了回应。他认为，

只有在同一话语下的主权之涵义才是可以争论的。^①

该观点听起来很奇怪。主权如何能同时既是可争论的又是不可争论的？现实主义者认为那些发现概念要么是难以进行经验验证的（empirically untestable），哲学性无趣的（philosophically），或者是规范性不可接受（normatively unacceptable）的人都认为主权概念是可以争论的。关键之处在于这些理论家都在政治理论的范围内处理这一概念，而在这里必然会出现争议。正如我所看待他们的那样，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国家关系理论是独立于政治理论之外的。因此，在他们同意在国内政治理论中抛弃国家和主权概念的同时，认为这样的立场同样不会影响学习国际关系理论的学生们。处于一端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另一端的政治理论之间的区别产生于前者是国际的而后者是国内的差异。这样，使前者遭受质疑的争议便不会再使后者陷入困境。主权在政治理论中也许是备受争议的，但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它能够免于争论。

① R. B. J. Walker, 'Sovereignty, Identity, Community: Reflections on the Horizons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ractice' in R. B. J. Walker and Saul H. Mendlovitz (eds), *Contending Sovereignities* (Boulder, CO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1990), p. 159; Cynthia Weber, *Simulating Sovereig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 Jens Bartleson, *A Genealogy of Sovereig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3—14. 'However paradoxical the concept of state sovereignty may seem, it has stood "essentially uncontested" for two centuries or more': Nicholas Onuf, 'Intervention for the Common Good' in Gene Lyons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Beyond Westphalia?* (Baltimore, MD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8.

行为主义和国家的两面性

在这一点上，行为主义者的观点具有特别的启示意义。一方面（正如我们在第二章讨论的那样）行为主义者希望通过提出政治系统作为国家概念的替代物，建立一种新形式的放弃论。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接受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家中心论。

伊斯顿关于“国家已经导致它的两面性”的论述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当国家的概念在国内政治中使用，其应该被抛弃，但在国际关系领域它却一直被用于标识那些标准统一的行动者。在此，大家都公认的主权概念是民族国家的合法表述。^①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即使主权国家在国内政治中已经变得问题不断，它在国际关系领域仍然是免受争议的。

换句话说，行为主义者在国家观上体现出了一种矛盾的态度。国家在被视作意识形态化的，捉摸不定的和模棱两可的同时，也被看作是国际关系领域的关键要素。因此，作为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主要创始人卡普兰（Kaplan）把国家作为其理论的关键分析变量。尽管他和布尔（Bull）都坚持各自的观点并围绕行为主义和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展开了强烈的交锋，

^① David Easton, 'The Political System Besieged by the State', *Political Theory*, 9: 3, 1981, p. 304. This chapter in particular draws upon the arguments in John Hoffman, 'Is It Time to Detach Sovereignty from the State?' in Laura Brace and John Hoffman (eds), *Reclaiming Sovereignty* (London: Cassell, 1997) pp. 9—25.

但他们都认为国家是国际关系领域中最重要行动者。^①

行为主义者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被证实出现在赖特经常引证的观点“国家是一个多变的概念”之中。赖特于1967年把国家和主权这两个已经淡出人们视野的术语联系起来并作为一个概念提了出来。赖特还认为不管国家是否国内性的，它在外交事务中的主权和自治却是毋庸置疑的。当一个极具争议的概念披上令人向往的外衣时，其涵义是如此的直接明了。英国和美国在国内事务中奉行的是无国家态度，但在国际关系中却是不折不扣的国家主义和主权至上态度。^②

伊斯顿和赖特的观点得到了詹姆斯的回应，他认为是由于强调国家的国内本性才使得主权概念陷入到智识的困境中的。他指出，政治思想家们不能够提供一个明确，理性的主权概念是因为他们总是在国内政治的语境下来谈论这一问题。因此，詹姆斯非常强烈地强调在分析主权的时候，“这些政治理论家的论述在他的著作中将毫无立足之地”，^③ 解决这一问题所需的准确、简洁的和无争议的方法就是要求我们把分析专门的集中在国家的外部维度之上。

① 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p. 31; Morton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57); Hedley Bull,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World Politics*, 18: 3, 1966, pp. 361—77.

② J. P. Nettl, 'The State as a Conceptual Variable', *World Politics*, 20: 4, 1967—8, p. 564.

③ Alan James, *Sovereign Statehood* (London: Allen&Unwin, 1986), pp. 7—8.

国家中心主义的政治观

但是也许有人会问：为何国际领域内的主权和国家的分析不是政治理论自身的任务呢？

现实主义者的观点来源于国家中心主义的政治观。如果我们接受主权国家拥有政治过程本质的假设，那么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在国家之外就没有政治。而政治理论就是，也仅仅只能是关于国家的理论。

当怀特（Wight）提出了他那众所周知的质疑“为什么没有国家间理论”时，他大致上指出了政治理论就是国家理论的传统。要使得关于国家间关系的理论真正成为可能，我们必须假设一个世界性的国家，其中民族国家的主权将在国际性的层次上得到再造。既然现实主义者认为（在这一点上很难赞同他们的观点）这样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欲的，我们就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回到怀特具有煽动性的观点之上：因为国家本身就处于政治理论的中心，所以关于国家间的理论是不可能的。^①

国家中心主义的主权观必然会和国际秩序无政府状态的概念化联系在一起。在怀特经常引证的论述里，无政府状态之所

^① Martin Wight,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Martin Wight and Herbert Butterfield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London: Allen&Unwin, 1966), pp. 18, 22.

以出现是因为这里存在着“无政治优先性 (no political superior) 的独立主权国家的多样性”。无政府状态在这里既有了理论的涵义又有了实际的意义。现实主义者认为在国际领域也存在无政府状态是因为不可能建立超越于国家之上的理论。像沃克尔提出的共同体, 由于受到我们政治想象力的限制, 同样被视作为国家之内的产物。国家间存在着一种“永恒的真空地带” (eternally absent)。^① 一个国家间关系的分析能够也应该无需政治理论。

也许可以认为这是一个站不住脚的立场。如果无法建立国际秩序的理论是千真万确的话, 那么对其来说简直就没有什么可以再探讨了, 甚至是国家间的无政府秩序也无从谈起。像我们将要谈到的那样, 即使它寻求无争议主权概念的努力归于失败, 但是现实主义在这里还是展示了一点一致性。因为如果我们设想政治理论仍然把国家视为国内的行动者, 那么它也将认为国际理论的研究实际上也不是其自身的理论。

就现实主义者而言, 强调的是主权国家的现实存在。按照詹姆斯的观点, 关于欧盟的争论本身并不会导致对主权国家的疑问。即使是每一个成员国的主体身份被淹没在新的联盟之中, 他认为那也仅仅意味着在此以前存在着诸多主权国家, 而现在就只有一个主权国家罢了。他觉得 (在一本和罗伯特·杰

^①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London and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7; R. B. J. Walker, *Inside/Outs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ix.

主 权

克逊 Robert Jackson 合编的著作中) 欧洲现在正在发生的变化和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欧洲国家的萌芽, 这一欧洲国家 (最多) 意味着“再造和授权” (realignment and endorsement) 而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地位的衰弱^①。

作为抽象物之国家

尽管认为政治理论的分析陷入了困境, 但詹姆斯似乎承认了其分析的理论本质。他认为对主权一词的反对毋宁是一种纯概念本质的。人们只有通过思维才能把握国家主权, 而学者应该在国家间层面上肩负起梳理有关国家之特性的、看似可信的一般性理论。^② 但这确实是个问题, 因为“一般性”也就意味着同一内涵的多重复制, 所以概念化的表达也就是: 主权国家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现实主义者把国家间领域描述成一个充满着复制性国家的世界。但是在各自的历史方面, 国内社会方面, 和其他国家以及非国家性质的国际关系主体方面, 国家间存在着很明显的差别。现实主义者剥离了国家所有的差异特性后, 给我们留下的就只是一个同一性的主权国家了。他们只强调国家“共性”的

^① James, *Sovereign Statehood*, pp. 31, 252—4; Robert Jackson and Alan James, 'The Character of Independent Statehood' in Robert Jackson and Alan James (eds), *States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p. 8. See also Bruce Miller, *The World of States* (London: Croom Helm, 1981).

^② James, *Sovereign Statehood*, pp. 6, 8.

做法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抽象的层次上，而这使得国家间关系的政治理论显得问题颇多。

毫无疑问，当考虑到国际关系关于权力平衡的理论时，怀特似乎也从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立场上退却。但是，一个“实际地”构想出来的权力平衡的世界只能是一个所有主权国家同一化的世界。在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的行为和人之本性的概念密切相关，即人们受到与生俱来的生理和心理的冲动驱使进行自我表达，繁衍和统治。关键在于这种冲动对所有人而言是普遍存在的——人的这一本性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在国际层面上将遭遇到和个人行为一样的国家行为。当摩根索宣称国家根据一般性社会规则（所有的社会都是由一些自治单元组成是因为这些组成部分本身就是自治性的）行使主权时，国家的行为和人之本性的联系就更加明晰了。^①

自治在这意味着“同一性”，所以如果在理论上我们把他看作是理解一事物和其他事务特定关系的能力，那么现实主义者则否认在他们的观点中具有理论分析的特征。毕竟，他们并不关心那种使得主权国家的特性被与其他主体间关系左右的方

① Wight,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p. 20. Hans Morgenthau is cited by Justin Rosenberg, *The Empire of Civil Society* (London: Verso, 1994), pp. 16—17. See also M. J. Smith, *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 (London: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19; Laura Neack and Roger Knudson, 'Re-imagining the Sovereign State: Beginn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Alternatives*, 21, 1996, p. 136; Stephen Krasner, 'Sovereignty and Intervention' in Lyons and Mastanduno, *Beyond Westphalia?*, p. 232.

主 权

法——其中公民遭受着国内法律的强制力；在国际领域弱小的国家受到欺凌；跨国组织根据自己的经济利益和道德标准影响着国家政策。至于和主权国家分析相关的其他因素——权力、人性、利益、强制力等等，现实主义者认为这些因素并不在于体现了什么区别，而仅仅是强化了国家的“同一性”。

但是一些现实主义者并不承认国家之间存在着区别。摩根索曾指出过美国的越南政策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越南的利益。同时，一个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沃尔兹（Waltz）清楚的指出我们不能假设国家总是能够成功的实现国家安全。正像史密斯所说的，现实主义者经常弄不清权力的概念和实际可行性之间的区别。^① 但是现实主义者的逻辑却再也清楚不过了——国家主义和好战尚武的特性。

因此很难不赞同罗森博格（Rosenberg）的观点，当他批评现实主义者把国家界定为“先于国际体系的实体存在”。国家实实在在的存在着，但是由于国家的内部区别，国家和国家，国家和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差异被概念性的否认了，所以很难建立一种对国家主权进行批判的理论。罗森博格指出，现实主义者试图“实现国家自身行为的合理化”。^② 这是一种无批判性

^① Smith, *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 p. 221; Rosenberg, *Empire of Civil Society*, p. 24. For my purposes, the distinction which Richard Ashley makes between realism and neo-realism is not important. See Richard Ashley, '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 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60.

^② Rosenberg, *Empire of Civil Society*, pp. 28, 31.

的、抽象的国家理论，其使得现实主义成为一种非理论（non-theory）的理论，它虽然包含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概念，比如认为国家主权是世界上最显著的角色，但却从不接受其他批评。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样使得其在理论上难以为续。

詹姆斯的实用性定义：有形式而无内容

在詹姆斯的论述中，他就曾阐述了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现实主义者存在着一种“令人钦佩的一致性”，^① 这一清晰、尖锐的观点使得国家中心主义的国家观极不情愿的披上了现实主义的外衣。

詹姆斯认为，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作为一个外部行动者的行为上时，关于国家主权的争议就会消失。这种国家的行为使得主权的涵义简单明了。主权是国家得以参加国际社会的资格。然而，被称之为“州”的实体也许会存在于像美国这样的联邦体制内，只有具有主权特征的国家才能被赋予像詹姆斯所说的那种参与国际社会的资格，^② 主权包括了宪法性的独

① David Long, *review of Sovereign Statehoo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6: 2, 1987. p. 386. Two writers who see state sovereignty as an irrelevance, still find James's analysis 'the most usefull for contemporary times': Yale Ferguson and Robert Mansbach, *The State, Conceptual Chaos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1989), p. 43.

② James, *Sovereign Statehood*, p. 19.

主 权

立或分立。当国际法赋予主权以权利时，国家被赋予的这一权利恰好就是本已存在的主权。关键之处就在于：主权是国家的一个本质方面，它绝不受其他关系的左右。

詹姆斯认为，宪法性的独立并不是指经济和军事上的平等，也不是指实际的政治独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会意味着此宪法性的独立是一种忽视外部约束的地位。以上论述可以用一句宪法性术语表述为：主权国家是为了掌握它自己的命运——一个对宪法性独立事实清楚而直接的反映。^① 按照詹姆斯的观点，如果我们把主权和诸如忠诚，合法性，民主制度，军事权力，法治之类的实质性概念联系在一起时，那种在国内背景下曾让人困扰的主权又必将会变得充满争议和含糊不清了。

因此这一主权观不得不表现出明确的形式主义特性，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国以主权的結果出现，而非以其判断标准出现。当受到其所属的地区性共同体或国际性共同体的合法约束时，国家仍然是主权性的。实际上，即使是傀儡国家也能够是“主权性”的，因为在宪法形式上他们独立的。关键就在于，如果不能在形式上否认主权，主权就总是从这里开始得到体现。^②

但这确实是个问题。在一个主权肆意横行的世界，我们不得不问：国家最开初是如何获得主权的？而詹姆斯一直在回避

① Ibid., pp. 49, 53.

② Ibid., p. 143.

这个问题。它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辨识主权的问题对那些宪法性独立的国家来说是直接明了的。^① 但是，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在一些主权存在明显争议的情况下对形式超越的需要显得不可抗拒。

作为实体存在的主权

值得称赞的是，詹姆斯确实已经着手研究一些引起主权争议的案例。国家存在于詹姆斯所谓的国际“敌视”（aversion）状态中，这种敌视在像冷战时期的两德之间尤为明显，以及像南非这样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并被国际社会遗弃的孤立国家之中；或者是像伊恩·史密斯（Ian Smith）的罗得西亚（Rhodesia）（津巴布韦的旧称）这样的合法国家（其存在仅仅从 1965 年到 1979 年）。按照詹姆斯的观点，像以上的这些国家都可以说是具有主权的，因为“以事实说话”，他们拥有宪法性的独立，主权表达的是法律性的存在而非实体性的存在。^②

但是当这一法律性的存在自身受到质疑时会发生什么？就以史密斯的罗得西亚为例。这是一个在 14 年的存在中没有得到其他国家承认的国家，并且詹姆斯也承认这一体制是以一种非法（unlawful）的形式存在的。罗得西亚的案例是重要的，

① Ibid., p. 80.

② Ibid., p. 40. See also Alan James, 'Sovereignty in Eastern Europe', *Millennium*, 20: 1, 1991, pp. 82—3.

主 权

它使得詹姆斯不得不改变了他的理论基础，然而他否认主权存在依赖于国际社会承认的观点。他认为主权国家的持续存在将最终取决于国家使敌人陷入困境的能力。虽然这很难达到，但是如果这是正确的话，一个没有武装强制力为保障的主权法律诉求将没有任何意义。换句话说，主权依赖于国家的实际有效性，而这种有效性来源于在那些声称统治和实际统治行为之间所保持的显著一致性。^①

考虑到这些观点，詹姆斯认为像罗得西亚这种新生主权国家的出现并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这种史密斯体制虽然不是法律认可的，但它是实际有效的。一方面，詹姆斯把国家视作为一种实体存在的法律表述，另一方面，在这实体存在和法律表述之间显然会发生冲突，但最终实体性的存在——实施强制力的能力——会更加重要。^② 这一观点对于理解国家是如何获得主权以及如何失去主权是至关重要的。

为何孟加拉国（Bangladesh）在 1971 年作为一个新生主权国家的出现是可能的？显然，巴基斯坦（Pakistani）的武装力量在东部地区的实施失败是决定性的因素。为何比夫拉（Biafra）（尼日利亚东南部一地区）——以詹姆斯的另一个例子为例——变成了一个主权国家？又是一个实体存在论的解释。最后是尼日利亚（Nigeria）联邦政府在比夫拉的叛乱中显示出了

① James, *Sovereign Statehood*, pp. 41. 155.

② Ibid., pp. 156, 40.

较强的强制力。^① 詹姆斯这样解释道，维持一个纯形式合法（很明显这是没有争议的）的主权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形式依赖实体，而实体基本上依赖国家实施统治的能力（如果需要的话将通过武装强制力加以保障），那么所有与“实体存在”相关的那些因素对于解释主权的存在都是至关重要的。

詹姆斯的这一理论很容易受到质疑，他们指责詹姆斯的立场已经堕落到仅仅是在为现实进行辩护。之所以主张在罗得西亚的史密斯体制是主权性的，是因为它使得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重要的一致性得到保证，并重视强制力的使用，以及不惜以紧急法令和牺牲民主体制为代价来获得这种一致性。为了从该实例中提炼出理论，詹姆斯不可避免的夸大了这种不合法（illegitimate）和不民主（undemocratic）之体制的稳定性和永久性。因此（写于 19 世纪 80 年代中叶）他很难理解南非为何要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尽管他也承认（非常谨慎的）种族隔离制度在将来也许会慢慢的退出历史舞台。^② 但是这一预言显然是错了，就在他的著作出版后 4 年，曼德拉（Mandela）将被释放出狱，南非国会也达成了在南非实行民主体制的协议。

换句话说，就像 1985 年早期在厄立特里亚（Eritreans）和诸如库尔德人（Kurds）和巴斯克人（Basques）的其他类似团体所面临的境况表现出来的那样，^③ 现实主义名义下的主权

① Ibid., p. 82.

② Ibid., p. 145.

③ Ibid., p. 83.

主 权

只能是把暂时的状况视作为永恒的政治蓝图。

国家及其争议

詹姆斯的分析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展示了主权的争议特性是如何与国家的争议性联系在一起的。他承认作为宪法形式上独立的主权必须依靠“实体性存在”才能得以加强和巩固，这一实体性存在强化了国家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制造一致性的能力，而这一点是其他任何公认的竞争者所不及的。

史密斯认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政治理论中关于关于国家和国际关系的论述为现实主义者的阐释路径提供了理论基础。^①正是那些从韦伯关于国家之定义引申出来的问题影响了詹姆斯关于主权的现实主义论调。按照詹姆斯的观点，只要没有被正式的纳入另一个宪法框架内，即使是一个制度已经崩溃了的国家仍然具备主权（如 19 世纪 60 年代的刚果 [Congo] 和 80 年代的黎巴嫩 [Lebanon]）。^②很显然，詹姆斯的主权定义是奠基于国家宣称对合法强制力垄断的假设之上的，这一主权定义具有很明显的缺陷和偏颇性。

正像前面我所指出的，这一观点可以表述得更尖锐一点，国家主张的是它实际上并不拥有或不可能拥有的对合法强制力的垄断。这一对合法强制力垄断的宣称假设了一个国际或者是

① Smith, *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 p. 53.

② James, *Sovereign Statehood*, p. 129.

国内的竞争性对手的存在，而这一竞争性对手也提出了同样的主张。詹姆斯认为主权之定义所需要的仅仅是某种机能性的国家，而不论其成员如何被划分，秩序有何偏好。但是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个国家都具有矛盾的特性，而且这种冲突的特性并不能通过詹姆斯在其主权理论中所倡导的形式主义加以排除。当这一形式主义的观点遭到颠覆后，詹姆斯发现没有一个实体性的存在——以强制力保证秩序的能力——即使是一个具有宪法性独立地位的实体，也会失去国家主权。国家在试图通过强制力实施统治的时候就暴露出了其作为一个组织寻求垄断其从未拥有过的合法强制力之矛盾特性。国家自身的这一矛盾行为表明了为何难以把关于主权的讨论和政治理论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分离开来。

在对其形式主义的主权定义进行辩护的过程中，詹姆斯认为国家主权和政治独立，自治，不可渗透性或者是外部约束的缺乏无关。主权既不意味着合法性也不意味着个人的权利。主权国家也没有必要和道德，民主，公民权或政治权利联系起来。实际上，像他界定的那样：“主权决不是一个安全繁荣之生活与国内稳定的灵丹妙药”，主权甚至和秩序和安全也没有关系。^①

但是，这一观点并没有使他的现实主义主权观少一些争议，它仅仅表明了国家实实在在的就是一个矛盾对立物，是一种有统一理论却预设了不同实践的制度。如果我们确实需要秩

^① Ibid., p. 276.

主 权

序，正义，权利，民主与合法性，那么像詹姆斯很清楚的指出的那样，不要指望国家主权能够为我们提供这些东西。因为对于主权来说，其作为一种实体存在的合法表述，和国家的矛盾特性是密不可分的。国家正是主权之概念混淆不清，难以准确界定的原因所在。

如果不加以明智地鉴别，国际关系领域内的现实主义论调是很能蛊惑人心的。因此，我们需要把国家和主权分离开来，这也是获得一个明晰的，一以贯之的主权概念之惟一方法。

第三章 现代性的问题

至此我已提出只有把国家和主权分离开来才可能对主权进行明晰的界定。但是也许会有人反对说，不需要把二者分离开来，因为主权仅仅是现代国家的产物。

我把这种观点称之为“现代论”（modernist），其中我将特别地审视罗森博格（Rosenberg）的马克思主义变量分析和辛斯利（Hinsley）具有代表性的论断，他们都把主权看作是现代国家的特征。我将指出，现代论把主权看作为国家惟一的、不可分割的、绝对的权力，对于该概念早期所具有的多重涵义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同时，现代论的主权观点孕育了这一烦人概念不在引发争议的性质。而具有讽刺性的是，现代性为我所要致力发展的后国家主权概念奠定了基础。

罗森博格的历史批判和差异性问题

罗森博格认为现实主义者以非历史的观点看待国家，所以

主 权

作为其结果，它不能揭示出主权是一个现代特有的现象。我同意第一个观点，但第二点我认为是片面的，经不住验证的。

罗森博格认为现实主义的观点把国家（如同市场和个人一样）看作是一个“自然的起始点”（natural starting points）。如果要使之去自然化（denaturalize），我们就需要把它看作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因此明确地承认国家的历史差异性至关重要。^① 在质疑现实主义理论缺乏历史性的同时，罗森博适时地强调了国家是如此的不一樣，比如中世纪和古代世界的国家和现代世界的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如果我们把伯里克利（Pericles）在葬礼上的演讲（经常为现实主义者所引用，并作为永恒权力之展示）同 1421 年威尼斯总督关于其城市财力的演讲进行对比，我们就会在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意大利城市之间发现一个剧烈的断裂。古希腊的城邦对意大利这种城市和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对抗毫无概念，因此与商业意识占主导的意大利不同，古希腊追求的是一种军事扩张的逻辑。^②

罗森博格强调关于国家和主权的分析必须集中在变化之特性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进行这种分析，我们需要一种包含了

① Justin Rosenberg, *The Empire of Civil Society* (London; Verso, 1994), pp. 4—5. Smith Points out that in Morgenthau's *Politics among Nations* – that most classic of realist texts – illustrations of statist behaviour are taken from every period of history, and these illustrations have remained intact through each of the book's six editions. M. J. Smith, *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 (London: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41.

② Rosenberg, *Empire of Civil Society*, pp. 120—3.

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历史视角。为了弄清楚这种主权产生的方式，我们必须理解这种同一的实体是如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展示其自身的。罗森博格的问题在于他在反对为现实主义者所采用的抽象连续性时，采用了一个同样抽象的断裂概念。他认为在古希腊不存在国家，而中世纪的政治组织（polities）是国家（state），但是这些国家并不具备主权，因为君主不得不与教会和贵族分享权力。按照他的观点，只有当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出现使得国家有可能被抽象为一个“纯政治性”的公共机构时，主权才得以产生。^①

接受幻想

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对剩余物的提取更多的表现为个人行为而非国家行为。罗森博格充分运用马克思的观点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平等是掩盖了财产占支配地位的现代社会现象。正像罗森博格所指出的，这并非仅仅是一个国内问题：国内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故意把自己表述为一个看起来非个人的，匿名的国家和抽象的平等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②

但这并不意味着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于先前的其他国

① Ibid., p. 87. The modern state is basically liberal in character. Onuf agrees: Nicholas Onuf, 'Sovereignty: Outline of a Conceptual History', *Alternatives*, 16, 1991, p. 426.

② Rosenberg, *Empire of Civil Society*, p. 18.

主 权

家，就被认为因此而具有主权了。然而千真万确的是，认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国家看起来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看法——如同罗森博格自己承认的——是一种幻觉。尽管国家被置于一个“纯政治”的位置，但是国家仍然继续规制（regulate）着社会，保证着契约的履行，征税并逐渐卷入到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而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依赖也逐渐加深。^① 在自由资本主义体制下，主权变得空前的荒谬。但是如果我们坚持认为主权是一个资本主义体制特有的纯政治现象，罗森博格之观点的批判力就会消失殆尽。因为一旦主权以这种方式被限定的话，真相就会被幻觉和欺骗性的表象所蒙蔽。总之，马克思的观点认为主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现象，因为抽象的表象和制度性的分离隐藏了主权国家卷入到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

罗森博格的引证清晰地再现了马克思假设主权能够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主权被冠以市场关系的抽象平等之特征。但是，如果自由主义这种纯政治的特征是虚假和误导的话，那么这些欺骗性的表面形式又怎么能够成其为主权定义的基础呢？^②

① Ibid., p. 127.

② Ibid., p. 84. Posenberg argues that the British state, for example, only became sovereign under the Thatcher government in 1979: Ibid., p. 134.

不同的国家主权：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

在这一点上有必要对辛斯利的观点进行探讨，像罗森博格一样，他试图简单地根据现代国家来定义主权。辛斯利主张：尽管国家对于主权来说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充分的。

他认为，主权要求国家为它的臣民所接受。这也意味着国家和臣民是截然不同的。同时，如果主权仍保留在政治社会中，这一权力必然是绝对和不受限制的。这一政治实体（body politic）（包含了国家和社会的国家）形成了由类似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组成的“单一人格”（a single personality）。^① 辛斯利赞同，在古希腊思想中，国家被视作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这一最高权力并不等同于主权，因为公民还并未和国家区别开来。^②

但是我们为何设想主权只能以现代的形式存在呢？

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即主权是在现代时期才得到明确论述的，安德鲁·文森特就很明确的指出主权之概念在 15、16 世纪以前是鲜为人知的。^③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人类的早期发展阶段就不存在国家主权了，甚至在主权概念本身形成之前也是如

① F. H. Hinsley, *Sovereig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1, 121, 125.

② Ibid., pp. 26—8; David Held,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Modern State* (Cambridge: Polity, 1989), p. 217.

③ Andrew Vincent, *Theorise of the State* (Oxford: Blackwell, 1987), p. 32.

主 权

此。关键是——如同我们已经在对罗森博格的批判中指出的——我们需要同时强调在国家主权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和断裂性。许多古希腊、古罗马或者是中世纪思想的要素都被整合进后来的现代主义主权观中。实际上，像查尔斯·梅里安（Charles Merriam）曾经指出的，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理论中，他认为在国家中必须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够足以建立一个主权。^①一旦我们确定统治者具有这一最高权力——即生死决定权，那么我们就能指出在前现代（pre-modern）社会不但已经有国家的存在，（如辛斯利承认的那样）而且还有主权的存在。

但是辛斯利认为王国和帝国（尽管具有不可否认的国家主义特征）不能被视作是主权性的，因为前现代国家中的统治者并未和特定的社会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个人的和神权性的象征物，他（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他）统治着众多的共同体和各种各样的人民。然而在罗马帝国，一个单一中央权威的出现仍被视作为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辛斯利认为，即使在这里，绝对的、最终的权威仍然是受到限制的。“只有法律的强制力才能使得君主感到愉悦”这一著名的论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宣

^① Charles Merriam, *History of the Theory of Sovereignty since Rousseau*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00), p. 11. The concept of sobereignty can 'be traced back to Aristotle': James Rosenau, 'Sovereignty in a Turbulent World' in Gene Lyons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Beyond Westphalia?* (Baltimore, MD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92.

布法律存在的权力已经被人民转让给君主了。^①

就梅里安而言，统治者是法律渊源的格言——简单易懂的教条——包含了主权自身最为清晰的表述。然而，文森特却把这视作为后来与社会相连的公共权力之论述。^②但是对于辛斯利和现代性论调的倡导者来说，仅有这种至高无上性是不够的。辛斯利认为，在伊斯兰的神权政治中就不能说包含了主权，因为扮演着这一全能角色的是神，而不是世俗的统治者。同样的道理，基督教欧洲的教皇也不是主权性的，因为他赖以进行统治的教规只不过是伦理道德罢了，还并未把宗教、政治和社会区分开来。^③

毫无疑问，封建主义缺乏一个一元化的、无所不包的并为国家统治者排他性占有的主权概念。关键在于以一种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形式出现的主权概念还没有发展起来。因此派瑞·安德森（Perry Anderson）能够把“建立在中世纪社会结构之上的金字塔式的、分割的主权同其财产和君主制联系起来”。而且他关键性地指出，教皇在教会内宣称拥有最高权力

① Hinsley, *Sovereignty*, pp. 31, 43—4. But see *ibid.*, p. 126. In Crick's view, sovereignty was unknown to the ancient Romans: Bernard Crick, 'Sovereignty' in David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Free Press, 1968), p. 78.

② Merriam, *History of the Theory of Sovereignty since Rousseau*, p. 11; Vincent, *Theories of the State*, p. 33. This position is also supported by Preston King, *The Ideology of Order* (London: Allen&Unwin, 1974), p. 73.

③ Hinsley, *Sovereignty*, p. 55.

主 权

为后来世俗君主的主张奠定了先例。^① 所以，我认为更确切的应该是此时不但具有了明确的国家概念（像辛斯利指出的那样），而且有了明确的主权概念。

文森特认为 13 世纪的城市共同体生活和行会孕育了大众性、团体性的主权，尽管他们从不使用“主权”一词。辛斯利自己也承认我们可以用现代的术语来表示中世纪的神和法律就是主权。但是，“这样的术语对于该社会的政治特征和中世纪的法律精神是不恰当的。”^② 但是为什么？如果法律和实际的国家能够采取传统和古代的形式，为何主权就不能呢？

毫无疑问，当我们迈向现代国家的时候，权力更加集权化了，这也进一步强化了主权概念。安德森指出，罗马法中私有财产至上、最高权力之概念的复兴使得后来的封建统治者能够进行更大范围的领土整合与管理，以及合法的集权化。^③ 古代和中世纪之主权概念也许还处于萌芽阶段，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但这并不等于作为政治现实的主权就不存在于中世纪的权力斗争中了。

在这一点上，梅里安对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政治思想的评述是富于启发性的。梅里安认为，在阿奎那的思想里，“关于主权性质的强准则（strong doctrine）为神法和自然法高于制定法的理念所掩盖”。但关键是主权的弱准则

① Perry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e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4), pp. 15 (emphasis added), 28.

② Vincent, *Theories of the State*, p. 34; Hinsley, *Sovereignty*, pp. 61, 68—9.

③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e State*, pp. 27—8.

(weak doctrine) 依然以国家的至高无上性和绝对权力的概念为转移。辛斯利指出,托马斯主义者认为(阿奎那的追随者)“如果还能把什么权威看作是主权的话,那也只能是上帝了”。我们难以否认现代的主权观,比如现代国家为权威提供了世俗的基础以取代了宗教的基础。就像凯塞琳·琼斯(Kathleen Jones)一样,我们的讨论仅仅是提及中世纪的主权观,我们还能赋予这种在等级隶属模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与社会秩序之不同等级结构相联系的权力什么特征?而且,这种权力宣称合法统治的最终来源依赖于权威概念。^①

辛斯利(像罗森博格一样)正确地强调了现代主权的不同特征。在现代主义者的观念里,主权明显地表现了权力在特定一国的集中。但是如果我们坚持认为这一特定的形式和主权也是一样的话,这一重要的历史洞见也会变得令人迷惑。因为政治权力早期的概念也是国家主义和至上主义的,我们有依据把这种政治权力看作无所不包的主权。^②

布丹和现代主义者的主权概念

评论家一般都同意 16 世纪的法国思想家让·布丹(Jean

① Merriam, *History of the Theory of Sovereignty since Rousseau*, p. 12; Hinsley, *Sovereignty*, p. 98. See also Crick, 'Sovereignty', p. 77; Kathleen Jones, *Compassionate Authori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3), pp. 38—9.

② Hinsley argues that because Machiavelli favoured a mixture of governmental forms 'in which no power was supreme', he was unable to develop a conception of a body politic 'endowed with sovereign power': Hinsley, *Sovereignty*, pp. 98, 113, 116.

主 权

Bodin) 是第一个系统论述主权概念的人。按照辛斯利的观点, 布丹的地位之所以如此重要, 是因为他对在此之前从未被整合过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进行了整合。^①

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主义主权观的本质为何如此争议不断而令人费解。布丹把主权界定为统治者不管臣民是否愿意而施加法律于其上的权力。但是他也认为主权的君王同时要服从神法和自然法的支配, 并且要尊重自由臣民的权利和自由。他甚至认为在法国, 除了紧急事态以外, 新税的征收需要得到各阶层的同意——否则财产权将会受到侵犯。^②

这引起了备受关注的一致性问题的。布丹既然已经把主权界定为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力, 却又主张对主权施加限制, 这样的做法合乎逻辑吗? 普雷斯顿·金 (Preston King) 认为当布丹把主权看作是绝对的、永恒的和整体性的时候, 这样的论调和主权应该受到法律的限制是不一致的,^③ 这明显的是一个问题的。但是, 这个问题是作为国家权力的主权概念与生俱来的问题, 这也是备受现代主义主权观关注的问题。

作为一个现代的思想家, 布丹把主权视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总体上的权力而不是 (像前现代的概念那样) 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 主权必须要受到限制, 因为它不能危及到统

① Ibid., p. 120.

② Held,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Modern State*, p. 217; Julian Franklin, 'Introduction' in Julian Franklin (ed), *Jean Bodin on sovereig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xxiv.

③ King, *Idology of order*, p. 79.

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统一性。实际上，这也是存在于现代主权概念和自由主义之间的联系，而且这一联系深深植根于个人自由的表达对国家权力之同意这一观念之上。同时，主权又包含了不受限制的权力是因为没有什么比这一总体性权力更能够涵盖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一二元性事物——一个断裂的社会是没有能力根据自由意志来制定新法的。所以，为布丹所阐述的现代主义主权观便有了一种同时包含了限权和专制主义因素的逻辑。

两个因素都被整合到主权的概念中，而且以一个因素为代价强调另一个因素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富兰克林（Franklin）认为，由于布丹害怕法国 16 世纪的宗教争端所产生的无政府状态，他暗示法律的限制难以（也不可能）正式地约束主权。君主若是违反了施加于主权上的限制，他也只对上帝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① 然而，尽管如此，对主权的限制绝对是重要的，因为拥有最高权力的君主（至少在欧洲背景下）只有通过法律才能进行统治，所以其必须接受自然法、神法和习惯法所施加的限制。但是，这里存在的矛盾并非布丹所特有，（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它来源于整个现代主义流派。

专制主义和反专制主义显得一样的重要。对于布丹来说，不但允许法律认可的主权超越授权范围施行权力，而且他所指的这种对主权谨慎的限制只和欧洲国家的主权有关。布丹认为，在“贵族式君主制”（*Lordly monarchy*）这种在亚洲和古埃

^① Franklin, 'introduction', p. xxiv. see also King, *The Ideology of Order*, p. 84.

主 权

及十分盛行的统治方式中，君主统治其臣民就像“一家之主统治其奴隶一样”。所以，主权既包含了法律认可的权力，也包含了公开残暴的权力，其中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统治模式（因地制宜）的不同。^①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讽刺，在前现代没有一个君主会把主权描述成一个不受约束的权力，因为这一阐述开始了现代主义者所说的向世俗权力的转变。另一方面，它还必然意味着现代概念构成了一种全新的现实主义国家主权观。这种构成早期主权概念的限权要素是难以理解和超凡脱俗的，因此其在本质上被视作是仅限于理论的而非实践性的，这一主张仅仅停留在价值层面上。就像罗马皇帝也许会宣称从人民那里获得了权力，他们是依据人民的同意进行统治的，但是很明显，他们从未真正这样做过。^②

布丹使得以前现代的方式来界定主权成为可能，即使在这期间主权概念本身还没有明确地形成。因此即使在主权概念没能被一致性概念化的背景下，也可以说主权是存在的。我们可以把它和国家相类比，该术语也许是现代的，但其存在的事实却是传统就有的。同样的道理，作为一个权力不受限制的主权概念是现代的，但是主权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通过等级和压迫性制度实施的现实却和国家自身一样的古老。

① Franklin, 'introduction', p. xxiv. Hinsley therefore oversimplifies when he argues that for Bodin 'sovereignty and mere absolutism were different things': Hinsley, *sovereignty*, p. 122.

② Crick, 'sovereignty', p. 78.

在以下的章节里我将提出后国家主义主权概念形成的问题，但是现在我关心的是要说明国家主义形式的主权并非现代独有，它已经存在了大约 5 000 年。很明显，主权的现代概念强烈地改变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通过强调至高无上国家之专制主义和不受限制的特性，才有可能以前现代的方式（被认为是未发展的和缺乏一致性的）来识别主权。

霍布斯（Hobbes）和二元论的问题

辛斯利认为，尽管布丹的主权理论本质上是现代的，却是不彻底的。其政治社会为神法和自然法所限制的观点在从未被触及过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关系上留下了裂痕，因为它假设每个人都持续地拥有分离的，不可消灭的个性和权利。辛斯利指出，霍布斯能够超越布丹解决存在于君主和臣民之间的二元论分歧。为了取代在习惯法和自然法中表述的共同体权利，霍布斯以“在国家产生之前作为个体的人的平等的无权利”而代之。而统治者的权力也不过是每个个体的意愿和行动的权力。^①

金指出，尽管布丹区别了君主权威和其他弱化的集体权威，但是霍布斯最基本的结构性区别是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区别——一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区别。金认为，布丹开始了一个也许可以说是被霍布斯所完成了的分析进程——这一点也得到了辛

^① Hinsley, *sovereignty*, pp. 130. 142.

主 权

斯利的赞同。^① 但是在这里，一致性的问题依然存在。对于霍布斯来说，所有的法律（包括自然法，神法和习惯法）都来自于国家。同时，霍布斯承认个人权利对于国家的对抗——权利为所有个人平等地享有，国家存在的惟一原因就是为个人提供安全和自由。因此国家的基本目标（个人最初缔结契约而形成了国家）也就被限定为保存个人的生命。

但是绝对权力同时又要受到约束的矛盾还没有得到解决。罗森博格认为，对于霍布斯来说，主权并不是作为直接反对封建社团主义（feudal corporatism）剩余而出现的（对于布丹也是如此），其关注的只是国家本质中自我毁灭的个人权力——即最初根据市场规律对剩余物进行抽取的私人模式。^② 但是这有助于解释为何霍布斯的理论比布丹体现出更多现代主义的一致性（这也是罗森博格认为为何现实主义者不研究布丹的原因），两个思想家的相似之处令人感到惊讶。实际上，当指出（引用艾伦·伍德 [Ellen Wood] 的话）霍布斯基本上是把布丹“绝对的不可分割的主权理念”移至到英国的环境中时，罗森博格就已经摧毁了这种相似性。这实际意味着，在把主权既是受限制的又是绝对的问题提升到一个显著的位置这一点上，两个思想家都是现代的。^③

罗森博格认为对于霍布斯来说，主权是“更为专制主义的

① King, *Ideology of Order*, p. 98; Hinsley, *sovereignty*, p. 143.

② Rosenberg, *Empire of Civil Society*, p. 137.

③ Ibid.; Stanley Benn, sovereignty in Paul Edwards (e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New York: Macmillan Free Press, 1967), p. 502.

因为其不是专制主义的”。但是即使布丹对待自然法和神法的方式比霍布斯关于国家和个人的分析更为传统，这一矛盾同样也适用于布丹。当罗森博格指出“现代主权只能是绝对的，因为其包含的限权性因素已经更加接近政治的合法性统治了”，^①他敏锐地捕捉到了现代性难以解决，却更加突出国家主权困境的方式。

现代主义和主权的争议性

如果看待主权时仅仅限于它的现代形式，事实上我们就忽视了现代性所带来的启示和不足。只有在现代国家出现以后才可能被设想出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是，如果关于国家和主权的不同分析是令人振奋的话，我们也会发现国家主权的概念是如何的棘手。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现实主义者正确地揭示了现代性的某些普遍意义，但他们认为所有的主权国家基本上是一样的假设却遇到了麻烦。对于罗森博格和辛斯利来说，发现现代国家不尽相同是正确的，但他们却由于这种不同而得出错误的结论，认为现代国家和其他以前的国家形式毫无共性。一个批判性的主权观点强调，应该历史地分析主权之连续性和断裂性。这也是为何我们在借鉴的同时要超越现代主义者对国家和社会的区分。

即使辛斯利不赞同马克思理论中“抽象物”（abstraction）

^① Rosenberg, *Empire of Civil Society*, pp. 138—9.

主 权

概念所包含的镇压和神秘化的涵义，罗森博格和辛斯利都还是把主权看作是“抽象”（abstract）的。但是不管对现代国家和主权这一综合体的态度是赞同还是反对，^① 该观点仍然是颇受争议的，关键就在于现代国家强调和凸现了主权之永恒存在的问题。

当国家的自治和非人格性被强调得越多，主权也就变得越加困惑了。一方面，主权在其管辖范围内被视作为普遍的，同时，使得国家主权更加明确的是其公共性而非私人性——即国家从渗透于其中的社会中分离出来。巴赫库·巴雷克（Bhikhu Parekh）就曾指出，在过去4个世纪以来，国家——社会的关系就一直困扰着政治理论家们，并一直阻碍着主权概念充分的发展。^② 这种困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什么是私有的明显地取决于什么是公共的，国家的本质特性就在于它涉及社会事务的方方面面。就像我们将要在第六章看到的那样，这也是为何民主概念对国家主义的主权概念构成颠覆性挑战的原因所在了。

有限的无限权力问题揭示出了在作为整体的国家主权理念中始终存在的困境。那些试图通过强调现代主义主权观（如布丹和霍布斯在其经典著作中所阐述的）中专制主义或自由主义

^① Hinsley, *Sovereignty*, p. 142. See also Murray Forsyth, 'state' in David Miller et al. (eds).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1987), p. 506; A. P. D. Entreves, *The Notion of the Stat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7), p. 23.

^② Bhikhu Parekh, 'When Will the State Wither Away?', *Alternatives*, 15, 1990, pp. 248—9.

之任何特性、脱离这一困境的人却没有弄清楚二者均是主权应有的题中之意。毕竟，国家自身最明确的特征就是其宣称对合法强制力的垄断，这也就意味着其权力既是受限制的又是无限的。现代主义使得在一般意义上对国家问题进行澄清成为可能。

主张主权是现代性背景下“抽象”国家特有的产物，只不过是一种以国家中心观的现实主义把历史断裂性绝对化的做法。一种批判性的主权观点需要我们能够处理主权和所有类型国家之间的联系，而现代主义者最大的贡献就是，它使得我们明白这种联系确实很复杂。

第四章 合法性与强制力

现代主义者的主权概念在一般意义上为主权问题提供了深刻的洞见，因为其强调了国家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就像把不受限制的最高权力放到一个引人瞩目的位置一样，它明晰地以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权力与合法性、同意、自由和权威联系在一起。

在现代主义者的传统里，主权必须是合法（legitimate）的，这种合法性要么是基于对法律的遵守，要么是基于个人同意的授权。由于同时对合法性与最高权力的强调，现代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国家主权之矛盾性和荒谬性的洞见。我想说明的是，就像在现代性中被明显指出的那样，“合法的强制力”（legitimate force）概念是一个自我矛盾的术语。如果我们要认真对待合法性问题（我相信我们必须这样做），那么这一理念就有必要和后国家主义的主权概念联系起来。

霍布斯，卢梭和二元论的问题

像布丹一样，霍布斯关注的是表明主权之合法性。主权之

所以是合法的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主权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限制。在霍布斯的论述中，这些限制的现代性色彩比布丹的更为强烈，但是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认为主权创建了“自由民”（free people）。对于人民来说，没有限制的主权就不是主权。

因此在霍布斯那里，对国家的恐惧必须依靠个人的自由意志来合法化，而这两个因素在其理论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卢梭确实在其著作《社会契约论》中强烈抨击霍布斯把人视作为野兽，但正是对一元化和无限国家主权的一贯主张使得卢梭成为现代主义的旗手。^①那么，霍布斯与卢梭之间的分野究竟在哪里呢？

对此，辛斯利的分析是最具有启发性的。一方面，他引用奥托·基尔克（Otto Gierke）的论述指出，随着卢梭理论的提出，人民主权信条的历史开始终结。如果主权意味着一个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分裂能够被克服的一元化政治实体，卢梭似乎在这方面最具有发言权。而另一方面，卢梭解决二元论问题的方法却又使得辛斯利感到不安，他抱怨卢梭简单的以社会淹没国家的方式来颠覆霍布斯的理论。

戴维·赫尔德同样对此感到担忧。赫尔德认为，相对于社会来说，霍布斯把国家置于一个全能的地位，而卢梭却允许社

^① David Held,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Modern State* (Cambridge: Polity, 1989), p. 221; Jean - Jacques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8), pp. 51, 70.

主 权

会通过公意的概念来对个人进行统治。两个政治权力的模式都潜在的暗含着专制。就像赫尔德指出的：需要非常谨慎的对待这一没能划清政治行动限制或合法范围的主权概念。^①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霍布斯和卢梭的主权概念也是受到限制的。卢梭认为人民要遵守那些他们为了自己所设定的法律，而霍布斯则主张主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使得人民能够保存自我。显然在二者的论述中，主权都要受到维持（某种程度上）个人自由需要的限制。如果这些限制不是说服性的，而应该以正式宪法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话（如赫尔德主张的），那么如何在不对主权进行划分的前提下达到此目标？那么这又回到了现代主义主权二元性概念（这也是最为突出的国家主义主权形式）试图解决的问题上来了？

梅里安认为“卢梭为人民完成了霍布斯为统治者所做的事”，^② 但是问题在于霍布斯和卢梭都把主权视作为国家。一个理论家以牺牲国家的代价来强调社会和另一个以牺牲社会的代价来强调国家的做法都是有失偏颇的。与此相反的是，作为现代主义者，霍布斯和卢梭都试图超越辛斯利所称的“在政治社会和国家之间根深蒂固的分野”。

梅里安谨慎的指出，霍布斯理论中的逻辑“非常的残酷”，

① F. H. Hinsley, *Sovereig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54—5; Held,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Modern State*, pp. 223—4.

② Charles Merriam, *History of the Theory of Sovereignty since Rousseau*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00), p. 35.

而且一旦作出了必要的假设，这样的结论就是“难以避免的”。^① 但是如果霍布斯的这种逻辑成立的话，卢梭理论的逻辑也同样成立。在霍布斯和卢梭之间的差异就在于：霍布斯承认个人拥有自然权利以对抗威胁到自身存在的主权，而卢梭却通过寻求不可分离之个人结合成的“公意”来终结二元论的残余。换言之，卢梭提供了一条解决国家和社会整体性的路径（尽管也是国家主义的），而这条路径是霍布斯的机械主义个人观所反对的。

洛克（Locke），现代性和限制的问题

赫尔德对霍布斯和卢梭专制主义的担忧使得他转而支持国家主权问题洛克式的解决路径。但问题是洛克的概念在本质上并不是一脉相承的现代主义。辛斯利指出，洛克甚至不愿意讨论主权概念并且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也许洛克和霍布斯理论之间的相似性比分歧更为重要。^② 但是洛克同时又试图阐述在宪法性限权国家的概念（这也被认为是合法的）和主权概念之间调和的问题。

洛克在其著名的论断中指出，人民可以抵制侵害个人权利

① Hinsley, *Sovereignty*, pp. 154—5; Merriam, *History of the Theory of Sovereignty*, p. 27.

② Hinsley, *Sovereignty*, pp. 146—7. See also Quintin Skinner, 'The State' in Terence Ball et al. (eds), *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主 权

的国家。洛克设想在国家和人民之间划分主权——针对这一观点，辛斯利评论说，洛克的观点“和中世纪的思想保持了很强的亲和力”。^①一方面，洛克认为共同体拥有“最高的或立法的权力”。另一方面，这一最高权力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因为其受到正式和明确的限制。因此，比如立法机关就不能以专断的方式任意剥夺国民的财产。换言之，主权似乎是分立的。

主权的人民能够抵制主权的国家。我们又回到了前现代的二元论，辛斯利很正确的指出，洛克的理论反映出了在政府和社会之间签订契约的理念遗迹——一种本质上古老的理念（以现代主义者的逻辑）。约瑟夫·卡米勒（Joseph Camiller）和吉姆·福克（Jim Falk）认为洛克重申了中世纪道德律令高于制定法的传统，并因此而破坏了布丹、霍布斯和其他现代思想家视作为主权最本质要素的权力之至高无上性。但是很明显，这是一个更明智和适中的立场，人民和国家一样具有主权。梅里安认为：对于洛克来说，政治社会是一个潜在的主权，只有当政府崩溃的时候其才会积极发挥作用。^②

实际上，赫尔德甚至认为洛克通过把最高权力与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等同起来以试图超越在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旧的二元主义”。赫尔德指出，政府的最高权力是“保有信任而得

① Hinsley, *Sovereignty*, p. 149

② Ibid. p. 174; Joseph Camilleri and Jim Falk, *The End of Sovereignty?* (Aldershot: Edward Elgar, 1992), pp. 19—21; Merriam, *History of the Theory of Sovereignty*, p. 32.

到授权的最高权力”。洛克把立宪政府概念发展成了一个“保护主权人民和主权国家的，法定的和制度性的机制——即人民确保政治权力负有责任性的权利和国家进行统治的权利”。^①

但是这一分立主权的概念很容易受到现代主义者的反对：该概念不但逻辑上不连贯，而且施加了一种神秘的，难以置信的限制。如果我们把国家看作是宣称垄断了合法强制力的组织，那么一个受到国家外部限制的人民主权实质上只能是一个假设而已。因此利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的观点就很具有说服力：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霍布斯比洛克更强烈的强调，只要其自我保存受到威胁，个人随时都拥有对抗社会和国家的权利。正是霍布斯而不是洛克认为个人（男性）具有对抗国家侵害义不容辞的责任。^②

无论对国家提出什么样的限制（假设的），洛克也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其理论逻辑的指向都必然是国家的至高无上性。按照赫尔德的观点（这是一个为赫尔德所同意的洛克式的观点），辛斯利把社会看作是主权的来源，而国家只是实施主权合适的制度安排，但这还不是辛斯利全部的观点。辛斯利认为“社会全部或部分的是主权的来源”，这一模棱两可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辛斯利自己承认，“分享”主权的概念是应对“谁具有主权？”这一老问题的“不完善的解决之道”，而这一

① Held,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Modern State*, p. 224

②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 232

主 权

永恒的困惑只能通过辛斯利所说的“政府和社会之间摇摆不定的却是必要的妥协”来加以解决。^①

这确实是一个困境。分享主权与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摇摆不定但必要的妥协之概念只不过是现代主义逻辑的一种退却。现代主义的概念恰当地把主权视作为一个一元化的概念——要么具有主权要么没有主权——但它却错误地把主权和国家等同起来。那些被警示着国家权力限制的人面临着选择，而这一权力在本质上是被明确的贯之以无限制特征的。他们要么能够通过质疑国家垄断合法强制力的宣称来挑战国家的概念，要么能够重回到声称在高高在上的国家权力之上加以限制的传统二元论。

换句话说，只要我们把主权等同于国家，就不可能超越现代主义者的概念。这一颇具迷惑性的在国家和社会间的二元论（这也是现代主义最为推崇的）被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上升为组织性的原则，康德认为人民理论上的主权只能够同国家实际的主权共存。辛斯利认为主权的概念就是从那时起沿着康德的足迹发展起来的。^②

我们应该像实证主义者一样把国家之法同所有的道德概念分离开来吗？甚至是像奥斯汀和边沁一样回复到丧失了批判性的霍布斯主义上吗？或者，我们应该试图通过区分法定主权和

^① Held,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Modern State*, p. 223; Hinsley, *Sovereignty*, pp. 222 (emphasis added), 157.

^② Camilleri and Falk, *The End of Sovereignty?*, p. 22; Merriam, *History of the Theory of Sovereignty*, p. 63; Hinsley, *Sovereignty*, p. 156.

政治主权处理国内主权和国外主权限制的问题——法律上的主权和实际的主权 (de jure and de facto sovereignty)? 所有这些“出路”都停留在国家的框架内, 因此, 需要重塑国家主义主权概念中一以贯之的二元论。

强制力的问题

大约 60 年前, 弗朗西斯·科克 (Francis Coker) 指出, 无论在什么构成主权的问题上对理论家进行怎样的划分。他们至少都同意国家通过“有组织的共同体的强制力”来实施其统治。^① 正是对合法强制力垄断的宣称使得国家彰显其主权, 而不管主权带来的后果看起来是多么的不道德和令人担忧。

我认为强制力与合法性是相互排斥的。如果合法性意味着对限制的认可, 那么强制力则包含着毁灭性的因素。辛斯利认为无论是概念性的还是真实的, 权威都是为国家权威所定义的。^②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只能在国家主义的语境下才能把主权假设成为最终权力的表述? 这一主权和国家的综合体使得合法性存在根本性的问题。

在霍布斯的理论中, 强制力和自由都受到了平等的强调。强制力既与合法性联系在一起, 也以一种相互排斥的方法进行

① Francis Coker, 'Sovereignty' in Edward Seligman (ed),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1934), p. 268.

② Hinsley, *Sovereignty*, p. 223.

界定。因此按照霍布斯观点，没有人能够放弃对抗那些“通过强制力侵害他的人”之权利——契约总是能够借用强制力保护自己免受强制力的侵犯。^① 卢梭也为同样的问题所困扰，他以典型的自由主义论调指出“强制力是一种物质性的权力，我不能理解其结果怎么能够产生道德”，然而他又提出了其著名的“强迫人民自由”的论断。因此，不管人们怎么认为，强制力就意味着强制力。^② 比如，惩戒乃至死刑都是强加在那些对市民宗教（civil religion）产生怀疑的人身上。

正如特里维斯（D'Entreves）指出的那样，国家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但是它们全部都“诉诸于强制力”，而且“强制力肯定是有有效的。我认为，试图表明强制力与合法性是一致兼容的观点是缺乏说服力的。罗德尼·巴克（Rodney Barker）就曾指出，国家的合法性意味着特权和强制，而不是弱小和受压迫。^③ 但是这一论点只不过是避开了而不是解决了由霍布斯和卢梭提出的问题。如果所有的国家都必须宣称对合法强制力的垄断，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如何能够同意这种强制力的使用？大卫·比彻姆（David Beetham）正确地指出，合法性必须

① Preston King, *The Ideology of Order* (Longdon: Allen&Unwin, 1974), pp. 162, 200;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8), pp. 113, 189, 192, 199.

② Rousseau, *Social Contract*, pp. 52, 64. Hoffman, *Beyond the State* (Cambridge: Polity, 1995), pp. 110—11.

③ A. P. D'Entreves, *The Notion of the Stat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7), p. 34; Rodney Barker,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the Stat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pp. 113—16.

被看作为分享着共同信念或共同利益所维系着的团体间关系。这些团体对这一关系构成了明确的限制，因此这对于其合法性也是至关重要的。按照比彻姆的观点，即便这种关系是压迫性的也仍然是合法的。也就是说，在这种家长式的权力实践中，孩子、妇女或者是奴隶都接受了其“天生的”无可质疑的从属地位。^①

然而这些论述都是似是而非的，无助于促进合法性与强制力的一致性。这是因为，如果合法性要求两个集团分享共同认可之价值的话，强制力则由于其必然把臣民当作它物、人民当作物体来对待而消解这种公共性。强制力的使用不能受限于对作为相互关系特征的相互限制的承认。比彻姆认为，强制力只有被用来保护公民的时候才是合法的。^② 但是尽管在特别的情况下得以保护而免受侵害的惟一办法确实就是通过强制力的防御性使用，强制力与合法性仍然难以和谐一致。

运用强制对抗强制（不管是否临时性的）使我们处于一个为了保全自由而不得不损害自由的不幸境地之中。换句话说，为了减轻那些施加于我们身上的强制力，我们也许不得不以牺牲眼前的合法性为代价。但是强制力的合法性特征始终存在。关键就在于，强制力并不仅仅对那些因为强制力而堕落和受伤害的接受者来说是不合法的（如果他或者她并未立即被灭绝），

① David Beetham, *The Legitimation of Power*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1), p. 31. See also Hoffman, *Beyond the State*, pp. 81—3.

② Beetham, *Legitimation of Power*, pp. 138—9.

主 权

而且对那些管理者和犯罪者来说也是不合法的。在此过程中，把人当作物是剥夺人性，非人化的做法。所以，当强制力被使用时——为国家所使用或是为了响应国家——合法性就受到了侵害，这也是为何卢梭坦白的承认他建立一个“合法”国家的企图必然会归于失败。^①

通过主张主权和“正常”国家日常生活不相关的方法无助于弄清这一问题。克瑞克（Crick）力主在他所指称的主权时代和政治时代之间的“真正差别”，但这也是其问题所在。他把政治和主权与国家视为一体，因此，以小团体为例就难以被视作为政治性的，因为“不像国家，他们没有得到承认的、使用强制力的法定权利作为最后之保证”。很明显，“作为最后保障手段”的强制力之使用权利产生了问题，对此，克瑞克模棱两可、含糊其词。一方面，把政治界定为一种“选择调和而不是暴力和强迫”的行动。另一方面，他又把政治视作为“一种没有不合法暴力的、统治分立社会的方法”。^② 但是克瑞克坚持认为，不论政治被认为是如何的自由和调和，强制力最终都是不可避免的保障。

不难理解，强制力的不可避免使得调和面临绝境，因为其包含了对个人的强加与和他们意志相背的明显的解决方法。而

① The force which Rousseau sees as destructive of morality and of right, lies nevertheless at the heart of his (impossible) attempt to legitimate the state.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pp. 60, 134.

② Crick, *In Defence of politics*, pp. 30, 33. See also John Hoffman, *State, Power and Democracy* (Brighton: Wheatsheaf, 1988), p. 37.

且，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那样，强制力的使用损害到的并不仅仅是合法性与自由。用卢梭的话说，国家的强制力本质上是“集体的”，对于所有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来说，其必然危及到合法性的存在。

强制力和无国家社会

政治理论家们一般都同意我所称的那种霍布斯式的假设，即没有组织的国家强制力，秩序和文明是不可能的。统治需要强制力，没有强制力的主权是难以想象的。金非常正确地指出，对秩序的需要来源于每个个体相互间冲突的事实。但是他却错误的坚持认为每一统治秩序“都在不同程度上认可着暴力的使用”。^① 这一观点把统治等同于国家，并且假设没有强制力的存在，秩序将是不可能的。

问题在于：为何我们要把统治设想成为一个解决争端的过程，难道我们只能通过一整套宣称垄断了合法强制力的组织才能实施统治吗？伊斯顿正确地指出，统治概念被定义为必须包括强制力的使用是一种民族中心主义的做法。千万不要忘记在没有国家存在之前人类同样过着秩序井然的生活，而且这一可能性已经为战后的人类学家详细的论述过了。统治是一个解决

^① King, *Ideology of Order*, p. 156.

主 权

利益冲突的过程，应该同国家的活动区分开来。^①

在这一点上，辛斯利的论述是最具启发性的，尽管其主权的定义也是国家主义的。他认为只有通过国家，才可能分辨社会中这一最终的绝对政治权威。但是，他同样指出在无国家社会不会有一个单一中心性的统治象征，相反一个“单一的领导地位恰恰是国家出现的标志”。作为一个国家主义的主权概念，惟一性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霍布斯式的主权定义，而且正如辛斯利承认的那样，惟一性即意味着强制力。^② 在无国家社会，争议不能通过强制力加以解决，因为“这里存在着敌对的地方性忠诚和宗教联系的平衡”。

这一点也为柯拉特斯（Clastres）关于美国印地安人的研究所证实。柯拉特斯为，寻求以强制暴力的同意来实施命令的首领将必然会面临社会成员的拒绝和否认。在柯拉特斯所指称的“社会对抗国家”的情况下，作为一个聚合性强制力的主权概念并不存在。^③ 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把早期社会的统治机制理想化是至关重要的。这些社会不但包含了诸多小型的有着共同

① David Easto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in B. J. Siegel (ed.), *Bienni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18; Adrian Leftwich, *Redefining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1983), p. 28.

② Hinsley, *Sovereignty*, pp. 17, 7; Hobbes, *Leviathan*, p. 227.

③ Hinsley, *Sovereignty*, p. 8; Pierre clastres, *society against State* (New York: Urizen, 1997), pp. 131, 175. Buzan's reference to the state 'understood as tribe' can only be regarded as eccentric: Barry Buzan, 'The Timeless Wisdom of Realism?'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50.

经济生活和同质文化的群体，而且他们也没能免于使用暴力（至少在一些案例中）。在当今世界，运用现代的技术，我们将能够正确的把那种在早期无国家社会中所显示出来的暴力之自发使用看作是危险和令人难以接受的。

但是这样的社会确实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洞见，即秩序能够以一种没有国家的方式加以保证。正像辛斯利指出的，“战败的概念一般是没有的”。两个群体中较弱的群体会选择退却而不是战斗，而且如果一个群体战胜了另一个群体，其并不试图建立对战败者的统治。这也是迈尔（Mair）在其关于苏丹努尔人的研究中所强调的。她还认为，即使出现暴力的使用，它也不是被用作为“一种统治其他人的方式”，尽管存在暴力的使用，但社会中有秩序的相互关系仍然是以无暴力的方式加以保证的。^①

正如西蒙·罗伯茨（Simon Roberts）所指出的，在几内亚的新泽里（New Jale of Guinea）作战已经高度的仪式化，以至于社会日常生活的分裂都被最小化了。在柯拉特斯关于美国本土部落的研究中，暴力的出现代表着统治的失败，而这种失败却只会损害部落首领的威信。对于理解在无政府主义的国家或者是无国家的世界中秩序本质上是何以可能的问题，没有国家之统治的概念同样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需要区分暗含着多元行动者间分散行动的冲突和意味着统治和支配的强制力

^① Hinsley, *Sovereignty*, p. 8; Lucy Mair, *Primitive Government*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2), p. 12

主 权

(当采用国家主义的形式时)。^①

强制力作为一种统治机制要么为国家所用，要么被用作来反对国家。国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会以强制的方式对强制力作出反应。斯坦利·约翰逊 (Stanley Johnson) 就曾指出暴力和强制力有所不同，区别之处在于前者违背了一些道德和法律的准则，而后者则不然。但是这样的区分标准是站不住脚的。尽管认为利益冲突在采取任何其他方式都不能容纳的情况下，国家使用强制力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看法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强制力仍然包含了暴力的因素——即背离了其试图保障的个人或团体的自由和意志。^② 关键就在于，强制力（或者是暴力）作为一种解决利益冲突的方法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所特有的，它难以与合法性协调一致。

强制力 (Force), 强制 (coercion) 和共同体的问题

我曾经指出过，国家主权存在内生的合法性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了宣称垄断合法强制力的组织，一个无国家的社会是如

^① Simon Roberts, *Order and Disput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9), p. 88; Clastres,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 pp. 31, 162, 132;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77), p. 132; Peter Nicholson, 'Politics and Force' in Adrian Leftwich (ed.), *What Is Politics?* (Oxford: Blackwell, 1984), pp. 42—3.

^② Stanley Johnson, *Realising the Public World Order*, Occasional Paper 2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Order, 1993).

何进行统治的呢？

在这一问题上，辛斯利再次为我们提供了启示。他指出，“在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权威依赖于心理和道德的强制而不是强制力，认识到这一点尤为重要。无国家社会中的统治往往意味着商谈，讨论和妥协。^① 在那里，惩戒必须得到分配而统治得以强化，认同虽然包含了压力的因素，但这种压力不能够被描述为强制力。正如伊斯顿所指出的，任何把道德强制和物质强制力等同起来的企图都将意味着剥夺后者的涵义。^② 在强制力和强制之间的区别对于我们理解没有国家的社会如何获得秩序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强制会有多种形式。（像我们经常做的那样）把强制视作为使用强制力的威胁使得两者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但是这一区别依然值得探询。因为，严格的说，强制仅仅是一种促使个人按照其将要试图逃避的方式行动的压力。而强制力的关键则是从根本上阻止人们的行为。就像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所称作的“自然的惩罚”一样，强制在形式上可能非常分散。这一切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社会之中，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他人的行动。因此，我更愿意指出某些强制是社会中与生俱来的，是我们实现

① Hinsley, *Sovereignty*, p. 16; Hoffman, *Beyond the State*, p. 40; Roberts, *Order and Dispute*, pp. 20, 26, 137.

② Easto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p. 217.

主 权

自由的先决条件，而不是我们自由的障碍。^①

即使是采取更为集中的形式，强制也难以同强制力混为一谈。不可否认，反对的团体也许要受到威胁或者是引诱才能够接受协议，而在早期社会，人们往往诉诸于羞耻、放逐、嘲弄甚至是超自然的认同来确保秩序。尽管强制也是令人不快的（在特定情况下甚至是无法防御的），但其仍然明显的区别于强制力。强制并不会自然而然的妨碍到个人的选择，而强制力则反之。这也就是为何合法性（包含了对限制的承认）能够与强制相容，即使其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必然被强制力所损害。

辛斯利指出，不管什么时候，国家一旦被成功的建立起来，“我们都将发现在社会的原则和统治的原则之间存在着冲突”。^② 我很赞成这一观点，正是国家的存在标识了社会不能够再把所有团体之不同特性看作是分歧，也不在能够以这一方式来解决冲突。通过对无国家社会的秩序机制与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秩序机制进行对比，辛斯利提出了一套概念工具（尽管他并没有亲自使用）来展示国家主权富有争议的特性。正如我曾经讨论过的，如果国家主权包含了把强制力的强行使用（统治的原则）当作是解决利益冲突的方式，那么分裂和冲突便成了这一制度内在的本质特征。

^① I have argued this case in more detail in *Beyond the State*, p. 88; and *State, Power and Democracy*, pp. 121—2.

^② Hinsley, *Sovereignty*, pp. 16—17.

哪里有国家的存在，哪里就必然会出现分裂社会之构成部分借助其自身未经授权的强制力向国家拥有的垄断强制力提出挑战。通过此方式，他们向抵制的国家之合法性发起挑战。当然，这些个人或者是团体在官方的语境下被永恒地贯之予“不可能”的少数的特征，但对于头脑健全的人们来说，其诉诸于强制力的努力似乎存在着难以解释清楚的恐惧。但是关键在于这些个体或是团体在这一点上都是相同的。它们的存在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家主权凭借其名义而得以实施的社会实际上并不存在。

我认为，我们可以理所应当的认为国家宣称对合法强制力的垄断必然会受到反对者的反对。因为正是国家所特有的分裂性结构损害了其合法性，如果我们难以对国家提出挑战的话，它将使得所有寻求提供一个一以贯之主权概念的尝试停滞不前。

第五章 民 主

我曾经指出过，正是主权和国家的相互关系使得主权概念显得如此的充满争议。在我看来，民主是一个意味着自我管理的概念。它和主权的冲突只有在主权本身在国家主义的语境下进行阐释时才有意义。

我想指出的是，如果人民主权的概念是疑惑不清的话，那么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民主的，而恰恰是因为其显而易见的国家主义特质。当一种全球性民主的论调——一种把世界视为整体的民主——把民主视作为一种解决超越于国家之上利益冲突的方法时，其暴露出来的国家主义特征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民主和国家

民主常常是以主权的对立面出现。但是只有当涉及到国家的现实时，民主对主权的批评才是站得住脚的。在以民主的名义对主权进行批评时，却置国家的概念假设于不顾，并最终导

致了现代主义者曾经嘲讽过和试图颠覆的分享或分立的主权概念。

这一问题在马利坦（Maritain）对卡米勒瑞（Camilleri）和福克（Falk）所主张的主权概念之尖锐批评中显得尤为突出。在马利坦那里，主权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绝对权力存在，并且是脱离于国家的。由于把人民的政府设想为“既是脱离于其自身又是凌驾于其上的”，这样的主权概念就颠覆了其他任何的大众性统治概念。即主权难以和民主协调一致。^①但是，因为简单的把主权等同于现代主义者的观念，马利坦只能提供一个缺乏批判力的国家观。他认为国家不是而且永远不会是主权，其至高无上的独立性和权力服从于国家的法律和管理。就马利坦而言，人民管理他们自己的权利受到来自于神权的自然法的限制。^②

斯坦库维茨（Stankiewicz）指出，马利坦想当然地认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但斯坦库维茨质疑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大众性自我统治就是一个自我矛盾的概念。谈论任何的一个人或者是团体进行自我统治是荒谬的，因为在此也就不存在可能存在任何的“统治”。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老话题。

① Joseph Camilleri and Jim Falk, *The End of Sovereignty?* (Aldershot: Edward Elgar, 1992), pp. 33—4; W. J. Stankiewicz, 'Introduction' in W. J. Stankiewicz (ed.), *In Defense of Sovereignty* (London and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8; Jacques Maritai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in Stankiewicz, *In Defense of Sovereignty*, pp. 43, 50, 56, 64.

② Maritai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pp. 54, 63, 55.

主 权

如果从国家的角度来理解统治的话，我们将会面临着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正是这条鸿沟使得人民难以实现自我的统治。^①

但是斯坦库维茨也承认，如果我们在后现代国家主义的语境下来界定民主的话，“自我统治的权利实际上是和主权理论相冲突的”。“作为政治生活现实的主权总是同民主应该是什么的假设相冲突”。斯坦库维茨认为，在现实世界里，并没有以真正自治为特征的民主社会存在。同时他承认，作为一个概念，民主似乎朝向一个虚构的、纯粹主义的表述，因此他谨慎地承认：“也许要在主权与民主之间达成彻底的和解是不可能的”。当面临潜在冲突的威胁需要采取行动时（即当制度化的强制力被使用时），“对主权的逻辑诉求超过了对民主的逻辑诉求”。^②

然而，斯坦库维茨恰当地反驳了马利坦的国家主义对主权概念的挑战，他清楚地意识到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作为概念性的民主超越了国家的真实存在。这也是柏拉图（Plato）在其名著《理想国》（*The Republic*）中提出的著名观点，其中，柏拉图批评民主是一种违背和颠覆了自然等级制度的体制。柏拉图反驳说：就像父亲和儿子颠倒了位置，在这里，本国公民和外邦之间没有了区别，奴隶和他们的主人一样享有同样的自

① Stankiewicz, 'Introduction', p. 8, See also John Hoffman, *State, Power and Democracy* (Brighton: Wheatsheaf, 1988), pp. 148—9.

② Stankiewicz, 'Introduction', pp. 3, 8, 6.

由，更不用说不同性别之间享有的完全平等和自由了，就是连与人共处的动物也会被感染上无政府主义的极端民主主义了。^①

尽管一般都认为古希腊民主的拥护者都从国家主义的路径对民主进行了诠释，就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柏拉图也是推崇国家而反对民主。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本身就隶属于自然存在的社会等级之中”，这也是为何所有的政治系统都不可避免的要面临一个问题：主权究竟何在（即国家的至上性何在）？^②这也是民主同样面临的问题。无论是以现代的方式还是以古老的方式出现，民主都存在着与国家至高无上之概念不一致的平等主义逻辑。

联邦制的问题

由于一般都肯定联邦制对于民主之必要性，所以其构成了对主权概念的挑战。因此，当1917年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竭力赞美美国联邦制的优点时，他对国家主权的概念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因为制约和平衡阻止了权力的专断和集中，联邦制民主和主权是格格不入的，而且“我们并不知道是谁在统治”。拉斯基认为，可以绝对地说不是总统，不是国会，

① Ibid, p. 8; Plato, *The Republic*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55), p. 336.

② Aristotle, *The Poli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2), p. 28. Stankiewicz cites the words of Aristotle as a motto for his introduction. See also Hoffman, *State, power and Democracy*, pp. 143—9.

主 权

也不是最高法院在进行统治，“确定的主权性权利为国家独自所有”。

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在其经典著作“谁在统治”一书中为其多元民主提供例证时也重申了这一观点。它取决与这样的假设，如果我们把美国的联邦制视作为像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自身形式”的话，^① 那么联邦制就是以主权的对立面出现的。没有人可以否认美国是奉行联邦主义的，但是认为其是一个宣称垄断了合法强制力的政治体系也是有失偏颇的。哈罗德·拉斯基后来也认为正是国家的强制权威使得其成为主权，这一点在他对联邦主义和国家主权早期的对比中显得尤为复杂。他承认，尽管是联邦主义的，美国俨然是一个国家，其主权为宪法所规定和授予，而且那些掌握了国家武装力量的人就是国家主权的拥有者，这一观点同时也为克瑞克所同意。他指出，授予总统军事领导权恰好契合了霍布斯的经典论述“没有强制保障的契约是空洞无意的”。^②

有人认为通过现代主义者狭隘和独有的主权观，仍然有可能主张（像辛斯利所做的那样）联邦主义国家的非主权性，但

① Harold Laski, *Studies in the Problem of Sovereignty* (New Haverns,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7), p. 267; Robert Dahl, *Who Governs?*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London and Glasgow: Fontana, 1966), p. 17. See also Bernard Crick, *In Defence of Politics*, 2nd ed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2), p. 67.

② Harold Laski, *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35), pp. 21, 24 27; Bernard Crick, 'Sovereignty' in David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Free Press, 1968), p. 78.

这确实是一个误导。正如金（King）曾经指出的，如果能够证明在一个单独的国家内存在着不止一个的最终权力，那么联邦制度仅仅可以被看作是颠覆了传统的主权理论（如他称作的那样）。事实上，正如多元主义者自己承认的那样，所有的联邦政府（也即国家）都直接或间接的排除了其组成成员脱离的权利。^① 关键就在于，尽管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性，联邦制体系仍然是主权国家。其难以消解（无论其支持者坚信什么）存在于自我统治型的民主和宣称垄断了合法强制力的组织之间的张力。

人民主权的问题

卡米勒瑞和福克认为在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之间存在着一条“不断加深的裂痕”。他们认为，这一裂痕反映出了国家同市民社会的日渐分离。人民主权往往同多元主义、自治、自由和责任等概念紧密相关，而这些概念的核心实际上就是民主的问题。^②

这一观点正好契合了丹尼尔·达尼（Daniel Deudney）近来对其所称的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n）主权模式的批评——至从 17 世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以来，这一模式已成为欧洲国家的典型特征。尽管这一模式把为布丹和霍布斯竭

① Preston king, *The Ideology of Order* (London: Allen & unwin 1974), p. 34.

② Camilleri and Falk, *The End of Sovereignty?* p. 203.

主 权

力推崇的国家主权概念奉若神明，但一个可选择的主权体系在（他所称的）费城体系（Philadelphian system）中渐露端倪。这发生在美利坚联邦建立和国内战争（1861—1865）爆发期间。它意味着主权可以不是国家主义的，用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话说，国家来源于人民这一“最终权威”。^①

达尼认为，在费城模式中，所有的行动者都是“主权最基本的成员”。这里没有人统治人的等级，实际的治理由代表“休会的主权公众”的权威来施行。^②但是这一主权概念的问题在于，尽管有着假设的大众性特征，但其仍然允许存在最终强制力这一角色。与霍布斯契约需要武力保证的警告相呼应，达尼认为“建国者们总是在寻求一种保证，即武力能够帮助其牢牢地控制主权和人民”。因此不管是在国家内部还是在成员国之间，国家主义的主权观总是屡试不爽。

正如达尼指出的那样，在每一个国家，秩序都是按照“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的政治经济来进行注解的，这也意味着在概念性的民主付诸于实践时，往往意味着家长式的统治，意味着对美洲土著的剥夺和附属殖民地人民公民权的剥夺，而在一些国家中则意味着实行赤裸裸的奴隶制。在这些国家中，军事性自治受到明确的限制。总统同时也作为总司令被授予全能的权力在全联邦内行使，同时中央政府被授

① Daniel Deudney, 'Binding Sovereigns: Authorities and Structures and Geopolitics in Philadelphian Systems' in Thomas J. Biersteker and Cynthia Weber (eds), *State Sovereignty as Social Constru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91, 195, 197.

② Ibid. pp. 204—5, 197.

权招募和维持一只常备的陆军和海军。^① 达尼承认，一旦美国由于国内战争而土崩瓦解，处于争端中的两个党派会转而求助于威斯特伐利亚主权模式。南方党人认为每一州的人民都有脱离联邦的最终权利，而北方党人则把主权视作为大多数州的联合体。这样，二者对于典型的、把人民看作一个整体的费城主权模式都已是渐行渐远了。

我们愿意接受费城主权模式有着与威斯特伐利亚主权模式不同的特征。但是问题在于把费城体系看作是大众性的而非国家主权的观点显然是幼稚的，因为国家主义的原则依然在地方和联邦两个层次运作（尽管是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达尼认为，由于认为其自身就构成了主权，美国人不得不假设和维持一种特定的政治社会和政治身份。^② 但这恰好是关键所在，当我们审视这一社会和身份的特殊性时，费城模式中的主权为何会走上国家主义的路径并因此而显得不同和特别，便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据估计，当 1776 年独立宣言发表之时，仍然有 650 000 奴隶，250 000 的契约佣工和 300 000 的印地安人——其中大约有四成的是成年男性。当然，除此之外的妇女也没有投票权。达尼承认美国的共和主义致力于强调“自由的土地和自由的人”，^③ 但他却难以理解为何他所竭力阐述的人民主权思想竟

① Ibid, pp. 209, 202.

② Ibid. p. 211, 205—6.

③ Hoffman, *State, Power and Democracy*, p. 152; Deudney, 'Binding Sovereigns', p. 206.

然离经叛道的染上了意识形态的色彩。

托克维尔 (Tocqueville) 以其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对美国大众民主的称道而闻名于世。但是在托克维尔暗含了在平等主义政治逻辑的民主概念和奠基于私有产权的社会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张力。一方面,他认为(差不多是以柏拉图式的语气)民主是保证平等“普遍和永恒的”力量,已经摧毁了封建制度并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国王,“即便是在中产阶级和富者阶级面前也不会有丝毫的退却”。同时,达尼把私有产权看作是美国繁荣的奥秘所在,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法国所指称的民主在美国将被视作是非法的。^①

但是关键在于托克维尔所探询的私有财产权具有独特的性质。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费城模式下的美国缺乏一个欧洲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因此托克维尔才会为美国相对广为分布的财产私有权(通常是指土地)所深深触动。但是如果没有 18 世纪 30 年代欧洲式的无产阶级,这里也就不会有遭受剥夺的北美土著居民和卖身为奴的黑人,这些剥夺和压榨和私有财产的拥有者基本上是成年白人男性并非是一个偶然的巧合。^② 而在此存在着一个把秩序强加于(其他人)那些妇女,黑人和美洲土著居民的国家之背景下把民主视作是人民主权的做法不得不让人产生质疑,也正是这些遭受剥夺的人很明确的被排除在“人民”的行列之外。

①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pp. 8, 294, 828.

② Hoffman, *State, Power and Democracy*, pp. 137—8.

托克维尔对殖民者施加在印地安人和黑人身上的种族歧视，种族杀戮，欺骗和掠夺所进行的激烈抨击至今仍值得一读。可以认为托克维尔对美洲土著居民和黑人的讨论“偏离了我的主题”，但是有一点是值得争论的，即托克维尔对美国种族和役奴政策严厉的谴责使得他贯之以美国“最广泛和彻底之民主”的特征充满了疑问。^① 如果民主包含了自我管理和大众统治（这也是托克维尔理论的逻辑结果），那么它如何同那些他记忆深刻的野蛮行径和纷争和谐共存呢？只要人民主权吸纳了国家主义的特性，其民主的信誉就会遭到质疑。

民主和专制论

达尔认为（我认为是很恰当的）当个人被强迫遵守法律时，民主在此意义上已遭到了损害。正是对强制力的诉求危及到了人民的自我管理。^② 而这一点正是那些把民主和人民主权视作为有害的政治性原则的关键所在。

而克瑞克(Crick)在对民主的批评中指出人民主权本质上是专制的。由具有单一政治意愿的人民组成同质实体之想法是危险和令人生厌的，因为它暗含了以暴力和恐怖来保障全体一致性的题中之意。人民主权的民主信条威胁到了那些众所周知的

①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pp. 391—421.

② Robert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37, 51, 90.

主 权

对先进社会所具有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之基本洞见,而这正是国家的来源和基础。^①但是克拉克自己关于“大众专制”的例证使得以武力保证秩序的能力正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变得明了起来。

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最近就指出,民主的逻辑和自由主义的逻辑最终是互不相容的。民主包含着她所谓的同一和均等的逻辑,然而自由主义表达的则是多元和差异的逻辑。这使得墨菲断言民主必将导致大众意志主导下的独裁统治。^②同时,她提倡一种尊重差异,多样性和个人自我决定的政治实体。但是这一政治实体是国家的一种形式吗?墨菲在此问题上含糊不清的立场在对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这位战前保守派的态度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她赞赏施密特强调把政治视作为朋友和敌人间的差异,她进而同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们进行了对比,比如罗尔斯(Rawls)和德沃金(Dworkin)把政治弱化为道德(像她指出的那样)、合理性,抑或是哈耶克(Hayek)的市场机制。但是当施密特因为把政治视作为冲突而受到赞许时,墨菲却由于施密特公然以国家主义的方式来阐释冲突而陷入尴尬的境地。^③

① Crick, *In Defence of Politics*, pp. 61—2.

② Chantal Mouffe, 'Radical Democracy or Liberal Democracy?' in David Trend (ed.), *Radical Democrac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 25, 21—2.

③ Ibid. p. 23. See also murray Forsyth, 'Carl Schmitt: *The Conception of the Political*' in Murray Forsyth and Maurice Keens - Soper (eds), *The Political Classics: Green to Dwork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Darinda Outram comments that Schmitt sees sovereign individuals as 'a positive threat which the state must ward off': Darinda Outram, *The Bod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4. My thanks to Laura Brace for drawing this reference to my attention.

她认为，施密特所提及的对敌人的“消除”不应该被理解为是肉体的清除，尽管她把政治等同于权力、冲突和差别，但她并不同意施密特那典型的有别于朋友和敌人之间的，包含了压制和强制力的国家主义信仰。^① 如果民主是国家的一种形式，那么施密特就是对的，民主的确依赖于这种压制性的“同一性逻辑”。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民主是政府性（governmental）的而非国家主义的（statist）（根据我的专有术语），那么冲突只能采取尊重争端参与者身体完整性的方法加以解决。

实际上墨菲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她指出需要对“社会行动者”（假想的实体性个人或个体）和“主体地位”的多样性（其中的行动者是多变和暂时的）进行区分。但是这一多样身份的多元性构成了现代民主的基础，并且“预先排除任何达成最终一致的奢望”，^② 只有我们把民主和国家分离开来时，民主才变得真正有意义，而墨菲正是在这一关键概念上显得不确定和混淆不清。

那些支持专制论的人弄不清是什么使得人民主权的理念变得麻烦不断，他们也许认为是民主而非其他，但是可以用国家主义的传统来解释这一事实。正是国家而不是民主损害了个体通过协调解决差异和保有多元与多样性身份的能力。

① Mouffe, 'Radical Democracy or Liberal Democracy?', p. 25; Forsyth, 'Carl Schmitt: *The Conception of the Political*', p. 95.

② mouffe, 'Radical Democracy or liberal Democracy?' p. 25.

民主和世界主义 (cosmopolitanism)

赫尔德认为民主的问题必须建立关于他所谓的“涵盖了地方性的、国家的、局部的和全球性的结构和过程”的理论。^①一个全球性的民主模式是对正在形成的全球化系统现实的回应。我在前面曾经指出，赫尔德模式受到后国家主义逻辑的支撑。^②但是这一逻辑受到了那些不愿意用后国家主义方式对主权进行概念化的观念的阻挠。赫尔德认为现代国家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可预见的未来，且主权需要以国家主义的话语进行界定。因此他声称当国家体制下超国家机构的决策权不断遭到削弱时，主权就受到了损害。赫尔德还指出，主权在地区、国家和地方性机构之间被进行划分，并且还受到多重组织机构的限制。^③

但是这又引起了争论不休的合法性问题。如果我们认为可以对主权进行划分和限制，那么我们不是又回到了前现代的国家主权概念了吗？赫尔德提出的挑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重新对主权进行界定使其能够和多重性、多元性以及异质性协调共存呢？他指出，主权的合法性来源于世界性的民主法则，而这

① David Held,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Cambridge: Polity, 1995), p. 21.

② John Hoffman, *Beyond the State* (Cambridge: Polity, 1995), pp. 211—13; See David held, 'Democracy : From City States to a Cosmopolitan Order' in David Held (e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Oxford: Blackwell, 1992), pp. 10—39.

③ Held,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pp. 22, 99—100, 135.

些法则既涵盖了国家，也涵盖了次国家实体和国家间的实体。主权应该同具有固定领土和边界这些个观念剥离开来。就像一个“可伸展的时空体”一样，主权展示了其能够表现为从国家到城市和地方自治政府的多元自制（自我调节）联合体。赫尔德希望在不排斥主权概念之国家主义需求的情况下，拓宽主权概念的内涵。但是，如果民主涉及到了多元化的权力分配，那么国家对权力独占性和至上性的渴望便是不可回避的。主权包括了多元化和多层次的联合体，并不是因为其被分享或是被分割，而是因为其作为一个自制体（self-regulating）之特质需要被重新概念化。^①

赫尔德并不愿意把主权从国家剥离开。他坚持认为现代国家并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而且其“理念”必得到扩展，实现对其边界的超越。^②但是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国家究竟是什么？如果同意其观点，那么就像我们曾经讨论过的韦伯主义者把国家视作为一个宣称垄断了合法强制力的组织，国家的民主化就意味着对其自身的超越，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国家就会突然魔术般的烟消云散了，它意味着在民主化的压力下，国家放弃了其独有的特权。一个明确与其他联合体分享权力的国家正在慢慢褪去其神圣的光环。

但是赫尔德把现代国家定义为一个“人为的人（artificial person）”——即一个非个人性的权力——而这也是国家能够超

① *ibid.* pp. 233—4.

② *Ibid.*, pp. 233.

主 权

越其边界的关键所在。但是问题在于赫尔德同时又把国家视为一个宣称垄断了合法强制力的组织。因此他认为可以把强制力的使用视作为“全球性民主法则面临威胁时”最后可诉诸的保障手段，而这一强制力可以由次于世界性权威的国家当局来提供。

然而所有的组织都应该致力于追求与非个人性权力相关的公平与公正，国家和众多组织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宣称垄断了合法强制力的实施。所以，当为这一世界性的民主模式描绘蓝图时，赫尔德合乎逻辑的超越了国家。他还为解决争端中的“非强制关系原则”（我则喜欢称之为非暴力的）进行辩护，倡导非军事化与超越战争系统。^① 同时，赫尔德也不愿意以质疑国家集中性和存在理由的方式来对主权进行界定。

民主与国家主义的对话

赫尔德自己也承认在民主和国家之间存在概念性的紧张。他认为，民主的进程依赖于这样的一个框架，在此框架中争端和冲突能够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解决，而且在此框架中公民享有平等的自主权。正像赫尔德主张的那样，如果暴力与民主的决策形式是不相容的，^② 那么它就象征着向国家的挑战和对此国家主权的实施。

① Ibid, pp. 271, 279.

② Ibid, pp. 187, 198.

我们开始触及到了赫尔德概念缺陷的核心。他把主权定义为自制联合体的权力，同时他又重新拾起自由主义原子式个人的传统，这也使得他认为主权、自由和自治必须受到共同体的限制。赫尔德主张必须实行大众的统治，^① 但是必须在限制“大众统治和主权范围”的框架下进行。而且只有当我们认为人民是具有国家主义倾向，并以反社会的方式来行使自由、自治和主权的个人之时，才能实施来自国家的限制。

赫尔德认为除了那些临时拜访共同体的人，或者是确定由于严重的精神缺陷以及有严重犯罪纪录的人被合法地剥夺参与资格以外，大众应该包括所有的成年人。这就把犯罪和严重的精神缺陷看作是不证自明和自然而然的（也就是没有任何人对他们施加了什么），而且，他们并不妨碍平等所涉及的合法性和一般条件。^② 这样，自由和自治也都染上了原子化的色彩——一些人享有而另外一些人则无权享有。我也承认过在公共利益需要聚合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持续使用强制力的权宜之计，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强制力会损害自由和自治，而排斥适合于自治的主权只会损害到主权整体。

赫尔德主张民主应该致力于减少和消除有损于自治的所有情形和组织，但是他赋予这一概念“理想”的色彩，而且应该同实际上可实现的自治状况区分开来。这一提法明显的存在着

① *ibid*, p. 222.

② *Ibid*, p. 208.

主 权

问题，因为它意味着在实际中理想将会脱离不断变化之现实^①——一个使得主权备受谴责的二元主义困境。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主权国家，甚至是在大多数发达的自由主义国家中，自主决定也仅仅只是一个理想而已，其中俨然是以强制力取代强制，以抽象、原子化的术语来解读自由和自治。一个无批判力的主权国家观（正如肯的观点一样）使得我们面对理想和现实之间那令人悲观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之时显得软弱无力。

赫尔德感受到了在作为自我管理之民主与宣称垄断了合法强制力之国家之间的紧张。但是他缺乏后国家主义的概念资源来对主权重新进行界定，因此，在一个无限和不可分割的世界，个体、联合体、国家和国家间机构都热衷于以民主过程为中心的自治。在解释性的脚注中，赫尔德承认以两种相冲突的方式使用“政治”一词。一方面是以国家的方式来界定政治，另一方面，政治则与社会机构改变环境的能力相关。^②

其实，赫尔德关于民主、主权和国家的关键性分析显得模棱两可。因为如果政治涉及到宣称垄断了强制力之国家的话，那么这对寻求主宰自己命运的个人自由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民主要想变得和主权相调和，那么主权就需要以一种比赫尔德的全球性民主模式更为一致，也更有说服力的方式同具有垄断性内涵的国家剥离开来。

① Ibid , pp. 210, 286.

② Ibid. p. 191.

第六章 女权主义

众所周知，女权主义存在着众多的表现形式，这样也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个问题：女权主义存在一个整体性的主权观吗？我将指出，女权主义彰显出一种解放性的逻辑，从而向主权国家等级制下的分裂性发起了挑战。

女权主义的批评为国家的独占性特征提供了深刻的洞见，而且女权主义者已经建构出自我主权（self-sovereignty）的概念，而自我主权概念的中心就在于彰显该概念自身。在讨论女权主义对主权的分析之前，我们需要澄清一下其多样性的问题。

多样性的问题

女权主义变得如此纷繁复杂，以至于连相互间进行区分的标准都备受争议。我们是应该沿着“意识形态”的系谱进行区分呢，还是应该以哲学性的话语来解读它？卡伦（Karen）就

主 权

经常对一些二元性的概念进行区分（第一波/第二波；古典的/现代的；人道主义的/女性中心的女权主义）和三重性的概念进行区分（平等主义/福音主义/社会主义及其反对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激进的女权主义）。麦吉·休姆（Maggie Humm）为了强调该概念的多样特性，反对从单一的角度谈论女权主义。

有一点主张是毋庸置疑的，即我们需要在该术语的理解上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① 但是按照我的观点，女权主义的多样性可以统一于其对妇女的自由和自治的关注上。其宽泛的定义使得我们可以把不同流派为妇女解放所作出的特定贡献视为作为一个整体——一个被整合为争取解放的总体性进程。很明显，像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这样的女权主义者就没有明确地提出妇女政治权利的问题。同时，她对丈夫所拥有的“神圣权利”发起了攻击，并对卢梭的自然主义提出了批评，她认为妇女能够很理性和独立地致力于实现我们所说的女性解放逻辑。

密尔和泰勒都主张妇女拥有投票权，但是他们并不否定家

① Karen Offen, 'Defining Feminism: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pproach' in Gisela Bock and Susan James (eds), *Beyond Equality and Differ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 74, 70; Maggie Humm, 'Preface' in Maggie Humm (ed.), *Feminisms*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2), p. xi. Nancy hirshmann and Christine Di Stefano support Seyla Benhabib's definition of feminism as 'the theoretical articulation of the emancipatory aspirations of women'. Feminists differ about the best way of defining 'emancipation', or indeed 'women', but agree to disagree about terms which 'bring them together as feminists'. Nancy Hirshmann and Christine Di Stefano, 'Introduction: Revision, Reconstruction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New' in Nancy Hirshmann and Christine Di Stefano (eds), *Re-visioning the Political* (Oxford: Westview, 1996). p. 22.

庭劳动中的性别分工。如果认为所有的女权主义在根源上都是自由主义的说法是正确的话（像泽娜·埃森斯汀 [Zillah Eisenstein] 所指出的那样），那么女权主义必然要向自由主义传统的父权制偏见发起挑战。^① 女权主义的问题（如果存在的话也是不明确的）在于自由主义关于个人都是男性财产所有者的假设，因此“自由的女权主义”这一概念显得问题多多。女权主义包含了解放的逻辑，但是为不同理论家所适用的理论假设却显得缺乏一致性和相互矛盾。

“社会主义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存在同样的问题。就社会主义者以共同体取代个人而言，他们完全忽视了广大妇女的地位，而且把其理论说得如此毋庸置疑，根本就算不上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所采用的诸如产品、共产主义、性别和暴力等父权制概念反映出了其反女权主义的偏见。^② 当然，也不能否认个别的社会主义者或者是马克思主义者为女权主义理论所作出的贡献。这只是要说明作为争取女性解放理论的女权主义与其他各式各样的衍生理论保持着泾渭分

① Diana Coole, *Women in Political Theory*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8), pp. 120—3, 144; Moira Gatens, ‘The Oppressed State of My Sex’: Wollstonecraft on Reason, Feeling and Equality’, in Mary Shanley and Carole Pateman (eds), *Feminist Interpretation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1991); Valerie Bryson, *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2), pp. 22—7, 55—63; Zillah Eisenstein, *The Radical Future of Liberal Feminism* (London: Longman, 1981), p. 4. See also John Hoffman, *Beyond the State* (Cambridge: Polity, 1995), pp. 148—9.

② Hoffman, *Beyond the State*, pp. 149—52. See Moira Gatens, ‘Power, Bodies and Difference’ in Michele Barret and Anne Phillips, *Destabilizing Theory* (Cambridge: 1992), pp. 121—2.

主 权

明的差别。

同样的异议也存在于对女权经验主义、女权立场理论与女权后现代主义“哲学性差别”的区分之中。^① 我们被告知，女权经验主义以“现实的”的方式来审视世界，其中家庭的、国家的以及国际性的政治都侵犯到了妇女的日常生活，但是它却把女权主义的批评仅限于此。现实有助于阐明权力的父权主义结构，而如果这些批判父权制的“现实”被孤立为单一的变量时，女权主义在整体上就会受到削弱。

被称之为女权立场的理论存在同样的问题。该理论从那些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女性角度对妇女的地位进行了评估。该观点在本质上倾向于把妇女看作天生具有同情心和人道主义关怀的，就像凯塞琳·琼斯（Kathleen Jones）一样，倾向于对妇女的经历进行生物性和自然性的分析。但是不应该用一般性和永恒的方法来看待这一妇女的立场。而且，由于采用了第三类变量，女权的后现代主义告诫了把特定的妇女经历作为永恒标准的危险，并因此而在分析他人“双重性”（binary）的排斥中把

^① Sandra Harding,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ontributions of a Feminist Standpoint' in Rebecca Grant and Kathleen Newland (eds),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41—50; Christine Sylvester, *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性别置于优先的地位。^①

应该再次强调的是，不应该孤立地考虑各种变量。如果把女权的后现代主义与作为女权主义整体的解放逻辑分离开来，你就会有在“多元性”的名义下终结这一讨论，并且否认妇女作为一个明确之群体的现实。女权主义就会变成一个失去了自我要素的理论和一个曾经被竭力描述为现代父权制最后空白地带的相对主义。^② 由于像女权立场理论和经验理论一样与一般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脱离开来，后现代的女权主义根本就不能被称为真正的女权主义。而有时对女权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的女权主义所做的区分仅仅是一个分裂性抽象概念的分析而已，在不同变量间日益泛滥的区分也只会造成损害该理论之整体解放逻辑的危险。正如我们经常所强调的那样，使得女权主义一致化的是对女性从属地位的反对：要成其为女权主义的就必须是对立于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和文化。^③

① Nancy Fraser and Linda Nicholson, 'Social Criticism without Philosophy' in Linda Nicholson (ed.), *Feminism/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1990), p. 20; Kathleen Jones, *Compassionate Authori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3), p. 202. See also Marysia Zalewski,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Mee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Feminist Version of David and Goliath?', *The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172: 2, 1993, p. 15.

② Jones, *Compassionate Authority*, p. 125; Anna Yeatman, 'A Feminist Theory of Social Differentiation' in Nicholson, *Feminism/Postmodernism*, pp. 292—3.

③ Offen, 'Defining Feminism', p. 83 For an argument that postmodern feminism should be supported over feminist postmodernism, see Sylvester, *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ncy Hirshmann, *Rethinking Obliga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所以只有具备了“无限的”特质，解放的逻辑才可能得以维系。正如安娜·亚特曼（Anna Yeatman）所指出的，具有解放逻辑的女权政治必须放弃一般性的前提和历史的最终性概念。^①在我看来，一个一致的女权主义就是一个深具历史解放感的概念。

女权主义和国家

作为一个以解放逻辑为基础的理论，女权主义似乎必须要实现对国家的超越。但是，我们却发现许多女权主义者并不这样看待国家。

海蒂·赫尔尼斯（Heidi Hernes）认为同她所谓的“亲妇女型国家（a women - friendly state）”相比，女权主义对国家的批评表现出一种自然的无政府主义。泽娜·埃森斯汀对此也持赞成的态度。国家本身并不存在问题，她提出一个“积极的但非干涉主义的国家”本质上是一个多元主义的和后父权制的国家。^②实际上，茱迪斯·艾伦（Judith Allen）甚至主张国家其实并不属于那些与正在发展形成中的女权主义理论相关的范畴，

① Anna Yeatman, *Postmodern Revisionings of the political*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4), pp. 6—7. See also Jones, *Compassionate Athority*, p. 182.

② Heidi Hernes, *Welfare State and Woman Power* (London: Norweigia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2—15; Zillah Eisenstein, *The Color of Gender* (Los Angeles: Un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 34, 172, 219. Contrast this with the earlier argument that the state ‘in and of itself institutionalizes patriarchy’: Eisenstein, *Radical Future of Liberal Feminism*. p. 227.

诸如“法律”、“官僚政治文化”、“身体”、“主观性”、“权力”、“家长式作风”、“厌恶女人”等。诸如此类的观点使得不太可能形成一种女权主义对国家主权的批判。

艾伦认为当凯瑟琳·麦克伦赋予国家男性的特征时，她把大众的文化，经济，宗教，语言，足球和一般的实际知识也视作为男性化的。通过这种方式，她在最为迫切的时刻摧毁了“男性国家”的特质，^①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除非我们能够表明国家确实是父权制的，那么艾伦无疑是正确的。女权主义者批评主权并不是必需的。麦克伦的问题在于她认为，由于男性暴力遍及社会的每个角落，国家仅只是其中的一个等级组织而已。但是这一看法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国家主权寻求施加“合法的强制力”于特定社会成员身上，并宣称拥有探究（用麦克伦的话）住宅，卧室，有职业或是无职业这些事物的权利。^②男性权力无处不在的特性来源于国家主权自身的等级本质。

艾伦同意“暴力”是女权主义理论固有的一个内在范畴（正如她所称的那样）。但使用强制力作为利益冲突之解决机制正是使得国家之所以成其为国家的关键所在。所以，麦克伦认为达尔把政治视作为一个包含了权力、权威、强制和强制力之

① Judith Allen, 'Does Feminism Need a Theory of the state?' in Sophie Watson (ed.), *Playing the State* (London: Verso, 1990), pp. 22, 27.

② Catherine Mackinnon, *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61, 169, 238.

主 权

系统的看法是富有启发性的^①——一个摧毁了任何对以国家解决利益冲突或以非强制力解决冲突进行区分之企图的概念。在麦克伦对利益冲突之解决方式中并没有为无国家社会留下什么空间。但是，格尔达·勒纳（Gerda Lerner）详细的阐述了国家的诞生是如何使得父权制的“创造”成为可能的。强制力表明了强奸、非法同居、卖淫和婚姻只可能发生在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里。^② 国家宣称其垄断强制力的实施仅仅意味着它只是众多父权制组织中的一个而已。这触及到了主权概念的关键点，即其中男性把女性视作为等级和分裂的过程之构成部分进行统治，而这一过程以把她者边缘化为代价。^③

艾伦注意到了整体性组织不同之处的重要性——警察局、监狱、法院、社会政策机构、教育、劳动、工业——有时被看作是国家的组成部分。^④ 她指出这些机构有不同的政策取向，在对澳大利亚堕胎政策的分析中，她指出了行政管理的扭曲和变动，而且其政策是进步的和家长制的混合物。但是按照我的观点，艾伦想阐述的并不是国家的细枝末节，而是把它严格的

① Allen, 'Does Feminism Need a Theory of the State?', p. 22; Mac - Kinnon, *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 pp. 119, 169, 170, 175.

② Gerda Lerner, *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76, 89, 101, 106, 212.

③ Hoffman, *Beyond the State*, pp. 153—4; Lerner, *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 pp. 42, 46; V. Spike Peterson, 'Security and Sovereign States: What is at Stake in Taking Feminism Seriously' in V. Spike Peterson (ed.), *Gendered States* (Boulder, CO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1992), pp. 38, 33, 45.

④ Allen, 'Does Feminism Need a Theory of the State?', pp. 22, 27, 30.

定义为宣称垄断了合法强制力之组织的重要性。只要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有可能区分（至少是分析性的）那些仅仅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管理的机构和那些以行使强制力作为最后保障的机构。由于明确的政府性组织行为与国家行为之间存在张力，冲突便在所难免。

当政策能够提供必要的资源并改革以男性为主导的组织时，女性便被赋予了权力。严格的说，这样的政策本质上是政府性的（而不是国家主义的），因为其运作并不需要强制力作为保证。罗伯特·康莱尔（Robert Connell）断言在女权主义国家中，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在语义上是自相矛盾的。但是这导致他没有向国家自身发起挑战，而只是代之以其称作的女权主义国家，“这样的女权国家只是为社会互动的激进民主化提供了一个舞台”。^①

这里存在的问题也是我们在赫尔德关于民主的分析中面临的问题：如果我们简单的以政府性的术语来界定国家的话，就会掩盖国家是一个宣称对合法强制力进行垄断之组织的现实；就会掩盖国家声称拥有分裂和明显父权特征之主权的现实。

琼斯和“主权的困境”

对于琼斯来说，当主权以一种等级制的和排他性的方式进

^① Robert Connell, 'The State, Gender and Sexual Politics: Theory and Appraisal', *Theory and Society*, 19, p. 539.

主 权

行阐述时，“主权的困境”就出现了。她认为，由于霍布斯用命令——服从的模式来界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不可能理解作为共同体的成员的个人是如何同他人发生联系的。

按照琼斯的观点，霍布斯之所以捍卫父权制是因为在他看来权威只能采取主权的形式。对于他来说，霍布斯式的国家不可能为“一个分立性的、孕育性的国家”（a dividing birthing body）所替代。霍布斯式的主权是男权主义的，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把领导权赋予男性（这也是他所实行的），而且是因为他以一元性和垄断性的方式来构想权威。^① 琼斯观点的核心问题就在于此，主权概念能够以女权主义而非父权的方式来界定吗？她认为，要女性化主权，我们必须跨越自由主义横亘在同情和权威、感情和认知、仁慈和理智之间的鸿沟。以女权主义的方式加以建构的主权包含了交流和对话，^② 而琼斯用来特指权威女性化的概念就是同情。

同情赋予权威“感情的联系”，以取代那种冷漠的、没有感情的和训诫的权威。在那样的权威下，我们陷入到一个“虚构的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景象中。琼斯认为，她人问题之独特性的事实并不妨碍我自己去感受这一痛苦。同情的话语只要一进入公共领域就会成为一种非暴力性的，保护性的、调解性的话语。就像哥白尼颠覆了权威的革命一样，它也一样需要包含

① Jones, *Compassionate Authority*, pp. 43, 50, 67, 89—90.

② Ibid., pp. 107, 117—18.

诸如自由和平等、正义和权力的概念。^①

但是，就琼斯而言，主权都是以男性主义，等级制和垄断性的话语进行阐述的。^② 但这是为何？为何我们不能重新界定这一概念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同情心”的自治性概念？为何主权必然要陷入到一个自负的，等级的和父权独裁主义的困境中？

主权和第二性 (The second sex)

很明显，在琼斯的观念里，妇女只有通过挑战男性的主权（压制性的和国家主义的）才能实现自我的解放。但是在我看来，一旦我们聚焦于怎样颠覆以强迫服从为特征的压制性男性主权这一问题上时，就必须面对这一事实：像权威、正义、权力和自治一样，主权也能够被重新界定。

在这方面，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对男性和女性的经典分析是极具启发性的。大体上，波伏娃把主权视为男性统治女性的特质，看作是男性的特权。而在一些情况下女性则和家长制联系在一起，其本身变成了强有力的统治者，或者是在家庭的范围内行使着权力，主权一词往往就意味着支配。有时，主权又和暴力和宗教联系在一起。波伏娃谈

① Ibid., pp. 143, 148, 177—9, 153, 214. See also Kathleen Jones, 'What Is Authority's Gender?' in Hirshmann and Di Stefano, *Revisioning the Political*, p. 84.

② Jones, *Compassionate Authority*, pp. 202, 207.

主 权

到，当女性为获取自由、远离奴役而各自为战时，国家主义主权强有力的特质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女性这种孤立的奋争更是无法撼动整个父权社会的体制。^①

但是，如果主权概念通常只意味着压迫和支配的话，那么在第二性中便不再如此。一方面，波伏娃把认为自己要高于其女性伴侣的男性描述为“沉迷在主权地位的保持中”，同时她还指出，当女性试图要摧毁男性的优先性时，需要重建其主权。^②而这仅仅意味着不是很彻底的统治的颠倒。在黑格尔著名的“辩证法”中（波伏娃所暗示的），主人依赖于奴隶，而女性就是奴隶。波伏娃希望开启她所称作的“卓越之光”。女性并不试图从内在来探求男性，因此至少在这个例证中，女性的主权（解放的）在本质上是区别于男性主权的（父权的）。女性宣称：寻求自我解放的奴隶主权和以他人为代价的主人主权是格格不入的。

这一本质上不尽相同的主权概念在波伏娃其他的理论表述中也显得十分明确。在对女性青少年时期的分析中，她认为对于青年女性来说，“在其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类和作为一个女性的地位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旦成其为一个自治的个体，她就必须放弃其主权。^③在此，主权似乎并不是简单的颠倒统治，而是以一个行新的压迫来替代另一个压迫。更确切的说，

①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pp. 18, 29, 125, 96, 135—6, 161, 397, 639.

② Ibid., p. 726.

③ Ibid., pp. 359, 360.

应该是女性已经控制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波伏娃指出，在女性所占据的家庭事务领域，“在那儿女性能够控制周围的事物，而且在那儿，女性能够享有不太稳定的主权”。波伏娃暗示（同意但不明确），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享有的不稳定自由与压迫性和剥削性的父权社会所施加的自由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当“主权之主体”一词与男性联系在一起时，它往往意味着暴力、专制和占有。而在另一方面，当波伏娃对父权社会中被认为是获得解放的女性状况进行分析时，“主权之主体”这一术语却表达了不同的涵义。为了凸现其女性的柔弱气质，波伏娃指出，女性“必须抛弃主权的主体地位”。^①在我看来，这也是波伏娃在第二性中不断重申的观点：主权并不一定就是一种统治他人的能力。

女性化主权

布雷斯（Brace）把波伏娃理论中含蓄的表达进一步明确化了。个体的主权可以采取不同的相冲突的形式。布雷斯把霍布斯视作为男权主义特质之个体的典型代表，却也主张女权主义者应该从17世纪英国著名的激进理论家杰拉得·温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那里得到借鉴，创造自我和主权的全新概念。

^① Ibid., pp. 616, 691.

主 权

然而霍布斯和温斯坦利都没有直接的讨论自我主权的问题，他们的描述都是暗示性的。虽然霍布斯把个人看作是竞争性和原子式的，温斯坦利却坚持强调整体、共同体和相关的重要性。布雷斯认为，温斯坦利思想的要旨在于其包含了对共同利益的承认，对重叠共识的重视及其对统治与支配理念的斥绝。^①而对于霍布斯来说，个人的自治就像国家的自治一样，它包含了相互间的不信任、恐惧、征服和理所当然的强制力的使用。人们之间的关系笼罩在意外和不真实之中，个人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独立王国中。通过比较，温斯坦利提到了“领地”（domain）而不是领土（territory），其中主权的个人同他人相互联系、共同工作。那么，温斯坦利的理论有何裨益呢？布雷斯认为，正是其提出的相联系的主权观。换句话说，琼斯用来重新界定权威概念的论调在此能够被用来重新界定或重申主权概念。^②

布雷斯的观点和奥芬（Offen）的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对于奥芬来说，她试图通过探询欧洲大陆“联系性”的女权主义传统和盎格鲁——美洲“个人性”的女权主义文化来界定女权主义。奥芬认为，当这两种传统相互冲突时，女权主义就会面临着内在的缺陷和片面性。相关联的女权主义通过孕育和养育孩子的能力，把女性界定为一个明确的群体，并一再强调其重

① Laura Brace, 'Imagining the Boundaries of a Sovereign Self' in Laura Brace and John Hoffman (eds) *Reclaiming Sovereignty* (London: Pinter, 1997), pp. 137, 139, 149.

② Ibid., pp. 139—41, 142—3, 147—9.

视女性权利的传统。但由于把“差异”和静止的本性观联系起来，使得该理论传统对国家持支持的态度，而对个人自由的态度比较随意。在另一方面，个人主义的传统则比较强调女性个人享有平等权利的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它却忽视了多数女性在生活中受压迫的事实。^① 总之，两种女权主义的传统都需要在女权主义理论中寻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自由传统之上的建构

奥芬把女权主义与“自我主权”的概念等同起来。个人主权的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但是要想成功的维系它，就必须把它同包含在自由传统中的等级、国家主义和父权因素剥离开来。

一般都主张，为了他人着想，个人应该舍弃自己的利益并专注于那些所关注之人的状况。但是布雷斯警告道，这种论调在理论上存在着反自由和社群主义的性质，他还借用温斯坦利和杜西娜·康乃尔（Drucilla Cornell）的观点支持其关于主权的概念，这一主权包含了个人的特质，它允许我们“建构和重构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话语”。^② 换言之，一个女权主义的主权观必须兼顾个人性和差异性。权力和政治之所以在社会关系中是必要的，恰恰是因为差异会制造紧张和冲突，而且这些冲突

① Offen, 'Defining Feminism', pp. 76, 78, 85.

② Brace, 'Imagining the Boundaries of a Sovereign Self', pp. 151—2.

主 权

需要不断的进行解决。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但会在个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头上时遭到破坏，而且也会在否认其独特个性屈从于他人时遭到损害。珍妮弗·尼德爾斯基（Jennifer Nedelsky）认为，皮肤的比喻（而不是隔墙）更能够让人领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界限，因为它对周围的感知是可渗透的、极其敏感的。对此，布雷斯不无挖苦的说道：“我们需要重申某种以自我理念为基础的主权观，否则我们就会发现如此多的人将处在皮肤的重压之下。”^①

在以女权主义观念重塑主权概念的时候，我们对自由传统之个人主义的吸纳是至关重要的。主权的个人是那些作为独特的、平等的以及自治的存在物与他人发生联系的人。但（Cynthia Daniels）辛西亚·丹尼爾斯抨击了胎儿权利的概念——该观念认为：由于胎儿已经独立于孕育它的母体，所以婴儿还在母体子宫中时就享有了权利。她指出，这样的概念构成了对女性“自主权”的冲击，那是她身体完整性的权利。丹尼爾斯进而指出，特别是那些贫穷的妇女，有色人种的妇女和来自于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妇女，她们的身体往往只是被视作为国家的财产而已。因此，当怀孕的妇女实施了有损于胎儿的行为时，她被认为是在自虐，而且当这一行为被诉诸于司法时，其只会损害女性作为民主社会成员的自主权。^②

① Brace, 'Imagining the Boundaries of a Sovereign Self', pp. 151—3; Jennifer Nedelsky, 'Law Boundaries and the Bounded Self', *Representations*, 30, 1990, p. 176.

② Cynthia Daniels, *At Women's Expens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5, 32, 131.

对自主权的宣称威胁到了父权的存在。丹尼尔斯以雄辩的例证论述了通过社会发展确认个人自治权利之政体的合理性。但是，其理论也存在着不可回避的问题，这就是她赋予了“自主权”自由传统最为基础之权利的特征，而且她还通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来实现公共领域的“去男权化”，而在这样的国家中，主张以同情的文化取代复仇的政治。^① 自由权利已经演变成内化了强制力的国家主义传统的一部分，我们只能在实现超越的基础上重建这一传统。正如丹尼尔斯指出的那样，自主权的关键在于：当强制力被用作解决利益冲突的途径时，自主权就会遭到损害。

因此，只有当女权主义的主权观内在一致时，它才可能明确的向宣称垄断了合法强制力的组织发起挑战。一个建立在同情、平等、尊重差异以及理解个人如何通过社会联系获得自我认同的主权就是一个打破了压迫性和等级性之国家逻辑的主权。

^① Ibid., pp. 5, 131, 138—9.

第七章 后现代主义

我想要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在本质上渗透着反独裁和反国家的逻辑。作为一个后国家主义的概念，它在主权的发展演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对国家主权的解构中，一个全新的概念本身就是必不可少的。能否避免那些无尽的假设，静止的基础以及本质上抽象、不真实的自由和解放，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后现代主义颠覆性的逻辑常常会与那些有着特定立场的人发生冲突。如果后现代主义积极地致力于后现代主权概念的阐述，那么就需要重新认识现代主义的集中性和现代主义的主权概念。

国家主义和哲学的批判

后现代主义者那抽象和绝对的思维特征已经使得后现代主义的概念界定显得尤为困难。曾有一位作者特别地强调后现代

性，但他承认“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应该被视作为两个不同的术语”。另有一位曾经致力于区分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区别的理论家暗示“后现代主义是一门艺术，而后结构主义则是哲学和社会理论”。但是，我主张采用一种更为宽广的后现代主义视角，这一视角近来被贯之以艺术理论、后结构主义和后工业社会观念相“聚拢”（convergence）的特征。^①

沃克尔（R. J. B. Walker）警告说，不能用一种为了强调聚拢而牺牲差别性的“整全化（totalising）策略”来界定后现代主义。^②而按照我的观点，该问题可以通过建构一个这样的逻辑来加以解决，该逻辑既能使得我们考虑到后现代主义批判特性，又能够消除个体践行者在对抗该逻辑的整体性涵义时出现的分歧和矛盾。所有的后现代主义者在对国家主义和等级制的思维模式上都是持批评态度的。

在西方文明中一直抱有这样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我们的制度都是围绕着二律背反或者二元论建构起来的。当一个命题以一个二元化的术语来描述世界时（其中一半被认为是

① David Lyon, *Postmodernity*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7, 18; Michael Ryan, 'Postmodern Politic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5, 1988, p. 559; Marianne Marchand and Jane Parpart, 'Exploding the Canon: An Introduction/Conclusion' in Marianne Marchand and Jane Parpart (eds), *Feminism/Postmodernism/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2. See also Linda Hutcheon,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and John Hoffman, *Beyond the state* (Cambridge: Polity, 1995), p. 236.

② R. B. J. Walker, *Inside/Outs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88—9.

道德的，而另一半被看作是邪恶的)，该命题就是二元论的。而在两个对立面之间的关系是等级制和极权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话语是指那些（这些例子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非此即彼的术语：真理对抗虚伪、一致性对抗多样性、主观对抗客观、男性对抗女性，等等，我们终究只能择其一而从之。总之，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理论中，兼顾两个对立面是不可能的。

指出这一点的意义在于，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c）或者是独白式（monological）的观念是极权主义的，让人难以容忍的。每一个二元的对立面都面临着被“敌人”消灭的威胁——用零和博弈的术语表达就是：赢者全赢，输者全输。我之所以把逻各斯中心主义视作为国家主义的概念，是因为它和韦伯关于国家的理论是如此之契合。利奥塔（Lyotard）就曾把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命题视作为“合法化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 of legitimation），而国家仅仅是提供了一个特权化的合法性话语，它是一个其自身并不需要合法化的合法主体。韦伯指出，国家是“世界上最高和最终的事物……是地球上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组织”，^① 这些观念也彰显了国家需要以一种抽象思维进行哲学审视的必要性。

在对真理来自于那些高高在上的神圣概念发起挑战的过程

^① Nancy Fraser and Linder Nicholson, 'Social Criticism without Philosophy' in Linda Nicholson (ed.) *Feminism/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1990), pp. 22—3; Hoffman, *Beyond the State*, pp. 163—5; John Hoffman, 'Postmodernism, the state and Politics' in Jane Dowson and Steven Earnshaw (eds), *Postmodern Subjects/Postmodern Texts* (Amsterdam, Rodopi, 1995), pp. 101—15.

中，后现代主义对国家之所以具有合法性是由于其宣称拥有施加强制力之权利的观念产生了质疑。后现代主义把所有的知识概念化为一个话语的过程，把话语看作是践行着权力的理论。它赋予理论以实践的特征，并使得我们所有的思维政治化，因为政治本身就来源于我们对正在发生的差异的感知。这种对差异的感知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而这种冲突正是政治所试图解决的。显而易见，在拒斥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等级思维模式的同时，后现代主义并不排斥政治，它仅仅是向国家发起了挑战。

阿什利对国家主权的批判

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着重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展开的批判。他认为，国际关系领域的现实主义理论和新现实主义理论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假设世界性事务只能围绕着主权国家的活动展开。因此这一理论同时开启了一对矛盾的对立面：即一方面的国家之主权和另一方面的无政府状态。阿什利借用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理论指出，逻各斯中心主义把自己表述为“一种主权的聲音”——一种更高的现实，一种规制性的理念。与此相反，无政府状态却是消极的、衍生性的，因此这样的矛盾必然

主 权

会危及到主权的理念。^①

阿什利的批判集中在作为对话的“英雄行为”之上，这种行为总是以对抗性术语的形式出现。在政治理论中，主权总是在我们的袒护下与无政府状态共存着。我们要不就支持主权国家，要不就支持无形的、非理性的和破坏性的无政府状态。阿什利承认他从米歇尔·福柯的理论中获益颇多，但是同时，他在比福柯的理论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主权概念。然而，阿什利把主权和现代主义联系在一起，而福柯则把主权视为一个通过实施公开、明确之暴力实现对客体绝对控制的中世纪组织。所以，17、18 世纪这种监视的出现创建了一种新的包含了器械、技术和设施的权力机制，福柯认为这种权力机制“绝对是和主权的叙述格格不入的”。^②

对于阿什利来说，主权并不简单的等同于一个特定的国王或统治者。它是一个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原则——其形式可以是

① Richard Ashley, 'Untying the Sovereignty State: A Double Reading of the Anarchy Problematique', *Millennium*, 17: 2, 1988, p. 228; Richard Ashley, 'Living on Border Lines: Man Poststructuralism and War' in James Der Derian and Michael Shapiro (eds), *International/Intertextual Relations*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1989), p. 261. See also Richard Ashley, 'Imposing International Purpose: Notes on a problematic on Governance' in Ernst Otto - Czempiel and James Rosenau (eds), *Global Changes and Theoretical Challenges*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1989), pp. 20—90; and Richard Ashley, 'The Achievements of Post - structuralism'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40—53.

② Alec Mchoul and Wendy Grace, *A Foucault Primer* (London: UCL Press, 1993), pp. 62—3.

“个人的行动者、团体、阶级或者是政治共同体”。就阿什利而言，主权的声​​音应该是一个包含了能够在国家中找到最为一致和最广泛表述的抽象性逻辑和多样性逻辑。主权国家已经背负上教条主义的、傲慢自大的特质以及意义和真理终结来源的惟我法则。主权的状态就是一个对其自身合法性和权力之基础进行界定的合法性权力。^①

所以，这样的抽象组织和强制力联系在一起一点也不让人觉得惊讶。现代政治的话语把国家视作为“惟一的中心点，并保有暴力，对资源进行理性的管理”。无论在历史的什么场合，只要存在拒绝顺从“主权者意志”的状况，强制力和暴力都会付诸于实施。国家就是“理性集体暴力的承载主体”，而国内社会和“对象领域”必须要服从于国家主权的监视——这种监视必然要诉诸于强制力来保证秩序。^②

解构和对话——两者择其一的问题

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那种教条的、压制性的独白必然会受到“对话”或是解构的挑战。对话开启了一个新的可能性并构成了一个内生的批判。当质问（interrogated）在后现代主义中大行其道时，对话也摧毁、颠覆和取代了其自身的确定性

① Ashley, 'Untying the Sovereignty State', pp. 230—2, 250.

② Ibid., pp. 255, 235, 246; Ashley, 'Living on Border Lines', p. 268.

主 权

和主流声音。^① 因此，这一观点变得更加清晰：即主权国家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它一直试图加以排斥的无政府状态息息相关，并且具有它们所迫切需要的合法性。

正如阿什利所指出的，现实主义者的问题在于：当他们用全球性的话语界定其价值时，他们仍然在普遍意义上赋予了主权国家以特权的地位。因此，就像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一样（其观点我们将在稍后进行解构），在主张国际社会应该以法律和道德进行治理的同时，又赋予了该社会无政府状态（同那种静止和永恒的主权国家存在相比）的特质。

但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只能通过对主权国家之竞争对手的概念化描述来表述自己。就像阿什利把所谓“国际政治中自由多元对话”中的非国家行动者视作为与国家共存的独裁主权者一样，“他人”不会被承认是多元对话中具有合法性的行动者，他们常常遭到排斥和边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基督徒、人道主义者、激进的社群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都批评这一国家观仍然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因为它把无产阶级、改革运动者、启蒙牧师和新的社会运动视作为压迫和排斥他人的抽象理性行动者。如果这一国家观把国家的终结和时间的终结等同起来，而且把无国家的世界描述成一个历史已经终结并且已经完全服从于人类意志的社会，那么，即使是公开的批判国家，其

^① Ashley, 'Untying the Sovereignty State', p. 234; Ashley, 'Living on Border Lines', p. 319; Hoffman, *Beyond the State*, p. 166.

仍然深陷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图圈之中。^①

阿什利想阐明这样一个观点：当一个叙事（永恒的）让位于另一个时，国家主权不能够说是被解构了。如果抽象的现实主义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那么抽象的乌托邦主义也是如此。正如阿什利所说的：无论“集中的自治和强有力的书写（central autonomous and powerful authorial）”是否包含了一个世界性的国家、一个霸权、自然法、上帝或者是人类实在的法则，解构也不能被视作为一种惟一的、绝对的出路。用阿什利的话说，只有当读者本身拒绝“为英雄行为的勒索付出牺牲时”，解构才是可能的。而这种所谓的英雄行为迫使我们要在承认事物实用性和对客观现实进行批判的理想主义之间作出最终的抉择。^②

进行对话和解构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从外部引进抽象和永恒的原则，而是在国家自身假设的基础上进行。并不是这些批评家把主权和垄断联系在一起，主张合法强制力之实施的：而正是国家自身的逻辑诉求！用阿什利的话说，一旦英雄行为受到对话或者是解构立场的挑战，国家事实上变成一个“竞争性个人和机构的复杂混合体”就显而易见了。^③ 正是在分立的组织

① Ashley, 'Untying the Sovereignty State', pp. 240, 245; Hoffman, *Beyond the State*, p. 183; Ashley, 'Living on Border Lines', pp. 268—9.

② R. B. J. Walker and Saul H. Mendlovitz, 'Interrogating State Sovereignty' in R. B. J. Walker and Saul H. Mendlovitz (eds), *Contending Sovereignities* (Boulder, Co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1990), p. 2; Walker, *Inside/Outside*, p. 14; Ashley 'Untying the Sovereignty State', pp. 242, 253—4.

③ Ashley, 'Untying the Sovereignty State', pp. 244.

主 权

和竞争者之间存在着紧张，而这些竞争者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却讽刺性的为国家主权话语的存在所暗含着。所以，要在向善的国家和向恶的国家之间作出抉择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过的，国家抽象的本质并不会因为代之以一个同样抽象的选择物而消失殆尽。因为，我们始终面临着排斥妥协和对话的利益冲突，国家强制力的保有在所难免。

正是在这一点上，国家的解构开启了阿什利所谓的“考量和践行全球性政治的新方法”。^① 而且这种应对利益冲突的新方法必须要被概念化。在国家主权的解构过程中需要加以阐明的是：正是国家其自身孕育了共同体和公共利益的概念——这一概念同时与独断和排它的秩序之寻求方法处于紧张之中。如果没有关于国家的意识和声音，要想在后现代主权概念上取得进展是难以想象的。

后现代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问题

我已经把后现代主义视作为一个向主权国家之中心逻辑发起挑战的颠覆性逻辑。但是后现代主义者并不必要采取特定践行者的特殊立场。像阿什利一样的后现代主义者相信在没有提供可替换概念的情况下就可以解构国家主权的概念。他把主权等同于国家，却没能弄清后现代语境下的主权究竟为何物。

之所以没能把主权和国家分离开来是由于相对主义的作

^① Ibid., p. 254.

祟。阿什利认为在发展关于无政府问题群的对话性解读中，他并不试图“强加一个标准和判断”。他认为（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对话性的解读能够大大丰富现代全球性政治困境的叙述。^①但与此同时，他坚决反对那种对主权国家进行独白式解读之“判断”的存在。

阿什利的观点表现了其突出的怀疑论立场，这也导致他拒绝承认其理论具有实用性的内涵。对于阿什利来说，所有理论的立场都是同样专断的。而且不论是国家还是主权都是“难以决定的”。阿什利一再重申，他不会徒劳地去论证“哪些理论假设是真实的，哪些理论是假的”。恰恰相反的是，所有知识的实践都是“权力的专断行为，借助于这一专断行为，意义的传播得到规范，话语的描述解构被限定在历史中”。阿什利认为，无政府问题群的支持者们长期以来就有着他们对“相似观念”的实际反应，他还借用沃尔兹（Waltz）的话“理论假设本来就没有真假之分”来指出：我们所能指出的仅仅是“它们是理论结构所必需的”。^②

但是这使得后现代主义者处于一个奇怪的立场上。由于阿什利承认哲学的怀疑论是国际关系领域霸权和（没有明确指出）现代主义者尚武的理论渊源所在，也就是说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都被整合进现代主义的哲学中去了。怀疑主义和相对主

^① Ibid., pp. 228, 234, 254.

^② Ibid., pp. 248, 250, 261; Ashley, 'Living on Border Lines', pp. 320, 279—82.

主 权

义是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实质所在,并且可以从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著作中找到其“现代”的形式。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阿什利所采用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把他和其致力于挑战的组织——主权国家联系在了一起。如果后现代主义像其它的话语一样专断,那么它也会具有独断的“主权声音”,会强加“话语叙述”的结构于历史之中,并且会包含着试图消除其多样性理论假设的国家主义逻辑。^①

比如,当阿什利认为解构并没有触及到一些以“更高级的逻辑原则”,或者是来自于一些“更高理性观念”为基础的文本,他似乎在假设(如他的语言所暗示):逻辑和理性自身在本质上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但是,正如亚特曼正确指出的一样,后现代主义者“并不排斥理性,但却把理性世俗化了”。所以当他们拒斥亚特曼所谓的“理性的英雄形式”时(一种支撑阿什利之英雄行为概念的形式),后现代主义者依然笼罩在理性耀眼的光芒之下,而这种理性被认为是来自于历史进程,敏感于历史进程的逻辑。亚特曼承认,在后现代主义内部存在着与“虚无的相对主义和社会失范”相联系的潮流,但她主张与现代性保持一种解构性的关系,这样就可以改造普遍主义、理性主义和解放逻辑而不是加以拒绝和抵制。^②

我们需要超越(而不是简单的否定)解放和理性的抽象观

① Hoffman, *Beyond the State*, p. 171.

② Ashley, 'Untying the Sovereignty State', p. 251; Anna Yeatman, *postmodern Revisionings of the Political*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4), pp. viii - ix, 9-10.

念。正像桑德拉·哈丁 (Sandra Harding) 曾指出的：这也是为何我们不应该通过放弃告知现实之“真相”的目标来假设它，同时我们还必须停止误导他人。为什么会说除非有些事是绝对永远正确的，否则它绝对是错误的呢？^① 所以，相对主义者只是颠倒了现代性而没有实现对其的超越。就像是之所以取代上帝就是为了改投魔鬼的门下一样，像主权的国家主义论调那样（像阿什利自己表明的），偏袒并屈服于英雄行为的肆虐。

那些认为主权之概念是“难以决定的”或者是不能进行定义的人，最终都采用了国家主义的主权观。在此，阿什利加入了像韦伯和巴特森之类的后现代主义者（就像我在第二章谈到的），采用了实质上是国家主义的观点，严密的阐述了主权的存在观和意义观。因此，巴特森以典型的国家主义方式围绕抽象对立面的选择建构其理论。这些传统的现代主义者往往会选择超历史的涵义，比如巴特森喜欢用“偶然性”来取代理智，提倡随意性；他偏好无政府状态，而不是秩序。但是，这就产生了主权之国家主义路径所导致的“极端化”选择，并暴露了这样的问题：颠倒二元论的方法并无助于我们实现对其的超越。

巴特森告诉我们他已经像一个“典型的实证主义者”一样

① Yeatman, *postmodern Revisionings of the Political*, pp. ix; 6—7. Sandra Harding, *Feminism . Science and Anti - Enlightenment Critiques* in 'A Feminist theory of Social Differentiation', in Nicholson, *Feminism/Postmodernism*, pp. 292—3.

主 权

触及到了文本。^① 但这意味着像阿什利（同意沃特茨的怀疑论）一样，巴特森以一种抽象演进和静止启蒙的方式借用了不过是现代主义者之信条的相对主义。

解构和“特权化”的现代性

在对一个论点进行解构的时候，我们需要承认现代性必须得到重建，而不是简单地加以摈弃。^② 当阿什利关注像沃尔兹之类的现代主义者提出的问题：没有秩序的保障者能维持秩序吗？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的合作是如何可能的？^③ 他为说明解构是如何在实际中进行的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范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有可能引领我们走向一个超越国家主权的逻辑。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像国家自身一样，非国家的行为者为了保持其垄断强制力的专利，也能够驱逐、排斥和边缘化“外来者”。但是，一旦我们承认一个主

① Jens Bartelson, *Genealogy of Sovereig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45—6, 10.

② Ashley points to the superiority of the dialogue or heterologue over the monologue. But this an Argument can only be sustained if we assume that modernism is not just an arbitrary sovereignty voice, but provides the conceptual tools—reason, history, the individual—upon which postmodernism builds. See Ashley, ‘Living on Border Lines’, p. 292, Ashley, ‘Untying the Sovereignty State’, p. 242.

③ Ashley, ‘Living on Border Lines’, p. 291; Ashley, ‘Untying the Sovereignty State’, p. 227, 243.

权国家受到了其他国家的限制，一个明确无误的颠覆性概念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因为不管这些“外来者”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者，国家“侧面”的形象已经开始显现（阿什利语），并与作为一个能完全掌控自己命运的自制机构的国家之“正面”形象格格不入。

当一个主权国家受到其他国家限制时，问题就出现了：那些把国内划分为“内部”，并与世界性的“外部”截然分开的确定无误的界限出了什么问题？^① 在国家间和国际关系中出现的多元性对传统主权国家的概念提出了质疑。但是已经取得的共识是：在现代世界中，分立和平等的主权国家已经开始形成。在前现代的话语中，由于没有由独立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之概念，所以就想当然的认为干涉主义和高高在上的神的意志还完整的保留着。

那么，为何国际“社会”的理念会间接的颠覆它所捍卫的国家主权呢？一方面，布尔（像怀特一样）并不挑战国际社会是由主权国家构成的理念。^② 而另一方面，布尔不仅仅假设一国对主权的宣称是得到其他国家承认的前提条件，而且还特别强调了他所谓的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政治“尴尬的事实”。国际法、地区性组织、分裂主义趋势、跨国家的技术性组织、科

① Ashley, 'Untying the Sovereignty State', p. 248.

② Bartelson, *Genealogy of sovereignty*, pp. 88, 151; Hedley Bull, 'Martin Wight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 1985, p. 112; Hedley Bull, *Anarchical Society*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77), pp. 8, 218, 318.

主 权

学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种种情形，都向独立自主的国家历史性概念发起了挑战。事实上，布尔甚至承认要是把他的理论逻辑发挥到极至，人权最基本的原则都将会遭到颠覆，并代之以应该像组织主权国家社会那样组织人类生活的原则。

布尔试图把主权和他关于国际社会的概念一致化，但最终结果显然是失败的。主权往往被贯之以国家主义的特征，但是国家呢，就像布尔告诉我们的：当国家实施着对其领土和居民的绝对控制之时，国家就享有了内部主权；当国家不享有至高无上性，但独立于外部权威之时，国家享有的就是外部主权。^①但是针对这一观点，我们不难发现又一个尴尬的问题：如果国家缺乏对其他国家和非国家组织的至高无上性，那又怎么能说它对其居民实施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呢？

布尔自己悲观的结论——承认我们深陷黑暗之中总比假装我们能看见光明更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最典型的范例。（我们如何能够脱离开与它者的联系而弄清自己）对布尔的解构表明了现代性对于后现代性的中心地位。他支持国家主权，但在无政府社会里却是由国际法和跨国组织来保证秩序的。他主张静止的、无历史内涵的公共利益概念，并把其视作为自然法理论之“经验的对等物”，其中的世界是流变和变化的。他还赋予国家独立、平等和自我决定的特征，^② 但却否认能够在

① Bull, *Anarchical Society*, pp. 267, 152, 9; Hoffman, *Beyond the State*, p. 184.

② Bull, *Anarchical Society*, pp. 6, 228, 214, 320.

现实世界中找到这些令人心仪的品质。

布尔之所以只能在解构方面富有成效，是因为他是一个现代的理论家。巴特森指出，现代主权包含了国家间无政府状态的预言和世界性救赎的假设。这一论点强化了我的观点。要超越现代性，我们首先必须使之“特权化”。“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依赖于国家形式上的平等。但是，既然这种平等并不是真实的，我们就有理由期盼“全球性的救赎”——一种超越了主权国家的秩序。

作为一系列永恒公共价值的布尔之正义概念陷入了同国家所强加秩序的不幸的、悲观的冲突之中，^① 这是因为简单的把两种元叙事（metanarratives）加以并置——一个是“理想主义的”，而另一个根源于“现实主义”的世界。但是，布尔对于国家以抽象的个人权利和义务概念表述自身产生了疑问，而后现代主义却迫使我们找到一个本质上是历史的、“对话的”主权概念。

后现代主义者经常把其观点奠基于相对主义基础之上的事实预示着他们一直所致力的解构过程是多么的容易遭到非议。因为后现代主义包含了批判和和现实主义的两重逻辑。作为一种一以贯之的批判方法，解构主义拒斥两者必须择其一的理念，所以其在阐述后国家主义的主权概念中必将扮演着极为重

① Bartelson, *Genealogy of sovereignty*, p. 244; R. J. Vincent, 'Ord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J. D. B. Miller (ed.), *Order and Viole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p. 43; Murray Forsyth,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al Studies*, 26: 3, 1978, p. 416; Bull, *Anarchical Society*, p. 22.

主 权

要的角色。如果说这种解构主义的观点并不必然推崇某些后现代主义践行者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曾经尝试过颠覆，而不是实际上超越他们所激烈批判和挑战的现代主义者之理论假设。

第八章 自然主义和个人主权

我曾经指出过，主权需要同国家分离开来。主权可能被视为神权、男性主权或者是党团的主权，但是这些主权概念都是预设了国家存在的等级制概念。就像其他的意识形态一样，自由主义把个人看作是独立于国家的主权享有者。但是，尽管其允许个体拥有自我主权，个人的自由概念却存在着内在的致命缺陷：它是自然主义的、永恒的和抽象的。结果是，要想社会秩序得以维系，个人最终不得不诉诸于国家。

像其他的思潮，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都向国家作为秩序可能的维持者之角色发起了挑战，但他们同样隐藏着等级压迫的抽象概念。这种被我归于自然主义的超历史的，静止的概念，只会摧毁孕育一个平等的和后现代的主权概念的尝试。

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然的个人

是什么使得自由主义传统在重塑主权概念中意义非凡呢，

主 权

那就是自由主义关于个人之自由、平等和不可转让之权利的观念。国家只有是基于同意的授权才是合法的。^① 也就是说主权不仅仅具有国家主义的涵义，而且具有个人主义的内涵。

在古典自由主义传统里，个人被认为掌握着自我管理的权力，也就是掌握着独立于国家的个人主权。就像霍布斯指出的，个人俨然保持着“其主权所要求的主体地位”。斯特劳斯也当然的认为个人之特性已经转变成了个人主权的概念。^② 但这本身并不足以使得我们把主权和国家分离开来。伯特南·德·尤文纳（Bertrand de Jouvenel）指出了在“霍布斯威权主义的结论”和“绝对的自由主义前提假设”之间的联系，卡罗尔·帕特曼（Carole Pateman）对此也持同样的观点，他指出霍布斯个人主义的极度抽象性在逻辑上同他绝对主义的国家是密不可分的。^③ 霍布斯的问题并不是简单地来源于其利维坦的威权主义，它来自于其个人主义的自然主义，这也是自由主义传统整体上面临的共同问题。

我们承认洛克自然主义的国家似乎比霍布斯的更具有社会关联色彩。但对于洛克来说，人们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来自于上帝所赋予的“自然法”。它们全都是“一个惟一主权者”的

① John Hoffman, *Beyond the State* (Cambridge: Polity, 1995), p. 99.

②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8), p. 229;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p. 171, 175.

③ Bertrand de Jouvenel, *sovereig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246; Carole Pateman,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Cambridge: Polity, 1985), p. 37.

奴仆，因此主权就是一个等级制的概念，而在渊源上是神意的。在洛克的自然状态中，个人不仅有权利摧毁“较劣等的生物”，而且可以摧毁人类。他们所享有的生命和死亡的权力就是主权性的权力——用绝对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话语进行建构。奴隶可以通过“自然权利”在正义的战争中合法地捕获，而且父权制也被“自然化”了。^① 如果当洛克反对绝对国家而寻求限制时，他的理论假设在本质上也就成为霍布斯式的了。正像斯特劳斯指出的，他对个人财产保护的关注是简单的，是霍布斯式自我保存之基本权利的必然结果。洛克认为，每一个人（男人）在其自我人格中都具有“财产”，其他任何人都无法侵犯。^② 作为自我保存之延伸的财产也是个人主权的根基所在。

关键在于，即使在国家被引进到洛克的理论之前，我们就已经有了国家主义特征的个人概念。随着货币的流通和获取收入限制的迅速消除，对地产的占有变得“不成比例和不平等”，并由此而出现了种种“不便之处”，自然而然，个人对国家的需求也变得不可避免。对于洛克来说，主权包括了对人身和财产的绝对控制，^③而且财产具有个人以牺牲其他为代价进行占有的排它性特征。

①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Civil Government* (London: Dent, 1924), pp. 116, 120, 157—9; Pateman, *Problem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p. 63; Hoffman, *Beyond the State*, p. 103.

②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 235; Locke, *Two Treatises*, p. 130.

③ Hoffman, *Beyond the State*, p. 103;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 247.

卢梭和人类抽象本质的概念

使得卢梭深陷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图圈的正是其理念中的自然主义。卢梭认为，所有的个人都具有自我保存的根本欲望。当然，卢梭尖锐地批判了使得富者剥夺穷人成为合法的“欺骗性”社会契约，在卢梭那著名的论断中，他指出，在真正可信的社会契约里，每个人的一切都被“剥夺”，并作为一个整体赋予共同体。财产成为一种关系到正义和国家存续的社会制度。但是卢梭仍然认为生命、自由和财产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构成要素”。按照我的观点，除了其激进的理论立场，他仍然保持着这一观点：自由是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对财产的欲望，它是人类本性的组成部分。^①

如果人们要想自由的生活在一个自然状态中，那么所有的个人都必须同他人团结在一起。在契约中彰显的主权本质上是国家主义的，正如卢梭所指出的，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必定要以集体强制力的方式加以解决。如果情况将危及到平等，卢梭用毋庸置疑的语气指出：合法权力应该保证平等。公意（general will）应该通过实施强制力，调整和惩戒那些本质上必然会危及到平等的“不公平”来保护这一平等。^②

①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 285;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London: Dent, 1968), pp. 201, 208.

② Rousseau, *Social Contract*, pp. 60, 97, 69.

在斯特劳斯对卢梭的分析中，他指出：为了保持在社会中像以前一样自由，人们（男性）必须要彻底的“集体化”（collectivized）和“去本质化”（denaturalized）。但这却是一个误导。就卢梭而言，人类具有占有的个人性，即便是在合法的社会契约下，也要求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财产，所有人都具有得到他所需之物的自然权利，而且社会中的财产制度使得人们明白“什么不属于别人比知道什么属于他人更多”。^①如果人们没有关于共同体的美德，社会契约就难以实施，就像国家主义一样，同样需要一种信仰进行支撑。一个人不能改变其占有的本性就像难以改变上帝一样。^②而在卢梭的国家（穷人、妇女和外邦人）之中，最有可能遭受强制力的就是那些试图抵制公民信仰的不同政见者。

主权和新自由主义

到18世纪末自由主义者开始放弃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理论。但是，问题在于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形成一个对个人特性“传统”的理解，而只是使得国家“自然化”了。从自然权利向效用概念的跃进，或者是以康德哲学的方式重新改造自然权利观念，而这只是使得自由主义和前面所提到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之解放逻辑和颠覆性逻辑渐行渐远。

① Ibid, pp. 68, 66. See als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 285

② Rousseau, *Social Contract*, pp. 80, 186

主 权

因此，休谟认为国家自身是始终存在的。他使得在压迫性的等级统治中不可能以后现代主义的方式对概念进行解读。从休谟怀疑论的视角来看，部落首领使用强制力“减少对抗和不服从”在本质上和其他所有领导者的行为都是一样的。如果后来的自由主义者抛弃了自然法的理念，那是因为他们把无止境的财富聚敛看作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进程，^① 他们不再需要自然权利理论中那种“无政府的谬论”来进行支撑性的说明。

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以其关于主权的概念闻名于世，他把主权看作是个人的或是由一群习惯于服从的人们组成。奥斯汀认为法律、命令、市民社会和主权都是相互依赖的，而这一著名的功利主义概念也就意味着主权概念只能是国家主义的。^② 如果像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一样的功利主义者在男性普遍选举权的承认上显得格外谨慎的话，那么他们关于个人来源于自然主义的概念使得主权存在于国家之外的理念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立场更为有趣。在其著名的对自由之捍卫中，密尔认为“只要控制了自身，控制了自己的意识和身体，个人就拥有了主权”。毫无疑问，密

^① David Hume,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New York: Hafner, 1970) p. 358. See also Pateman, *problem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p. 33;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 246.

^② H. L. Hart, 'Austin' in David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Free Press, 1968), pp. 471—2. See also Hinsley, *Sovereig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57.

尔认为个人的自由必须受到国家的限制,^① 但是同时, 他又引进了对于后国家主权概念来说至关重要的概念。在面对其个人主权概念之多样性和国家主义特性时, 密尔认为“主权的多数人”需要受到“一个或少数”的指导。但是密尔把效用看作是奠基于他所谓的“不断演进的人类之永恒利益”之上的, 在他对人之本性的著名论述中, 密尔把人的本性比作“一颗根据其内在冲动趋势, 需要向全方位发展和成长的生机勃勃的树”。^②

密尔这一关注的演变是怎样影响到其个人性主权之概念的呢? 在《论自由》一书中的相关论述是相互冲突的。一方面, 社会的干预只有在“防止他人的侵犯”时才是允许的。然而在另一方面, 密尔的理论却又明显地向解构敞开了大门, 如果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 而且人们都以不侵犯他人的方式行为的话, 个人又怎么能够成其为主权性的? 在自由之自然主义的关键之处, 密尔理论的模糊性暴露无疑。密尔认为上述原则的惟一例外就是“成为被保证人, 个人的或是集体的, 或者是出于保护个人之自由而干涉他人行动的自由”。^③ 但是果真如此的话, 岂不是与“个人需要保护来对抗任何形式的侵犯, 甚至当这种侵害来自于其自身”之理念相矛盾吗?

密尔指出, “只要所有人之内在的意志保持不变”, 个人以一种只关注自己的方式行为时, 他们的行动就是自由的。但是

① 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

② Ibid., pp. 131, 70, 123.

③ Ibid., pp. 68, 166.

主 权

如果我们对人之本性进行说明的话，人的意志活动就会发生变化（如密尔所做），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这些“人们伤害其自身”的新情况进行审视。密尔以奴隶制问题为例指出，当我们允许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时，我们是以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自己谋福利为前提假设的。但是，当人们把自己卖为奴隶时，他们就放弃了自由，他们也就放弃了“超越于这一单独行为之上的其他未来的用处”。^① 这样的自由原则并不能要求人们变得自由或者是不自由。

由于其自由的自然主义和个人主权的国家主义，这一观点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人们以流变和持续不断的方式实践其意志。然而自由的行为是永恒不变的，这就是密尔观点的实质所在。虽然个人必须被允许是不同的（即便是这种差异看起来显得多么愚蠢和不明智），但他们不能被允许伤害彼此或者是从事伤害自己能力的活动。“社会”将容忍那些它认为是不明智的行为（比如过量饮酒），在此状况下，也只有在此状况下，这样的个人才能够从其被认定为愚蠢的行为中解脱出来，并且像以前一样恢复其自由的活动。

换言之，没有人有权利破坏他们自己的主权。自由必须被界定为一种个人之行为不但与他人相联系，而且要关照自身的品质。很明显，密尔难以坚守其立场，因为他主张我们应该认同施加于自由之上的限制。^② 正是他的论述表明了这一问题，

^① Ibid., pp. 172—3.

^② Ibid., p. 173.

为什么在不同意自我毁灭的行为时，我们要对自由加以限制？

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就像个人和个人的私有财产一样，自由能够以同样抽象的践行方式被放弃。霍布斯认为，人之所以变为奴隶，并不是因为其生来就是如此，而是因为当他们被“击败”以后，他们以语言或者是“明确的意思”表示他愿意为奴。卢梭对此作出了更为深刻的探讨后指出，就像“杀人者愿意偿命”一样，没有人会愿意变为奴隶。^① 主权是作为一种可让渡的权利而存在的。

在暗示我们不能进行统治，也不能被统治的过程中，密尔的理论不仅在关于自由的概念上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且他还向国家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安东尼·阿伯拉斯特（Anthony Arblaster）就曾指出，关押是“剥夺某人自由最显白和基本的方式”，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都赞同监狱和关押是不确定之将来必要的社会组织。^② 密尔所要加以澄清的是：当强制力被用来对抗个人时，我们不仅在一个特定场合适时地摧毁了自由，而且使得人们稍后的自由表达变得很困难，甚至是变得不太可能。因为不管我们私自拥有主权还是放弃（像犯罪）主权，它都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它是一个可以发展变化的事物，并且只有存在能够使人们实施选择、行使自由之条件的情况下，主权才可能得到发展。

① Hobbes, *Leviathan*, p. 255; Rousseau, *Social Contract*, pp. 55, 79.

② Anthony Arblaste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Western Liber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84), p. 74.

主 权

由于密尔对背景十分敏感，所以他又指出了其他既无损于自由，又能保证秩序的方法。密尔承认，因为我们并非生活在自然状态，而是生活在社会之中，所以我们的所作所为都会影响（即使并不一定是“伤害”）到其他人。我们应该通过一些方式来使得人们知道我们怎样评价他的行为，而不论这些方式是赞美之类的积极情感，还是诸如憎恶，蔑视之类的消极情感。密尔指出，一个人可能会由于其自身的过错而遭受“非常严厉的惩罚”。密尔把这种惩罚看作是“自然的”，因为他认为“就像它本来那样，那是它本身自然而然的結果”^①——并不是为了惩罚而故意施加于个人身上的。

在第五章，我把这些自然的惩罚视作为间接的强制形式，而密尔则认为它们是一个自我发展之社会必不可少的，它使得人们能够从自己身上习得教训。我也曾认为强制或许会具有更为明显的惩罚性质。尽管道德强制（密尔的指称）比自然的惩罚具有更多的争议，但是按照我的观点，它依然是缺乏强制力的，也不应该被视作对自由拥有内在的敌意。密尔把自己看作是自由主义者，但是由于他的分析超越了个人的自然主义概念（个人静止和抽象的行为不可避免的需要强制力对个人主权进行限制），所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自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主权观

我在其他地方曾经讨论过自密尔以后自由主义的发展，此

^① Mill, *On Liberty*, pp. 68, 144.

后的自由主义继续着自然化国家的进程，开始向精英主义（elitism）和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转向。^①但是自然主义同时也会有损于对国家存在之必然性的挑战。

无政府主义者把个人视作为主权，但是这种观点无益于后现代主权概念的建构，因为它对国家的批判是建立在自然主义的假设之上。像威廉姆·戈德文（William Godwin）之类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抱有这样一种个人主权观，即否认个人之社会联系的存在。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对道德的拒斥使得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主权性的个人要想过一种有秩序的生活显得尤为困难。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在其他地方也强调过团结的重要性，但他们采用的仍然是抵制后现代主权观的准自由主义（quasi-liberal）抽象概念。巴枯宁（Bakunin）就坚决反对霍布斯式的狂热“人生来就在社会之中，就像蚂蚁生于蚁山，蜜蜂生于蜂巢之中一样”。同时，他还指出，社会性和自我中心主义都是“自然生物体”必需的“驱动力”。^②

主权被用静止的人性概念进行建构，所以人们管理自己的过程具有内在的压迫特征。马歇尔（Marshall）就认为，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无论他信奉什么”，都深信自发秩序的概念会引导他们反对国家和政府。无政府主义者本质上还否认对强制（coercion）的需要。就像卡特（April Carter）所指出的，许

① Hoffman, *Beyond the State*, pp. 106—10.

② Peter Marshall, *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London: Fontana, 1993), p. 291; Hoffman, *Beyond the state*, pp. 113—16, 120; G. P. Maximott,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3), p. 146.

主 权

多无政府主义者“特别乐于接受”暴力的使用，尽管事实上暴力和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自治概念是格格不入的。也就是说，自然主义个人主权的概念天生就具有暴力的涵义。^① 无论我们把主权视作为占有财产的自然欲望还是进行反抗的本能，一个抽象的绝对主义概念都是应有的题中之意。

马歇尔认为，即使是在无国家社会，公众意见的压力也构成了无政府主义者难以接受的“政治和道德的强制”。社会的压力必须让位于作为新社会秩序所志愿采纳的惯例和准则，而这样做会使得社会争端“日趋减少”。戈德文认为公共意见就像强制力，同皮鞭和锁链一样难以抵抗；我们还知道奥威尔（Orwell）发现在托尔斯泰（Tolstoy）的和平主义中也存在潜在的压迫，而甘地（Gandhi）的非暴力运动也由于被认为对人们施加了道德的强制力，从而也具有了威权的色彩。^②

这就是问题所在，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总是处于强制压力的笼罩之中，人们被驱使去做他们所不愿意做的事。主权的个人要么抵制这些压力，要么服从这些压力。我并不认为这些特定的强制压力必须要得到合理的证明，但是关键在于，这些压力总是以某种形式内在的存在于我们的社会关系之中。不能说它们与主权的实施相冲突，因为关于强制（coercion）和强制

① Marshall, *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pp. 12, 16; April Carter, 'Anarchism and Violence' in J. R. Pennock and John Chaapman (eds), *Anarchis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337.

② Marshall, *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pp. 649—50; David Miller, *Anarchism* (London: Dent, 1984), p. 51; Hoffman, *Beyond the State*, p. 127.

力 (force) 之比较已经使得我们以反对国家主义的治理话语对主权重新进行了界定。而且只有在我们打破了无政府的自然主义传统之后, 治理的主权概念才是可能的。

马克思主义及其自然主义的幽灵

一般都认为在“揭示性”的共产主义中, 马克思仅仅是颠覆了自由主义的传统, 通过“完美联合体”的理想, 个人被“弱化”到社会中, 而这一联合体是一个“施加了强制的人为的联合体” (Leszek Kolakowski 莱斯扎克·克拉考斯基语)。^① 这样, 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我想指出的是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强调相互关系的重要性的意志的能动性——和共产主义、生产、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 (其保留着自然主义的特征, 也因此是国家主义的) 等概念之间存在着紧张。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似乎是想重建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抛弃自由传统。他认为在所有的现有秩序中, 自由国家代表着一种“真正的进程”, 而且他还批判了那种认为社会是由“外在于个人的制度框架所构成”的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 他和恩格斯还特别的质疑了这样的论调: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 整体的主权会窒息和扼杀作为其部分的个人主权。^② 其实个性并

① Leszek Kolakowski is cited in Joseph Femia, *Marxism and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74.

② Hoffman, *Beyond the State*, pp. 133—4. See also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5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6), p. 7.

主 权

没有被抛弃掉，它只是将被重新界定，因此，当马克思认为人们进入到“独立于其意志”的社会关系中时，他并没有否认他们行动的能力。马克思仅仅是在坚持：主权来源于这样的事实：除非我们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否则我们难以生存。这一见解的意义就在于：人们“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不得不进行生产，那么这样的社会就不能靠一种理念或理想来维持秩序，而只能靠理性或者是强制来维系。^①

但是，如果马克思强调的个人进入生产性的社会关系之中是生命得以维系的基本条件是正确的话，他关于生产的概念却是狭隘和自然主义性质的。比如，生产是被这样设想的，其中妇女繁衍后代和家务劳动为形式的传统劳动遭到了排除。劳动的分工不在包括性别的因素，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关于建筑师和蜜蜂礼物的著名比喻认为，一个抽象的、唯意志论的非异化的劳动观并不能够解释生产、自然和儿童的社会化。^②

马克思主义女权者的批判强调了人类行为独断性和自然主义特征的假设使得后自由主义和女性求解放的逻辑开始在理论上陷入困境。当社会在共产主义中被设想为一个剥离了个人“深植于本性中的东西”的社会时，把自然主义看作是萦绕在马克思主义身上的幽灵看起来是有点令人感到奇怪。但是其意

① 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 p. 20;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5, p. 42. See also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4, pp. 197—8.

② Christine Di Stefano, 'Masculine Marx' in Mary Shanley and Carole Pateman (eds),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1991), p. 154.

义在于，自然本身被赋予了女性对立“男性必须控制、强迫她的行动服从于其意志”之观念的特征。^① 作为一个解释性的观点，生产的父权观和阶级的特权密切相关，无产阶级被看作是惟一求解放的组织。把共产主义视作为政治终结的观念使得我们更加难以理解，所有社会中的利益冲突是如何产生的，并因此而需要解决冲突的统治机制。

换言之，在德·斯特芬洛（Di Stefano）所谓的马克思“对话的”历史观和作为“惟一出路”（其中历史无情的规律将保证工人阶级取得最后的胜利）的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冲突。所谓的解放不是一个政治的进程，并不是个人建立一个压迫和剥削的替代物。就马克思而言，解放来源于历史规定角色的理论。这是一个反国家主义的论调，其自然主义的特征却又赋予了国家主义的特征。就像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理论那样，也可能无助于马克思主义，在葛兰西那里，霸权的概念被理解成为一个独立于统治和强制之外的道德和知识分子的概念。结果，共产主义的理念在本质上变得更加抽象，自

① Diana Coole, *Women in Political Theory* (Hemen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8), p. 200; Valerie Bryson, *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2), pp. 94—1; Isaac Balbus, *Marxism and Domin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268—72; Di Stefano, 'Masculine Marx', p. 154; Hoffman, *Beyond the State*, p. 151.

主 权

然主义的特征也更加突出。^①

最后，马克思主义在作为抽象理念的共产主义和由主权国家组成的现实世界之间提供了一个极端的“抉择”。而只有在威权的体制下，这种抉择才是可行的。特定的国家在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进程中扮演着具有特权的角色，这样的社会变革被视作需要威权型体制加以保障的革命性变革。这也意味着，组织越是威权型的，就越难以实现自我治理型的主权在全球、地区、省和地方各个层次的运行。^②

如果主权被界定为一个后国家主义的概念，那么我们必须打破自然主义的樊篱，不管它是以自由主义的形式，无政府主义的形式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就像在最后一章中要向大家所展示的那样，我们将探索这样的观点如何被建构。

① Di Stefano, 'Masculin Marx', p. 142; Norman Geras, 'Democracy and the Ends of Marxism' in Geraint Parry and Michael Moran (eds),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80; Hoffman, *Beyond the State*, p. 142; John Hoffman, 'Antonio Gramsci: *The Prison Notebooks*' in Murray Forsyth and Maurice Keens-Soper (eds), *Political Classics: Green to Dwork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75.

② See R. L. Berki, 'On Marxian Thought and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24: 1, 1971, pp. 88—105.

第九章 联系的主权观之阐述

如果后国家主义的主权概念要得以维系，那么联系的主权观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这首先意味着在国家和主权的结合以及在其中主权得到明确表述的现代主义传统。我想指出的是，尽管现代主义不是构成一个超越于国家之上主权概念的充分条件，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但是，如果国家并不是主权，那么主权将驻足何处呢？我认为，主权必须被视作为个人性的而不是国家的，但是只有以非自然主义的话语对主权的个人进行分析时，这样的立场才是站得住脚的。个体并不会单独存在，它只可能通过家庭的、地方的、地区性的、国家的乃至全球性的组织——在每个可想象的社会层次上来加以体现。主权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但是它只有置身于相互关系的无限时空中时才有意义，而且这一相互关系同样也包含了个体作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更宽广的自然界。

既然联系的主权观是“去除隔离的”和包容性的，那么它就必须承认国家自身在建构一个可能的后国家主义主权概念时

主 权

将会扮演着一个中心的角色。

现代性的价值

毫无疑问，主权国家是一个不寻常的组织，这也导致人们把它看作与现代世界毫无关系。巴特森认为，如果想要认真地考虑主权“联系的特征”，那么“我们就必须放弃为其在政治哲学中寻找一个永恒基础和本质”的探求。^① 但是，除非能够对此进行证明，否则我们怎么能够认为主权具有“联系的特征”呢？如果没有作为自治的主权概念，没有不可分割的和个性化实体的概念，我们怎能着手建构一个后国家主义的主权概念呢？

如果主权被视作为联系性的，它必须同现实的世界相联系。这一联系性的观点超越了被习惯上称作为“现实主义”的立场，但是它首先要以对主权国家深深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承认为起点。17世纪以来现代主权国家形式的发展是联系的主权观必不可少的，因为你不可能建成没有基础的空中楼阁。

而且，像伊拉克（Iraq）、科威特（Kuwait）和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这些国家的存在警示着我们，想当然的认为当今世界全是由现代国家组成（即那些自由的或者是自由—民主的国家）的想法是有失偏颇的。

^① Jens Bartelson, *Genealogy of Sovereig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8.

在后国家主义的视野中，所有的国家都是主权性的概念暗含着国际法上平等地位的逻辑。布尔就曾指出，那些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永远都把主权国家看作是抵御掠夺其经济资源并通过“新殖民主义”政策对其进行控制之企图的堡垒。^① 所以就像一个老帝国分崩离析，国家的解放运动取得成功使得其转变成为一个主权国家那样，也没有什么让人感到惊讶的。主权之地位建立在平等的假设之上，并且同尊重和自尊联系在一起。纳伊姆·伊纳亚图拉（Naeem Inayatullah）和戴维德·布兰尼（David Blaney）正确地指出，第三世界国家把正式的主权国家视作为独立自主的，而且这些国家都是主权最坚决的拥护者。他们认为，主权“既不是毫不相关的也不是邪恶的强制力”：它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② 但是为了实现某些原则，主权必须得到建立。

主权还意味着自我决定。现代主义把自我决定同主权国家等同起来。我们不应该把现代性理想化，也不应该否定它。在我看来，只要主权的地位能够维系国际关系的组织原则，就有可能杜绝民族国家（nation）的自我决定权利向国家主义形式的转变。基东·高特列柏（Gidon Gottlieb）指出像库尔德（Kurds）和巴勒斯坦（Palestinians）这样的团体（groups）尽管

① Hedley Bull, *Anarchical Society*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77), p. 292.

② Naeem Inayatullah and David Blaney, 'Realizing Sovereign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1: 3, 1995, pp. 3—4. See also Marc Williams, 'Rethinking Sovereignty' in Eleonore Kofman and Gillian Youngs (eds), *Globalization* (London: Pinter, 1996), p. 120.

主 权

缺乏主权之地位，但是其领土地位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因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国家（nation）都是主权国家（state）的话，无疑将会加剧冷战结束后暴力的滥用。

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库尔德和巴勒斯坦会被主权的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否认其主权地位呢？如果我们在允许一些国家拥有现代性的同时又强加（结果性的）前现代的东西于它者之上，那么只会把这种建立在现代主义主权观之上的形式平等置于不顾。换言之，我们还得以现代主义为基础，而不是拒绝它。高特列柏就认为，“对国家同一性的宣称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的现象”。同时他还指出，这种国家的同一性不应该和公民的身份混淆起来。但是人们能够被劝说接受这种本质上并非是国家主义的自我决定之政治形式，其中国家的地位将受到公开和明确的挑战。高特列柏认为，“在理论上，自由的国家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和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应该拥有其主权地位之原则”的情形较易举出，^① 但是仅此而已，一个自由的国家主义和人民主权的例子却难以举出。一旦我们不加批判的热衷于某些国家的合法性，那么拒绝承认其他国家的主权地位就是有失公平和站不住脚的。

塞缪尔·巴金（Samuel Barkin）和布鲁斯·克洛林（Bruce Cronin）主张，对主权的阐述应该建立在“国家相互联系”的

^① Gidon Gottlieb, 'Nations without States', *Foreign Affairs*, May - June 1994, pp. 108, 101. *This draws upon the argument in his Nation against Stat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3).

基础之上。他们特别的关注其所谓的“政治主权 (state sovereignty)” (强调在主权权威和既定领土间明确的联系) 和“民族主权 (national sovereignty)” (强调主权权威和既定居民之间的联系) 两者之间存在的历史性的冲突。^① 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既已存在的政治国家边界是否应该因为民族种群跨越了国家之边界而发生变更呢 (就像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一样)? 但是, 不但国家的同一性本身比巴金和克洛林的假设更为充满争议和疑问, 而且他们提出的却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由于对现代主义国家的热诚所导致的。

联系的主权观必须建立在对现代性的超越之上。现代主义的国家主权观自然化了个人、国家人民和强制力本身。巴金和克洛林承认把民族国家和政治国家联系在一起有可能强化国家之间的暴力 (就像具有统治权的国家抵制对边界重新划界一样), 而把主权和既存的法律实体联系在一起将会强化国家内部的暴力。^② 但是他们忽视了应该竭力解决的问题: 可以采取什么来对付暴力本身? 只要我们继续想当然的承认主权国家的合法性, 这一问题就难以得到解决。

没有人能够否认在主权国家之间, 现实权力存在着较大的

^① Samuel Barkin and Bruce Cronin, 'The State and the Nation: Changing Norms and the Rules of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8: 1, 1994, pp. 128, 108, 113.

^② Ibid., p. 130

主 权

分歧。^① 但是如果享有的平等是形式和抽象的话，这也无关要旨。在南非人民能够对付毒害其社会的严重社会不平等和个人不平等之前，他们就不得不首先组建自己的现代民族主权国家。因此，罗森博格（Rosenberg）错误的否认了现代国家具有的抽象平等对于具体的“实质性”举措还是具有意义的。罗森博格还否认普遍选举权的平等性向资本主义的等级特权发起了挑战。^② 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当今世界的解放运动不管是新自由主义的（new liberals）、工团主义的（trade unionists）、社会主义的（socialists）、共产主义的（communists）、女权主义的（feminists）、生态主义的（ecologists）、还是无政府主义的（anarchists），都向等级统治发起了挑战，因为这些运动都想当然的认为国家存在形式上的平等。

联系的主权观必须对两方面都进行批判。一方面，它需要把现代主义的个人和平等概念同前现代明确的等级制和形式上的不平等进行对比。而另一方面，必须要准确的界定想从自由国家必然的冲突逻辑中竭力解脱出来的后国家主义主权观。在此，并不是否认现代国家和其自由主义之前提假设重要性的问题，而是怎么实现超越的问题。

① Robert Jackson, *Quasi Stat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3. See also Inayatullah and Blaney, 'Realizing Sovereignty', p. 16.

② Justin Rosenberg, *The Empire of Civil Society* (London: Verso, 1994), p. 89.

作为关联体的个人

如果现代主义的主权概念想要一以贯之的话，那么其绝对、不受限制和不可分割的主权观就是至关重要的。认为必须对主权进行限制、分割和分享的观点并没有使我们对主权的理解取得什么进展，这是因为，如果我们终结了只能以追溯前现代来代替现代性的论调，就只能对现代性进行重建。在这一点上，詹姆斯无疑是明智的，他坚决捍卫现代性，因为现代性要么使我们拥有主权，要么使我们一无所有。^①

现代主义的问题并不在于其本质上绝对化的主权概念，问题恰好在于这一绝对主义被等同于自然化了的个人、民族国家和政治国家的概念，主权也因此被授予了一个特定的组织或团体。然而，联系的主权观需要一个绝对的主权概念，我们必须承认恰好是由于这一概念的绝对性，其本质上才是无限的。

个人通过与其他人的相互关系获得自由和自治。因为相互关系总是处于不断的流动和变化进程中，其特性是流变和可塑的。正是这一联系性的特征给予了个人“传统的”和“人为的”特性。那种认为个人是“自然的实体”，而国家则不然的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莱瑞·希典特普（Larry Siedentop）就曾指出，个人应该被视作为“社会构成物（social construct）”——“一个智力发展的成就”——并把所谓“自然个

^① Alan James, *Sovereign Statehood* (London: Allen&Unwin, 1986), p. 48.

主 权

体”的概念同 17、18 世纪自然主义的原子主义联系在了一起。^① 作为市场交换关系的结果，只有当人们把相互间关系视作互换性的和平等的时候，个性才得以显现。通过明显有别于以等级制为特征的前现代社会之社会联系，个人身份才得以建立。

我曾经指出，个人从公开的等级制下解放出来是建构一个后国家主权概念的理论前提。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占有性市场社会的自然主义把传统上和统治者联系在一起的神性转移到了个人身上。我们依然面临着历史遗留下来的绝对概念和相对形式之间的尖锐矛盾。静止的和原子式的个人概念排除了那些因此而被国家强制获得“自由”的人。

联系的主权观把个人视作为看待他人以及自己之法的不断调整。作为一个绝对的概念，主权只能通过其特征的发展、变化过程来展示自身。一旦暴力被使用，这一流变和关联性的特质就会遭到破坏，而在统治主体和客体之间就会出现赤裸裸的等级统治，由于强制力的使用摧毁了主客体之间的对话和互换，^② 而不管这种破坏是发生在个人之间还是发生在个人内部（个人的联系性同样也是无限的），主权的个人只会像压迫别人

^① Jackson, *Quasi States*, p. 182; Larry Siedentop, 'Political Theory and Ideology: The Case of the State' in David Miller and Larry Siedentop (eds),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1983), pp. 73, 61. Nancy Hirshmann and Christine Di Stefano (eds), *Revisioning the Political* (Oxford: Westview, 1996), p. 64.

^② Anna Yeatman, *Postmodern Revisionings of the Political*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90.

一样压迫自己。

相互联系使得人们可以使人们互换位置——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一种形式的想法是错误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多层次的，在一个全球层次上之交流越来越多的世界，个人同外界的联系显得前所未有的密切和频繁。例如，加入大赦国际（Amnest International）的个人就把在阿根廷（Argentina）和皮诺切特的智利（Pinochet' Chile）受到军事统治者虐待的个人看作是他们中的一员，就像他们已经进入到了该组织的普遍联系中一样。也就像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身陷纳粹统治下的困境一样，人们可以通过穿越时空去体验那种不公正的对待，挑战自己对自由和自治的感受。不断的变化和发展是主权的应有之意，而要想在这种变化和发展中更好的控制自己的生活，就只有通过关注他人的自由和自治才可能达致。

就像关联着那些遭受着痛苦的个人一样，主权同样还意味着那些试图通过存在于地方的、省际的、地区性的、国家的和全球性的组织和团体来消除这些痛苦。联系的主权观并不能把主权限定在一个特定的组织之上，作为一个绝对的概念，主权只能通过对自我统治（self-government）无止境的探求来展示其自身。既然这一探求被看作是相联系的，它就不能被限定为一个特定的人，被限定在一个特定的组织、特定的领土和特定的民族国家以及特定的时空之中。

主权和生态安全

就像我已经指出过的那样，自然主义把自然的概念视作为固定不变的。因此，非自然主义的主权观则用流变和历史的话语来阐述主权和自然之间的联系。在第七章中我曾经以可渗透的皮肤取代难以穿透的隔墙来比喻边界，而这一比喻被帕翠希·米切尔（Patricia Mische）用来论述她的生态安全理论。

她指出，把主权界定为一个发展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瞬时的结论尤为重要。一种敏锐的历史感不但使我们关注我们相互关系的过去，而且要关注相互关系的未来，我们必须关注那些后来者的福祉。而且，对这种对相互关系的崇敬之心并不仅限于人类，因为个人治理自己生活的能力是和不断变化的个人与自然间关系密不可分的。如果把安全界定为对危险的规避，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弄清楚所面临的巨大危险——米切尔所谓的“由于蹂躏地球造成的对人类生命的新威胁”。^①

这还不仅仅是一个战争（特别是核战争）对环境造成威胁的问题。当他们预示着将要耗尽臭氧层；由于温室效应导致不可控制的气候变化；水、空气和土壤遭到污染，并造成了癌变的发生和基因的损害时，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和层次”。仅仅是地表土的流失和不断增加的荒漠化就造

^① Patricia Mische,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the Need to Reconceptualize Sovereignty', *Alternatives*, 14, pp. 390—1.

成了数以万计的人陷入饥荒之中，这使得贫困地区和受剥削地区恢复环境的前途更加渺茫。热带雨林的毁坏耗尽了地球的氧气供给，而且越积越多的二氧化碳进一步加剧了温室效应。^①

生态安全的问题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主权的本质。米切尔认为，主权不应该用国家和领土的话语进行理解，而应该是“一个流变和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一个在不同主权领域间相互关系和能量信息相互流动的系统”。除非我们把主权界定为一个包含着我们和地球相互关系的活生生的系统，否则连人类自身的生存都将受到质疑。我们开始有点理解米切尔所呼吁的深层法则了，这一法则是人类赖以存续的基础，而且“所有的人类主权都忠诚于”这一法则。^② 就像我前面曾指出的，如果主权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它就只能以无限的术语来表述自己。

主权包括了至少四个领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米切尔作出了以下区分：生物圈包含了空气、土壤、岩石、矿物和水；技术领域包含了通讯、工业、农业，科技等等；在社会领域，人们相互之间通过政治的和文化的组织和他人（也包括其他两个系统）发生联系；第四个就是由精神和意识组成的人类知识领域。^③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人类并不拥有主权，主权是自然

① Ibid., pp. 392—3. Ulrich Beck argues that today the word ‘risk’ denotes ‘the threat of destruction of all life on Earth’: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London: Sage, 1992), p. 21.

② Mische, ‘Ecological Security’, pp. 396, 392.

③ Ibid., p. 397.

主 权

生物领域所特有的吗？

米切尔并没有提及“地球的主权”，她认为现代主权哲学存在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主权和人联系了起来——国王、议会和人民——并因此而把主权限定在“领土的范围内”。但是问题就在于（她所谓的）主权的“中心观”，它和人类的福祉和生存是背道而驰的。人类是更广泛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就像米切尔指出的那样，生态安全就是“所有人类的安全”。^① 除非人类能明确的意识到生态的重要性（没有这一保证的话，人类将无以为继），并着手去保护它，否则人们就不可能拥有主权。除非我们以不损害和毁坏环境的方式和其他人发生联系，否则我们就难以和其他人和谐共处。

罗伯特·甘纳（Robert Garner）曾指出，主权概念至少应该扩展到“一些非人类的动物”之上，而且主权之个体必须是人类的概念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但是在我看来，没有必要认为一些动物群体——比如至少一岁以上的哺乳动物^②——自己就具有相互关系，并拥有主权的能力。这里所要表明的只是人类的相互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人类本身：它包括了更为广阔的自然界本身。

也正是因为联系的主权观具有对环境的敏感性，所以它较为关注时空因素对主权的影响。“人类的侵犯”对环境造成的

① Ibid., pp. 396, 398.

② Robert Garner, 'Ecology and Animal Rights: Is Sovereignty Anthropocentric?' in Laura Brace and John Hoffman (eds), *Reclaiming Sovereignty* (London: Pinter, 1997), pp. 181, 191.

致命威胁是我们“历史上危急的临界点”之专利品。^①就以其中之一为例，只有当我们觉得家用轿车对于我们的城市建筑和自然界具有多么大的危害时，我们才会去考虑替代它。人类和自然界密切相关，但是这种关系只能是流变和持续变化的，也因此在本质上是互动的。

超越国家主权

罗伯特·杰克森（Robert Jackson）曾把“第三世界”国家界定为准国家（quasi-states），因为它们缺乏“实质和可靠的主权地位”之经验条件。他认为，他们拥有的只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主权。相反，他发现“实质性的政治系统”（意味着自由国家）是繁荣和文明的，在国内具有较高的权威，而在国际领域具有较高的信誉。^②

但是，联系的主权观之所以认同国家的现实是为了改变它。尊重现实并不是为了理想化，而是为了对其进行解构。马克·霍夫曼（Mark Hoffman）承认，乌托邦对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必要的，“因为它指出了存在于人类潜在愿望和现实实践之间的鸿沟”，而且他引用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话指出

① Mische, 'Ecological Security', p. 397.

② Jackson, *Quasi States*, pp. 21—2, 38.

主 权

“没有了想象，人类就会毁灭”。^① 但是这一论调听起来基好像是我们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作出了选择。联系的主权观致力于阐明在现实中寻求理想的“理想的现实主义”。只有面对国家的现实本身，我们才有可能以后国家主义的话语对主权进行界定。

现代的自由国家强调个人管理自己生活的能力，因此承认（即使没有能力解决）在国家强制力和个人自由之间存在着紧张，而现代国家的声誉和领导权则依赖于对这些个人价值的维护和促进。所以，国家自身会热衷于强化共同体的意识和相互关系的内聚性，这也使得建构后国家主义的主权概念成为可能。就像理查德·福克曾指出的：荒谬的是，如果要想保证其有效性，“行动越是自愿和有力，统治者就具有更多的合法性”，国家就必须为他所谓的“可选择的秩序框架”之多样性让路。^②

对个人的授权使国家具有了合法性，它同时也使得国家变得多余。必须以强化个人控制和管理自己生活能力的方式作

① Mark Hoffman, 'Agency, Identity and Intervention' in Ian Forbes and Mark Hoffman (eds), *Political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Ethics of Interventi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3), p. 198.

② Richard Falk, 'Evasions of Sovereignty' in R. B. J. Walker and Saul H. Mendlovitz (eds), *Contending Sovereignities* (Boulder, CO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1990), p. 76. See also Paul Hirst and Graeme Thompson,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Cambridge: Polity, 1996), p. 171; Mark Zacher, 'The Decaying Pillars of the Westphalian Temple: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Governance' in James Rosenau and Ernst-Otto Czempiel (eds),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00.

为,国家才能够保持它的独立性和影响力。这也就是为何承认主权国家的现实是实现对其超越的惟一方法。纳伊姆·伊纳亚图拉和布兰尼认为,对国家的批判必须来自于其内部。他们指出,国家是全球生产结构的组成部分,由于功能性和等级性的全球劳动分工,国家难以“获得主权实质性的状态”。所谓的第一世界富国利用科学和技术的优势剥夺穷国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并从中获益。如果主权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得到实现,那么主权之概念就需要以关联性的术语重新进行界定。^①纳伊姆·伊纳亚图拉和布兰尼指出,这是因为我们都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所有的国家都有权利通过全球性的生产体系实现富裕。

这并不是否认主权的问题,而是怎么实现的问题,除非我们重新对主权进行界定,否则就难以在全球性的语境下实现主权。纳伊姆·伊纳亚图拉和布兰尼认为国家在发展“社会义务和行为”方面扮演着及其重要的角色,^② 这使得我们能够超越一个排除性的、等级制的和分裂性的国家之整体主权概念。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霍布斯的理论在此却深具裨益。霍布斯很正确的坚持:如果没有秩序的话,生命是卑贱、野蛮和短暂的。但是,他的自然主义和麦克弗森(Macpherson)所谓的“社会的市场模式”(market model of society)^③ 使得霍布斯难以

① Inayatullah and Blaney, 'Realizing Sovereignty', p. 17.

② 同上。

③ C. B. Macphers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262, 75. See also John Hoffman, *Beyond the State* (Cambridge: Polity, 1995), p. 190.

主 权

用联系的术语来界定秩序。作为其结果，国家之强制力就是必须的，而合法性和秩序就变得疑问不断了。但是霍布斯理论的逻辑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去避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当国家不断强化这些共同利益时——致力于和平，改善环境，应对全球性的贫富不均等等——它们就创造了一个孕育了主权的有秩序的世界，而共同利益使得在不诉诸于强制力的情况下解决争端成为可能。

这样的共同利益并不排除冲突的存在。相反，恰好是因为每一个个体是惟一和不同的，冲突才再所难免，这就需要实施权力来解决冲突。也就是说只有在公共利益形成的地方，强制力才会发生作用。强制力还具有自我消解的作用（self-dissolving）。它应该被用来保证实施那些聚合共同体的政策，非暴力和非国家主义的冲突解决方式也因此而变得卓有成效。我们身处的不断变化之历史环境使得我们越来越明白强制力并非是万能的，科技的发展使得对充满敌意的少数人和少数团体使用毁灭性的强制力成为可能。而习惯性的把国家主权视作为秩序的保证机制只会使得我们在霍布斯混乱和自我毁灭的噩梦中越陷越深。

米切尔在他关于“全球性治理”^①的论述中很饶有兴致的

^① Mische, 'Ecological Security', pp. 414, 411. Neil McCormick argu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in the EU requires 'a conception of statehood or polity stripped of the old assumptions about sovereignty': Neil McCormick, 'Liberalism, Nationalism and the Postsovereign State', *Political Studies*, 44: 3, 1996, p. 567. The point is a good one even if the terminology is confused.

引用了“辅助性”原则——强调无论是什么问题都应该在地方的层次上得到解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联系的主权观既包括权力的中心化（centralization）也包括权力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因为创造了主权的政策执行难以假定存在的问题具有固定和简单的模式。密尔指出“一个政府，不能实施如此多的阻碍行为，而应该更多的激励个人努力和发展”。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很准确的指出“真正的主权强制”还包括了权力的分散，因此权力能够以最小的相互摩擦在“治理”（国家的、次国家的和超国家的）的不同层次上得到有效的实施。^①

如果国家在超越国家主义的进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的话，那么只有当我们把国家原子化的概念和联系政府观分离开来时，我们才能理解国家的这一重要作用。当国家以“治理的”方式来推进政策时，强制力的使用便被视为越来越多余，国家也因此而实现了对国家主义的超越。没有必要担心欧盟的日趋一体化将会损害国家的主权，因为这一整合强化了各国的共同利益，使得我们能够获取更多的权力来掌控自己的生活，并有助于实现从国家到政府的转变。

辛斯利把主权定义为政治社会绝对和最终权威的经典论述

^① Mill, *On Liberty*, p. 187. Paul Hirst, 'is Globalisation a Threat to the Nation State? Ten Key Questions and Some Unexpected Answer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Sovereignty Seminar,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Sociology, Birbeck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p. 25, 19 February 1997.

主 权

在联系的主权观里必须要重新进行阐述。^① 主权是多层和多元的；它既是个体的又是集体的；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既是国家的，又是地方和全球的。它不能限定在或是奠基于特定的组织之中。因此，主权必须同国家分离开来。作为一个联系的概念，主权惟一要深怀戒备的就是独占和排它性的特质。

^① Hinsley, *Sovereignty*, pp. 1—2.

译者后记

如果说 20 世纪后期的全球化还是一种趋势的话，那么今天的人类却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了全球化对自己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难以避免的。全球化表面上意味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体化，但实际上却是一个文化差异、经济安全 and 国家主权不断彰显的发展进程。欧盟的一体化，区域型组织的兴起，东西文明的“冲突”，无不彰显着这一矛盾的历史进程。

应该说，霍夫曼先生对主权问题的关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正如他指出的那样：不管你承认与否，主权都在实实在在的发生着作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既然主权不可否认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关注它呢？在该书中，霍夫曼先生透过历史的视角，对主权定义发展的诸历史形态进行了对比和分析，并围绕其始终关注的主权与国家间关系对主权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 and 阐述。霍夫曼先生在对主权概念分析的过程中，汲取了丰富的政治思想资源，在为我们进行纯理

主 权

论分析的同时，让我们领略到了不同主权观的精彩论述。尤为难得的是，霍夫曼先生以小见大，在短短的几万言中让政治概念的理论分析变得如此丰富和精彩，却不失深刻。

学术翻译是一件繁重的工作，却也是一件极为有益的事。我希望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著者思想的真实反映，但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个与著者思想进行对话的开始，看作是一个和读者进行交流的平台。

最后要感谢的是丛书策划人和出版社的支持，当然还有远方家人和女友的关切，没有他（她）们，该书翻译工作的完成是难以想象的。

陆 彬

吉林大学南苑

2004 年 11 月

